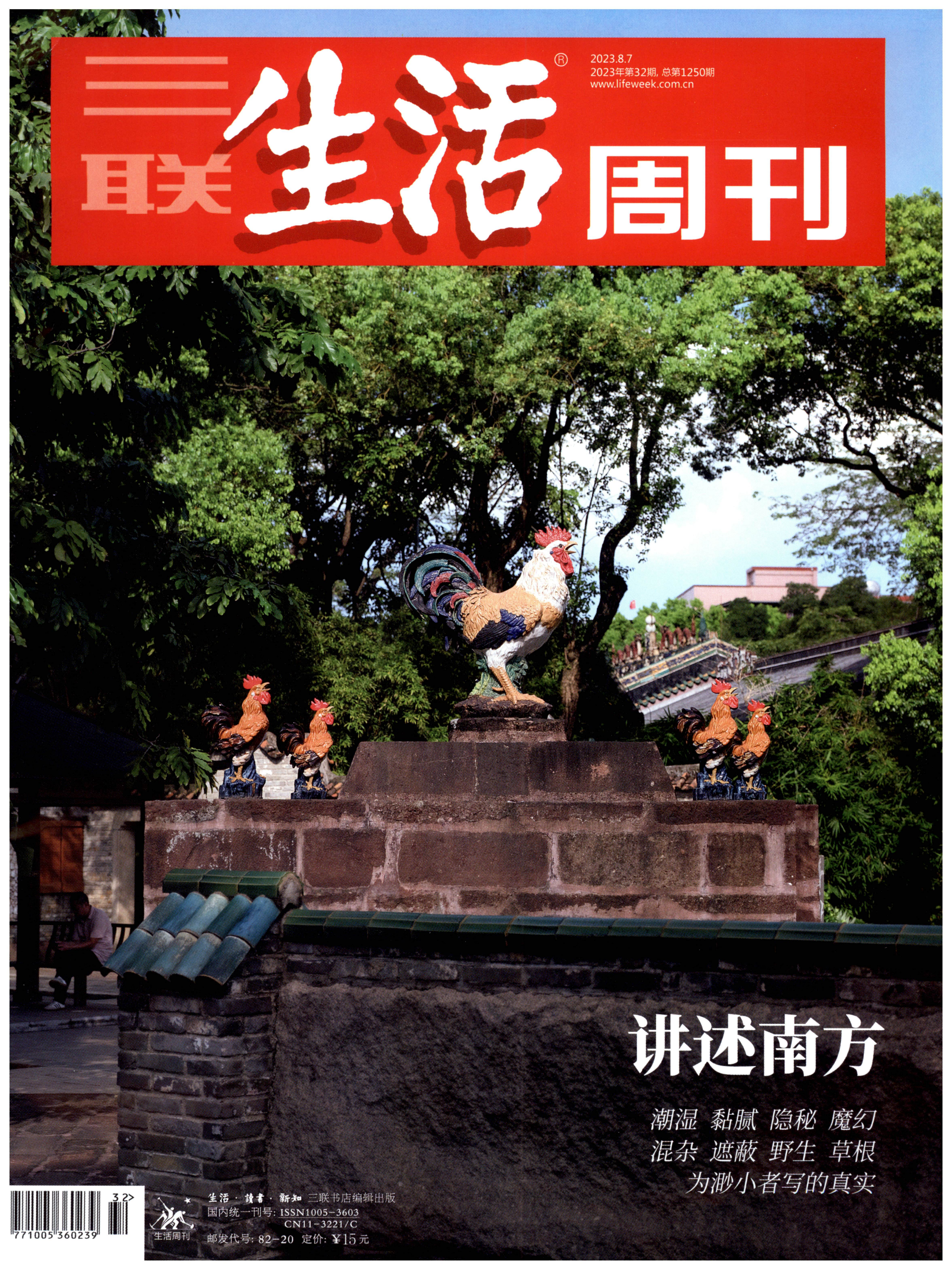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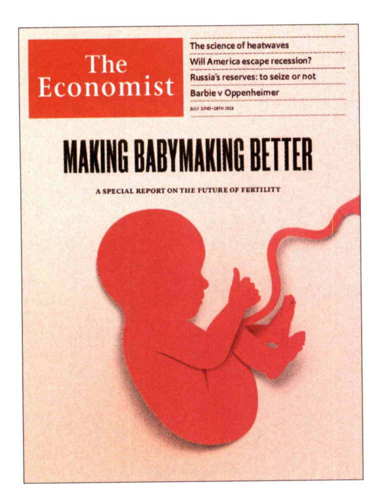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
2023.8.7
2023年第32期，总第1250期
www.lifeweek.com.cn
讲述南方
潮湿 黏腻 隐秘 魔幻
混杂 遮蔽 野生 草根
为渺小者写的真实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生活周刊


广告
如需注册WHISPERS 请下载并致电
森那美汽车集团 劳斯莱斯授权经销商
销售电话：+86 21 6386 0288
售后电话：+86 21 5159 6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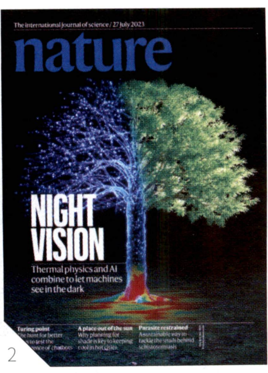


《经济学人》2023.7.22

体外配子形成

世界上约有1/6的人患有不孕症，过去45年，试管婴儿已经成为治疗不孕症的主要方法。然而，试管婴儿不仅价格昂贵、周期漫长，而且成功率不高、伤害女性身体。最近，在日本和美国的一项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将染色体植入干细胞中，再将它培育成卵子。这一过程被称为体外配子生成（In Vitro Gametogenesis）。这项研究有助于提高体外受精的成功率，并降低经济成本。











1 《卫报周刊》2023.7.21

好莱坞演员罢工

7月14日，美国演员工会宣布正式加入罢工队伍，约16万名成员停工。两个月前，美国编剧工会的1.15万名成员就已罢工了。这是好莱坞6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罢工，参与其中的不乏著名的好莱坞影星。此次罢工的核心诉求是提高好莱坞从业者的薪资待遇与工作保障，并建立有效机制减少人工智能对影视从业者的冲击。

2 《自然》2023.7.27

人工智能的夜视能力

不论机器人还是自动驾驶汽车，其正常运作的关键是能够感知周围的环境。在光线充足的时候，人工智能几乎没有任何运作障碍，但在黑暗中常常会“碰壁”。为此，科学家们研发出一种叫HADAR（热辅助探测和测距系统）的工具，它能将热物理学和红外成像与机器学习相结合，比传统的热成像设备具有更高的精度，可以让人工智能在漆黑的环境中精准识别物体，从而大大提高人工智能的夜视能力。

3 《新科学人》2023.7.22

人类如何思考

科学家认为，有五个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包括内在语言、内在视觉、感觉、情绪、感官意识和非符码化思维（不包括文字、图像或符号体验的明确思维）。人们在思考时会综合运用这五个方面。另外，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更可能是一种“受控幻觉”，即感知并不根据现实生成，而是根据大脑的预测形成。

4 《新闻周刊》2023.7.28

游戏的作用

近年来，涵盖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和发展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证实了游戏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游戏不仅是儿童学习、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成年人和老年人增强创造力及社交活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游戏能让大脑充满多巴胺和催产素等让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并触发神经生长因子的释放，从而促进人类更好地学习、吃饭、睡觉和社交。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也做短视频了？
去瞅瞅
扫码关注
B站三联编辑部
三联生活周刊视频号
绘画：范薇



30 封面故事

讲述南方

潮湿 黏腻 隐秘 魔幻
混杂 遮蔽 野生 草根
为渺小者写的真实





封面摄影：张雷

2023年第32期，总第1250期，2023年8月7日出版。



绘画：老牛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天猫旗舰店
微信书店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刘畅 Liu Chang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李振宇 Li Zhenyu
王荻 Wang di　陆佳杰 Lu Jiajie
姚贺梅 Yao Hemei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杨雪梅 Yang Xuemei　嵇晓萌 Ji Xiaomeng
李涛涛 Li Taota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 + 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　海：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　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7427853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　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 (0451) 8838290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055155
长　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　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　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　津：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 (022) 87080096
河　北：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311) 83035788
新　疆：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82055352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扫描二维码直接
下载中读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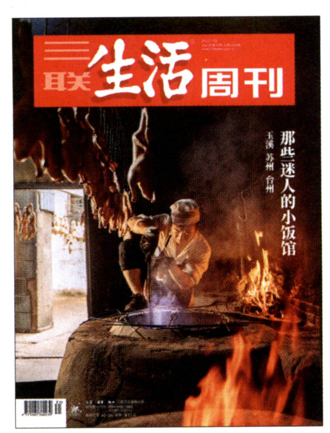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2023 年第 31 期，总第 1249 期

那些迷人的小饭馆

已经有 5 年没有出省追寻美食了，馋了就看三联的“年里美味”，每一本过一遍，就当“品”了。这期的文章一看，发现不出门不行了，玉溪没去过，台州只路过，苏州倒是去了两次，只是当时重点放在了看景。俗语讲：“看景不如听景。”但是食物恰恰相反，只有自己尝了才能知道算不算“美食”。所以，下江南，要安排！（@嗨）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给捡垃圾的阿姨介绍工作

像每个小区一样，我家楼下也有一个捡垃圾的阿姨。她看起来 60 多岁，但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就是偶尔我下楼扔快递纸箱的时候，正赶上她在我们那栋楼下的垃圾箱找废品，我会直接递给她，她会向我道谢，然后我也简单地招呼一下。

因为这几次照面，她给我留下了印象。前几天业主群里物业发通知，说小区即将开始垃圾分类，需要垃圾分拣员，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她。

可是我不知道她住哪栋楼，加上我怕物业很快招满分拣员，就想了一个笨办法——增加去楼下扔垃圾的频率。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天的晚上我终于遇到了她。我赶紧告诉她关于垃圾分拣员的招聘情况：一共招 6 名，要求年龄 60 周岁左右，薪资 2800 元，有意外险，高温费 1200 元，工作时间上午 6 点半到 8 点半，中午 12 点到 14 点，下午 18 点到 20 点半，工作内容就是把送来的垃圾根据要求分拣归类。

我看到她很感兴趣的表情，又告诉她报名的时间、地点，担心她的家人不同意，还顺便提醒了一句，可以和家人商量一下。阿姨向我道谢，说明天就喊另一个平时一起捡垃圾的熟人去报名。她还指着小区后面不远处的村庄告诉我，她就住在那里，我这才知道她不是小区的居民。

我所在的小区属于刚需型楼盘，是很多外地工薪家庭的落户首选。顺着阿姨给我指的方向走一公里，是一些目前不太可能被拆迁的村落。小区里捡垃圾的人不多，三四个阿姨，她们以翻捡纸箱和饮料瓶为主，阿姨说一个月能卖 500 ～ 700 元，家里还有一亩地种些蔬菜，够日常开支了。她也不需要帮子女带孩子，这个垃圾分拣员的工作很适合她，工作时间和平日里差不多，赚得比过去多些，缺点就是需要经手的垃圾会比过去多。

我所在的城市从 2019 年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后来由于疫情原因没有很好地执行下去，我住的小区属于郊区，是最后的执行区域。小区实行垃圾分类，对于我们居民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就是扔垃圾的时间、地点被限定了，至于繁琐我也没有切肤之感，毕竟不用自己动手去分。设立分拣员，我估计也是物业猜到，要是让业主自己把垃圾分类，执行起来反而混乱而无效。

过了一周，大概是分拣员招好了，准备工作都就绪了，物业在业主群里发通知，从第二天起不能在楼下扔垃圾了，需要把垃圾拿到专门设立的分拣小屋。第二天我去扔垃圾时，恰好看到那个阿姨在那里分拣。一个垃圾站点要容纳 200 户人家的垃圾，算起来工作量是蛮大的。熬过夏天，阿姨的工作或许会轻松些。

（读者 王露露）

本期截稿时间：7 月 31 日 19 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在这里
陪你读懂
生活
LIFEWEEK
三联生活周刊
公众号
三联生活周刊
发消息
消息
视频号
服务
给孩子花钱，我们太不理智了
危险的赶海，原来是传销团建
保洁阿姨，大隐隐于办公室
扫一扫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

以色列 | **反对司法改革**

7 月 24 日，以色列议会批准了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全面改革司法机构的相关法案，对最高法院否决政府行动的权力进行了限制，引发了新一轮大规模抗议活动。








VOLVO
CATERPILLAR
CAT
HITACHI

美国 | **印第安文化展**

（右图）7 月 29 日，纽约皇后区的农场博物馆举行印第安原住民的传统“帕瓦”活动，来自美国多个部落的印第安人相聚在一起，与当地居民分享自己的文化。



澳大利亚 | **鲸鱼搁浅**

（左页上图）7 月 26 日，近百头长鳍领航鲸在澳大利亚西南部奥尔巴尼的奇尼斯海滩集体搁浅。26 日上午，已有 52 头领航鲸死亡，工作人员试图将剩余 45 头送回深水区，但 26 日傍晚，这些领航鲸再次全部搁浅。

希腊 | **在建桥梁垮塌**

（左页下图）7 月 23 日，希腊西部靠近帕特雷市的一座在建桥梁发生垮塌，事故造成 1 人死亡、8 人受伤，图为救援人员在现场工作。

虾价跳水，小棚养虾的科技狠活儿

文 · 邢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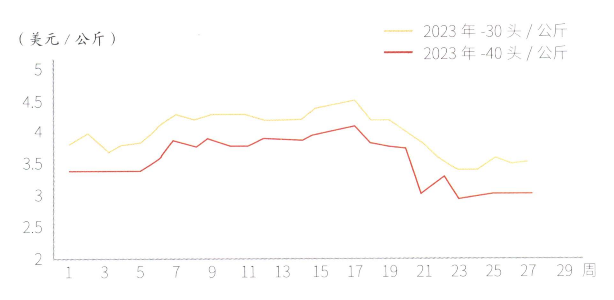
5 月后，海虾的价格大跳水。高高在上的大对虾，突如其来地跌落到凡间了。以 40 头规格为例，4 月下旬各地的对虾平均塘头价格约为 29.5 元 / 斤，到了 7 月初已跌至约 17 元 / 斤。俗话说“秋吃螃蟹，夏吃虾”，可这个跌幅，已经不是季节性因素可解释的了。

市面上平常能买到的虾分多种，有基围虾、明虾和南美白对虾等。南美白对虾，因为海水淡水均可养殖、温度适应性强、不挑食、抗病能力强，又易于加工保鲜，为养殖者所青睐，我们平常吃的虾，绝大多数都是这一品种。南美白对虾虽然名字冠以南美，除了厄瓜多尔大量养殖，亚洲也是主要产地。

虾价下跌刚好与日本福岛核废水倾入海洋的时间重合，于是有人警告核废水的恶果显现出来了。实际上，5 月南海开始禁渔了，6 月渤海和黄海也休渔。我们能吃到的海虾绝大多数都是养殖虾，即便最顶级的南美厄瓜多尔白虾也是养殖的。要吃到野生的海虾，尤其在内陆地区几乎是没有渠道的。

大虾为什么大跳水，找寻表面上的原因，可以顺藤摸瓜，摸到政策上的一个变化。5 月 11 日，中国与厄瓜多尔签署了自贸协议，对大多数商品双方相互给予零关税待遇。而此前，鲜活或冷冻南美白虾是按照货物到岸总值的 10% 征收进口关税的，熟制南美白虾则按照货物到岸价的 15% 征收关税。协议签署后，关税归零，中国消费者购买厄瓜多尔白虾就省下了一笔费用。中国是厄瓜多尔白虾的最大进口国，5 月份厄虾出口突破 10 万吨，中国吸收近 7 万吨，同比大增近四成。

厄瓜多尔白虾价格暴跌



相对于国内的养殖条件，厄瓜多尔白虾虽然也是土塘养殖，可基本上是海水养虾，环境自然，养出的虾鲜美 Q 弹，壳薄肉厚，是虾中上品，堪称虾界“白富美”。即便是虾中上品，到了 7 月份，厄瓜多尔白虾的价格，每公斤 20/30 只报价 4.10 美元，合人民币每斤 15 元，每公斤 50/60 只报价 2.9 美元。这个价格比疫情期间因发现冻虾携带新冠病毒而滞销的时候还要低，养殖者已经入不敷出，大赔其钱了。

按厄瓜多尔水产养殖商会的声明，价格下跌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其他市场消费量的下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南美白对虾生产国和主要贸易国，2022 年全球南美白对虾产量约 550 万吨，我国产量约 180 万吨，进口量 81.8 万吨，消费量超 240 万吨。按照发展势头，预测今年全球产量将达到 600 万吨，且增量大多来自中国。这就使人惊奇，我们靠什么能养那么多的虾？

答案就在江苏如东，一个紧邻上海的海滨小县。大约十几年前，这里的养殖户开始尝试一种小棚养虾的模式——在塑料大棚里挖土塘、塘中 24 小时不间断地充氧、工厂化尾水处理零换水、流水线式的虾苗供给、应用动物蛋白饲料、及时检测检疫，一系列探索和尝试把这个海滨地带变成了小棚养虾的天下。据报道，如东小棚养虾秋茬白对虾平均单棚产量达到了 2000 多斤。一个小棚长 40 米、宽 9.5 米，占地不足一亩，一年可以养三茬虾，一个棚一年轻松赚 10 万元。小棚养虾赚钱的消息不胫而走，珠三角的养殖户又摸索出快虾养殖模式，高水平养殖户 40 天养出 40 头虾，冬棚亩产达到了 1500 斤。小鹏养虾在全国沿海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产量如火箭般地提升，其实去年已经显示出产量大增、价格下跌的苗头，今年供过于求大爆发了。

可当养殖户们努力科技赋能的时候，工厂化养出的虾，除了能够提供蛋白质，还有自然生长的虾的口感和味道吗？



栏目插图·范薇

“城中村改造”，“棚改 2.0”？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中村改造指导意见》，针对超大特大城市启动新一轮“房改”。城中村改造和历史上的棚改，不同点多于相同点。在区域上，棚户区改造是针对全国的，其中尤以三、四线城市为重点。资金上，棚改以货币化安置为主，导致三、四线城市房价暴涨。城中村改造以改造升级为主，不会货币化买断城中村房屋。

民企 31 条

继 2005 年发布支持民营经济 36 条措施、2010 年发布鼓励民营经济的（新）36 条措施、2019 年发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 28 条措施之后，7 月 19 日，再有 31 条措施发布。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超过 1.18 亿户，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5000 万户，占企业总量的 92% 以上。民营企业解决了 80% 的就业问题。

充电超级贵

上海的公共充电桩电费涨价了，尤其是午后上涨幅度比较大，以前 1.15 元，现在涨到 2.05 元。另有媒体采访后发现，郑州充电桩集体涨价，23 点至次日 7 点的谷价电费 + 服务费已经从原来的 0.45 元上涨至 0.73 元，涨幅达 62%。充电桩用户很多是出租车司机，电费涨价蚕食了出车利润，他们大呼吃不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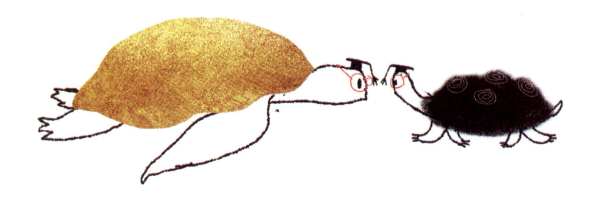
AI 下一个“杀手级应用”

近几个月，随着 AutoGPT、BabyAGI、AgentGPT 等 AI 代理（AI agent）的相继出现，人工智能 AI 代理集体涌现，或代表了 AI 的突破方向。它是一种 AI 智能体，通过自主决策和行动完成任务，比如“制定我的财务预算”“预订晚餐”。时下，智能终端通常执行非常具体、定义明确的任务，如开机、浏览、输入指令等，自主 AI 代理却能完成更模糊、更“大”的指令。



大众入股小鹏

大众汽车以 7 亿美元入股小鹏，以每 ADS 15 美元的价格收购小鹏汽车约 4.99% 的股权。当日小鹏股价最高飙涨 40%。在合作的初期阶段，双方计划面向中国的中型车市场共同开发两款大众汽车品牌的电动车，相当于老牌车企向造车新势力买技术。汽车行业加速向电动化转向，中国车企虽小，却占据了赛道优势。



留学费用大涨

汇率、通胀加上有意设限，英国的留学费用今年再次上涨，外国留学生的学费比本土学生高了 6 倍，读一年水硕都要 70 万元人民币。与之类似，美国本科公立大学的学费为 9000 ～ 1.4 万美元 / 年，顶级私立大学要 6 万～ 7 万美元 / 年。去美国留学，一年的费用保守也要 50 万～ 60 万元人民币。“不出国网课留学”模式将结束，2023 年留学仍升温。

“最强”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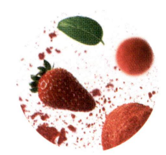
经历了兑美元汇率跌破平价关口后，欧元在短短一年内迅速恢复强劲，距离去年最低点已累计上涨超 15%。若以欧元有效汇率指数——将欧元与其贸易伙伴国的货币进行比较的指数来看，欧元在问世的 20 多年里从未如此强劲过。欧元强势，原因是欧洲央行实施了史上最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一旦通胀放缓，欧元就没理由继续上涨了。



热浪为何让人疲惫

全球许多地区都在经历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段时间。不少医学专家对此提示，在高温天气下，感到疲惫并不只是心理作用，而是身体在警告我们减少活动。一般而言，人们对于高温的耐受度不如对寒冷天气高。在低温下，身体可以通过发抖、提高运转效率来保存核心部分的温度，高温则会对器官造成严重的损伤。在高温下，人体中的更多血液会流向皮肤，肌肉会因供血减少感到疲乏。在进行剧烈活动时，重要器官则可能缺血，大脑也会认为高温下完成同样的工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让我们感到疲惫的原因还有睡眠不足，已有研究证实，气温越高，人们在夜间的平均睡眠时间就会越少。

好消息



草莓的益处

美国营养学会年会上发表的一项临床试验表明，在 35 名 66 岁到 78 岁的受试者中，每天食用 26 克冻干草莓粉的老人认知处理速度提高 5.2%、血压降低 3.6%、总抗氧化能力提高 10.2%。草莓包含许多生物活性化合物，对大脑和心脑血管健康都有益处。



改善心衰患者健康

《美国心脏病学会 · 心力衰竭》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在 12 周的时间里，心衰患者的健康状况随着每日平均步数的增加而改善。这项研究还表明，随着可穿戴设备的普及，手机和智能手环等设备产生的物理数据有潜力作为临床研究工具。

坏消息



塑料颗粒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婴儿食品塑料容器在经过微波炉加热后会释放出大量的塑料颗粒，在一些情况下，每平方厘米的容器会释放超过 20 亿个纳米塑料颗粒。研究者还发现，当人体暴露在高密度塑料颗粒环境中，肾脏细胞最容易受到影响。



孕期营养和糖尿病

维也纳医科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在历史上的饥荒年（比如 1939 年）出生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早一年或晚一年出生的人的两倍多。据研究者解释，这是因为母亲在孕期的营养不良影响了胎儿的基因，这类人群患其他代谢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有所增加。

在做有难度的事情时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听播客，长远来看不会让工作变得能够忍受，只会让你更加相信它们是只有你走神时才能忍受的工作，结果你既无法完成任务，也无法吸收播客的内容。工作时多干活的办法是专注于其中一项，让其他的都等着。

——英国科普作家奥利弗·伯克曼，《别再多任务了》

明清时候，女装流行的领式变为立领，对颈部的包裹愈加严密，还发展出以金属制作的“对扣”装点在领口，在不能展示身体之美的情况下，以贵金属和奢华的宝石来映衬女子容颜，当然也彰显其财富和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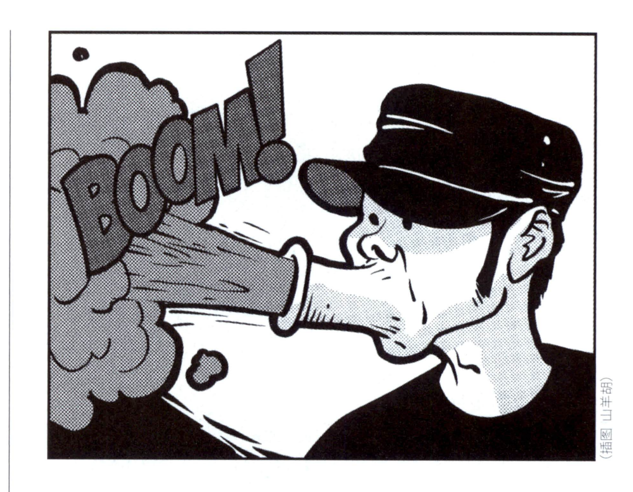
——顾凡颖，《历史的衣橱》

在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被诬告和公开羞辱之后，奥本海默事件给所有科学家敲响了警钟，那就是不要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站上政治舞台。这才是奥本海默真正的悲剧所在。他遭遇的一切也损害了我们的社会开诚布公讨论科学理论的能力，而这正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根基。

——美国传记作家凯·伯德

任何能够教小孩爱上阅读的读物都是好的，包括超级英雄漫画和《疯狂》杂志。但是，高中语文课应该避免教授在世作家的作品，而是要强调经典作品。年轻人会很自然地被当代人吸引，但他们不会主动去读莎士比亚或乔治·艾略特、惠特曼、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华盛顿邮报》书评人迈克尔·德达，《平装还是精装？二手书还是新书？》



（插图 山羊胡）

在复杂的环境中，人们会麻痹大意，会故意跳过一些明明记得的步骤。毕竟，在很多复杂的过程中，某些步骤并不总是那么重要。飞机的升降舵一般来说总是处于解锁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其进行检查纯粹是浪费时间。清单似乎能帮助我们防范此类错误。它们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些必要的步骤，并让操作者明白该干什么。这不仅是一种检查方法，而且是一种保障高水平绩效的纪律。

——哈佛大学教授阿图·葛文德，《清单革命》

数字

554.88
吨

今年上半年，全国黄金消费量为554.88吨，同比增长16.37%。其中，黄金首饰消费368.26吨，同比增长14.82%；金条及金币消费146.31吨，同比增长30.12%。

10
%

欧洲旅游委员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今年夏季和秋季计划前往地中海沿岸地区度假的欧洲游客比去年同期减少10%。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数日来持续高温，保加利亚、爱尔兰、丹麦在欧洲游客中的受欢迎程度显著上升，旅行者有意寻找天气更凉爽的目的地。

24
年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同时拥有不吸烟、不酗酒等8种健康习惯的男性预期寿命平均延长约24年。不爱运动、滥用阿片类药物和吸烟对寿命的影响最大，会令死亡风险上升30%至45%；精神压力大、酗酒、饮食习惯不健康、睡眠卫生习惯差等分别会令死亡风险上升约20%；缺乏良好的社会关系会令死亡风险增加5%。

冰箱

文 · 一风堂　图 · 谢驭飞



近日，一位闺蜜说许久未见，想见一面。我原本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约在外面，吃个饭看个电影，没想到这次她想约在家里——意图一展她婚后突飞猛进的厨艺。对此，我嗤之以鼻。我是一个苦出身的孩子，很早就开始料理家事，对煎炸炖煮了然于胸并颇有心得，和那些婚后才开始恶补的温室花朵有着云泥之别。抱着“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的心态，我欣然赴约。到了她家，一开门就是厨房，我看见案板上躺着两条一尺多长的东星斑，那“指点江山”的手就默默地放下了。这么高级的玩意儿，我没接触过。

因为插不上手，我一边和闺蜜寒暄一边欣赏她家的冰箱贴，然后很自然地过渡到欣赏冰箱的内部。韩剧《我叫金三顺》里，三顺给情敌熙珍送粥，打开对方冰箱后发出了“果然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她们的冰箱总是空荡荡的”这样的感叹。看在闺蜜“大出血”的分上，我很想借机夸上两句，但打开冰箱后，内部拥挤得如同早高峰地铁二号线的场景让我哑口无言。

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和性格，可以去看看他的冰箱。冰箱包含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是极其私人的领域。一个人可以用化妆和服饰来扮成另外的样子，却不会刻意去伪装自己的冰箱。透过表象看本质，冰箱里储存的食物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比如冰箱里全都是蔬菜水果，这个人大概率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冰箱里所有的容器都是纸制品，主人极有可能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储藏的食品是否齐全，可以看出对生活是否充满热情；如果分类摆放整齐，可以看出对方是一个细致的人；冰箱上的装饰物也可以说明主人是一个注重细节或重视家庭的人……

听完我的一顿灌输，闺蜜让我分析分析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望了一眼她手里紧握的刮鳞刀，微笑地告诉她：你是一个好人。

公司里也有冰箱。记得入职第一天，我就被冰箱里的各种酱惊住了。什么牛肉酱、黄豆酱、八宝酱、烧椒酱、蒜蓉酱、黄灯笼、油辣子、榨菜酱……以前换过很多工作，冰箱里大多是甜点、饮料和水果，鲜有酱料之类。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和父亲分享了新公司的槽点。父亲夹了一筷子菜告诉我：新公司的人蛮会过日子的。原因是在老一辈人眼里，酱这个东西是用来压饭的。只有酱料的浓重味道可以让人一口一口地把白米饭往胃里填，省去买菜的钱了。

同事们有多会过日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公司这台冰箱没人清洗味道甚重。只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同事会每半年擦一擦，放点柚子皮什么的。有一天，老板因为茶水间有水渍而恼火，遂命人事部门安装了摄像头。那位同事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宁可跑到卫生间盛水，自己在办公室烧水来喝，之后再也没进过茶水间，更别提清洗冰箱了。

奇怪的小不点儿

文 · 莫幼群　图 · 谢驭飞



亲子时光看起来是漫长的，让每个父母都有一种“熬”的感觉，但终归是有限的。而这有限的时间，通常用来讨论一些无限的问题。

这其中包含了无数个“最”，只要爸爸说出一种事项，提问总会接踵而至，叫人招架不住。比如上街望见一幢高楼，三四十层吧，那么中国最高的楼是什么、世界最高的楼是什么、宇宙最高的楼是什么……这时候你就必须快速拿出手机，在网上即时搜索。带着一个充满好奇的五六岁孩子进行知识散步，没有智能手机是万万不能的。大约总得等到更好的知识大模型出来，老父亲才可以交差。

所以我以为，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一项常青的事业，也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只要有孩子，这份事业和产业就将长期存在下去。无论呈现在纸书上，还是绽放在 ChatGPT 里。

小孩子的脑袋瓜原本就是“宇宙初生”模式，因此特别善于理解那些漫无边际的问题。比如，我就很轻松地对儿子开展了宇宙大爆炸学说的启蒙。甚至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在宇宙起源方面，不会再有另外的学说，更能让孩子易懂并且坚信的了。因为接近童心，所以逼近真理。

难道不是吗？最初最初最初的时候——此处用“时候”其实也不严谨，因为时间和空间都没有诞生——就是一个无比坚实的小不点儿，密度趋向于无限大，突然它发生爆炸啦，于是时间在蔓延、空间在扩散……对于这样奇怪的小不点儿的故事，人类的小不点儿们理解起来一点儿也不费事，并且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嘴里还会不停地发出“砰、砰、砰”的叫声，就像大爆炸发生在身边一样。

还有“黑洞”，它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个漫长的黑夜。至于黑夜，孩子们既害怕又着迷，所谓“怕中生智”吧。他们往往能给自己插上想象的翅膀，经由自己特别的通道，几乎身临其境般地在黑洞里逛上一圈。

据说，以色列的孩子放学回家后，家长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你在学校里向老师提了什么样的问题？曾经，我们都是“以色列的孩子”。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向那些伟大的科普著作致敬，比如苏联作家米·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等人编写的《动脑筋爷爷》。特别是后者，如今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科普著作，一个白胡子、戴眼镜的爷爷，仿佛知识魔法师，把“小天真”和“小问号”的问题统统消解。

动脑筋爷爷，还有绘本《爷爷一定有办法》中的爷爷——这两位爷爷，奠定了孩子对于人类知识和能力的信心，让人类的孩子感到既温暖又踏实。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自由组合

GEORG JENSEN Fusion 系列戒指以几何曲线勾勒出上中下三层，相互咬合的边缘形态，组合在一起时18K 黄金、白金与玫瑰金交织，密镶钻石的中层呈现出藤蔓之姿，分体时每层亦可独立佩戴。

测速计表盘

BR 03-94 Multimeter 计时表的中置计时秒针可搭配表盘上多个彩色刻度圈，测量速度及心跳次数，右方橙色为脉搏计刻度，绿色为呼吸计刻度，浅绿色、浅灰色及白色三圈测速计刻度则覆盖全表盘。







随身手账包

万宝龙手账包的皮质触感柔软，外侧特设的笔夹构造，兼具美学风格与收纳功能；搭配大班系列冰川白特别款经典墨水笔，其白色树脂和蓝色PVD 镀层饰件与包身的暖砖红色相称。



沉浸式聆听

Beats Studio Pro 改进的内部组件包括更高级别的音频保真度、自适应主动降噪和通透模式、支持动态头部追踪技术的个性化空间音频，以及通过 USB-C 传输实现的无损音频。



轻量化折叠

BROMPTON T Line 车型的钛车架韧性好、耐腐蚀，重量与全钢版本相比减轻了 37%；采用 TIG 焊接技术连接车架，确保轻盈坚固，可选 One 单速版或 Urban 四速版。



夏日材质

BIRKENSTOCK 全新 EVA 版本 Boston 鞋款，柔软度极高的 EVA 材质带来了轻盈、耐磨和防臭等特性，鞋体的一体成型设计更易清洁。

静谧深蓝

RIMOWA 季节限定系列行李箱的金属沟槽式设计为北极蓝色带来深邃之感，内部配备的专利可调节式隔板与专利压缩系统，在容纳更多旅行必备品的同时，确保物品始终井然有序。





黄钻项链

Graff Graffaulous 项链在珠宝制作过程中使用了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38 颗黄色钻石经扫描后用树脂打印出精确的模型，由铰链和支架组成的镶嵌底座用于突出宝石的强度和美感。

金色麦田

小麦是 Les Blés de Chanel 腕表的设计主题，黄色蓝宝石和钻石形似麦穗，环绕着榄尖形的镶钻表盘，100 多颗黄色蓝宝石组成的手链象征着金色麦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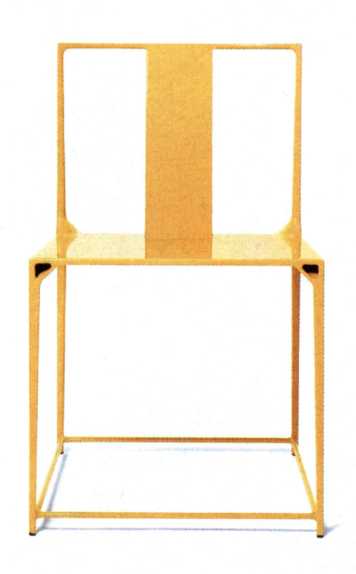
基本形式

Hay PC 无线便携灯强调简单的基本形式，郁金香形状的白色灯罩提供漫射照明，圆柱形黄色底座结构紧凑，台灯的电池续航时间长达 10 小时。



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制作的 Popus Marlo 咖啡桌，亮黄色上漆桌面结合曲线造型，体现出上世纪 70 年代的复古风格，珍珠形状的模压桌腿尤其引人注目。



偏移的同心圆

Raawii Minos 陶瓷挂钟由一系列相互偏移的同心圆组成，每个同心圆有四个断开的缺口用于指示时间，黑色指针在凹凸纹理的钟面投下明显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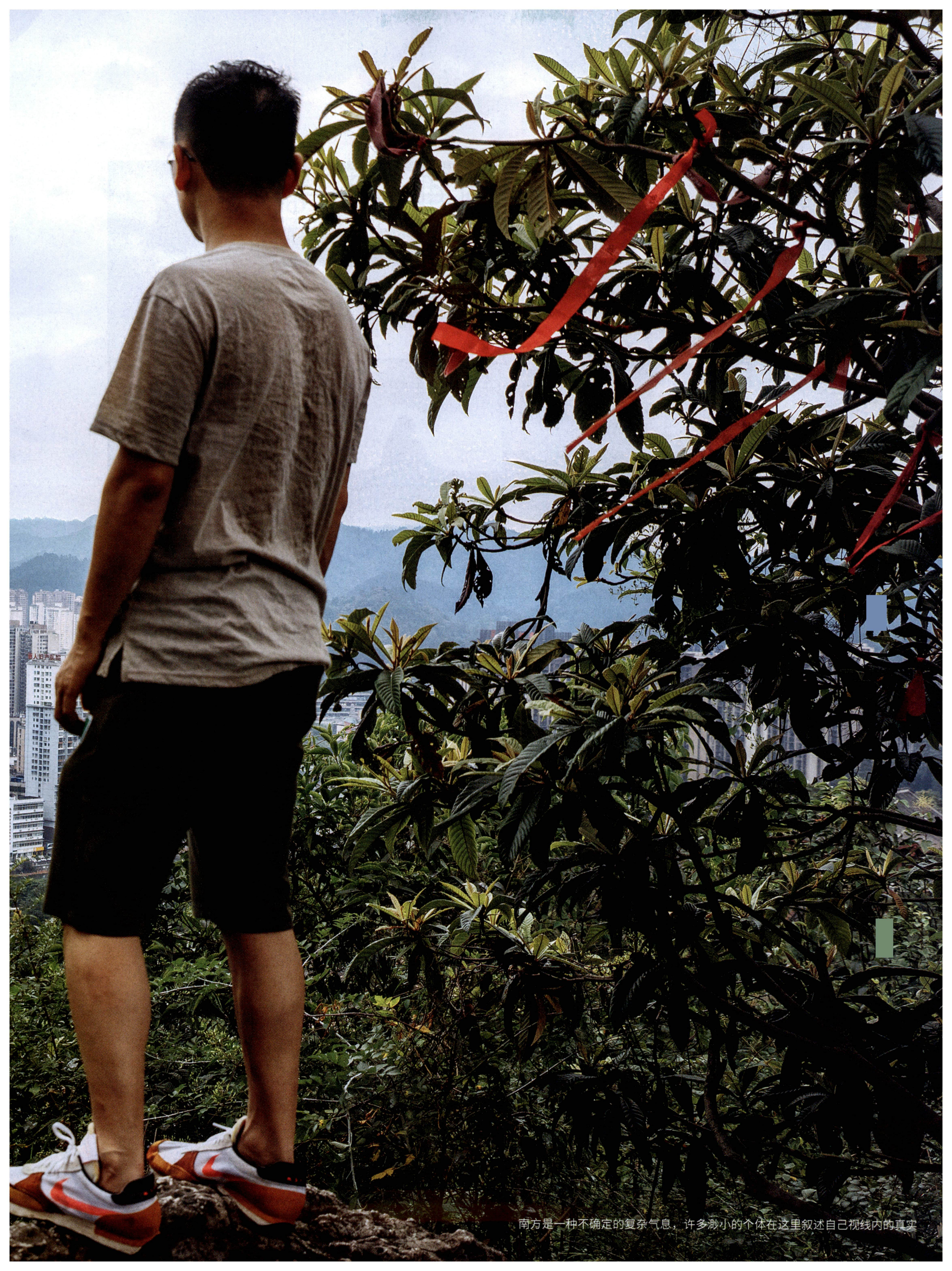
碳纤维官帽椅

Shang Xia 大天地系列椅子的原型来自明式南官帽椅，轻盈坚固的碳纤维材料取代传统木材，连接柱脚部分转化为镂空结构，它的重量只有同等尺寸木家具的五分之一。



讲述南方

潮湿 黏腻 隐秘 魔幻
混杂 遮蔽 野生 草根
为渺小者写的真实



南方是一种不确定的复杂气息，许多渺小的个体在这里叙述自己视线内的真实


（张雷 摄）

荔湾老街附近，总有新与旧的同框，嘈杂的、突兀的、充满活力又伤感的

记者 · 孙若茜

在连续两天的暴雨间隙打开窗，可以立即遇见一个北方的“南方”。雾气、潮湿、黏，书页一合上就卷成一排波浪，猫粮疲软得咬不出嘎嘣的脆响。云压着楼顶，一切都被揉成灰扑扑的一团，只有植物的绿变得更浓了，闪着光。

我们开始经历越来越多南方经验扑面而来的时刻，它由台风送来，由持续异常的高温带来。另外一些时候，它是“背着手，在亚热带的酒馆，门前吹风，晚了就坐下，看柔和的闪电”（《路边野餐》），是跟着《宇宙探索编辑部》到西南腹地寻找外星人的踪迹，是在看完《狂飙》后想吃一碗猪脚面……作为意象、景观、空间和抒情性的“南方”，在文学、影视、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中被反复地征用，直至这两年里正在形成一种能够辨认的文化现象。

在这当中，我们头脑中固有的“南方”，和重新觉知到的“南方”不断地发生碰撞——南方正在被重新讲述。

于是，我们向南出发，寻找这南方文化浪潮中的一些个体，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的写作者林棹、林白、朱山坡、林森、彭建斌，以及导演饶晓志和编剧王一通。他们的故事如何长成，又欲指向何处？他们在用何种姿态，什么声音讲述？他们和从前的讲述者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想要更加切近地认识他们笔下、镜头里的“南方”。我们在采访中意识到，如同东北写作群体的被关注，当下对于南方文化元素的凸显与讨论，同样是在一种强烈的地方认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地方空间、地方历史被年轻一代重新赋予意义，在它背后，是这个时代人们对于复杂的身份认同的寻找。

我们虽选择跟随创作者前往这些省地，却并非是在标注地理意义上的南方——“南方”并非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如评论家李敬泽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所说：“南方是在复杂的相对性空间关系中被不断重新发现、发明和指认、建构的。这样的南方甚至超出了地理边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南方是流动的南方，是不断重构的文化和知觉构造，是不断被勘探、被创造的南方。”“对于南方的再发现和再想象，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对我们自己的再发现、再想象。”

南方是流动的南方

——专访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

记者・孙若茜

对于南方的再发现和再想象，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对我们自己的再发现、再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近两年，我们观察到南方元素在文学、影视以及音乐领域被大量地使用、凸显。在你看来，它成为一种值得讨论的文化现象了吗？

李敬泽：作为意象、景观、空间和抒情性的"南方"，不仅在文学中，在影视、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中，被大规模征用，这确实是这两年里能够清晰辨认出来的一个现象。我前天看《长安三万里》，在商场随便吃点东西，就看到有个店专卖猪脚面，当然就想起了《狂飙》。由于《狂飙》，猪脚面成为一个南方意象。还有电视剧《隐秘的角落》和最近的《欢颜》，都是对南方的凝视，凝视南方的风俗、经验、场景乃至地方性的历史脉络。如果我们在一个南北结构里观察当代中国文化，那么南方在主流的、大众的想象和感知中如此引人注目地显影，这的确是一个新的重要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一旦开始讨论南方，总会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南方在哪儿？南方永远是相对北方而言的，但如何划定、聚焦？

李敬泽：有些事习惯成自然，以至于意识不到它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比如从《禹贡》开始，从华夏文明早期开始，中国人的空间结构就是东西南北中，这和世界其他文明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地理结构，也是历史、文化结构——也是知觉和心理结构。在天下之中的北京，家里挂个画都说，东边高一点、西边低一点。说句开玩笑的话，中国人发明指南针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东南西北，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会心慌。但是，这种东南西北的空间结构在历史过程中也是不断变化的，涉及文明的地理空间的扩展，也涉及经济文化的消长变化。的确，南与北是相对的，春秋战国时南方基本在河南南部、湖北、安徽、江苏一线，浙江都是南方之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不同。楚辞里是满天满地的植物，繁茂密集，一读就能感觉到这是亚热带地区；读《诗经》，那就是疏朗开敞。南与北、东与西的问题，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中国艺术史和美学精神史的一个基本结构，这个结构是动态的，至今还在变化。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不断地互动生长、相互推移，不仅打开新的地理空间，也打开新的文化空间，推动新的想象力和感受力的生成。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从春秋说到魏晋南北朝，说到近代，说到改革开放，南与北、东与西历经演变，到现在也依然是经济、文化上的一个结构性动力。总而言之，不能就南方谈南方，南方是在复杂的相对性空间关系中被不断重新发现、发明和指认、建构的，比如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黎紫书《流俗地》那样的书写是不是广义上的南方写作？我觉得是。这样的南方甚至超出了地理边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南方是流动的南方，是不断重构的文化和知觉构造，是不断被勘探、被创造的南方。从历史上看，这种南方的再发现、再建构曾经多次起过非常重要的、革命性的文化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现在"南方"在文化中成为一个问题？

李敬泽：通常我们会把中华民族的发展理解为线性的时间过程，我觉得我们不妨也把它看作一个复杂的空间演化过程，空间不仅是一个摆在那里的自然地理构造，它也是大规模人类活动的结果，被人的活动和观念、想象力所塑造。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巨变，也体现在国土空间的重构，包括地理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空间重构。现在我们讲粤港澳大湾区，这仅仅是区域名称的变化吗？当然不是，它是对一个新空

间的规划和想象。新空间出现，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自己所生息的空间的重新认识，重新发现，意味着新的知觉结构和想象力、行动力。从附近、在地，到远方，到总体性的中国和中国文化，都会由此生产出新的意识和新的感觉。

在这种东南西北大规模的空间重构中，一切都被连接起来，都加入了感觉和经验的交换洪流。山河永在，但空间关系变了，人在空间中的相对感觉变了。所谓“相对感觉”特别简单，就是过去你要从北京去一趟江门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儿，现在三个小时你就到了。在这个过程中，空间已经高度折叠和压缩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空间意识的改变带来了什么？

李敬泽：这个折叠的空间被各种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重新赋予意义，比如我们单拎出一条因素——旅游，这个因素不大。但你想想这是多么特殊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40年前不能想象的。无数中国人穿越着地理空间，仅仅为了经验和体验的交换，文旅局长很忙啊，每一个地理空间都努力投入到交换中去，这是文化的交换、风景的交换、想象的交换、影像图像的交换。它一定会带来风景的商业化和想象的平均化，但同时，当一个地方作为一个自我表现的主体时，它也一定会带来地方性因素的复苏、觉醒，人们会发现乃至发明创造这个地方性。

其实不仅是南方，现在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就是一种强烈的地方文化认同，地方空间被历史化，被重新赋予意义。这当然同时也表明，地方或者故乡，以及与地方和故乡相联系的特殊经验，正在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复杂的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来自哪里、我属于哪里、我何以是我。所以，地方性的文化表达常常会伴以回望的、怀旧的、乡愁的抒情基调。比如以东北为背景的小说和影视。

人们担心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会不会带来地方性的泯灭？当然有这个问题，比如标准化的现代化想象使城市景观趋同，但另外一方面，风景的流通交换、地理空间的折叠压缩，可能会驱动人们自觉地打开一个地方独特的文化空间。在我们这个时代，和以往不同的是，过去的地方性是在地理条件和人类经验的交互作用中自然地积累形


（蔡小川 摄）

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

成的，现在的地方性一定是在一种总体性意识和图景中的地方性，是一种自觉的建构和创造，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冲动，它最终与其说是指向地方本身，不如说是为了进入更大的空间，参与总体性的流通和交换。

三联生活周刊：上一次，南方元素集中地进入到大众视野是在什么时候？和现在的南方文化现象有什么差别？

李敬泽：上一次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的南方文化浪潮，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港台文化浪潮，从流行歌曲到电影、电视剧都对市场条件下大众文化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是把港台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经验接受的，它是自带普遍性的异质经验，它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它指向时间，那是未来，是一代青年的远方——被时代所应许的空间。艾敬当时有一首歌，唱遍大江南北，“1997，快点到吧”。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真的去过香港，香港其实不是作为一个“地方”被认识和想象的，它是一个华丽的能指，但其实无具体所指，我们在其中置入我们自己的梦想。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南方会在这个时代被再发现、再创造？怎么理解所谓的重新发现？

李敬泽：现在，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南方，依然有着面向世界敞开的遥远或喧闹，但同时你会注意到，它又有了一种大地尽头的寂静自省。山西一个作家孙频，才华横溢，她移居广东，写了一本书，叫《海边魔术师》，你会发现，在那本书里，人们停留在海边，或者说，让自己悬停在一个遥远而寂静的地方。也就是说，南方在当代文化中正经历着一种多义性的生长，它是前往，它是停住，它是开放，它是自省，它在当代想象中曾经是未来，现在它也正在寻找和捡拾自己的过去。像五条人的音乐，是对广州的、珠三角的地方性的重述，过去二三十年难以名状的经验化为声音，是混杂的、嘈杂的、突兀的、充满活力的又是伤感的，在这里，一种城中村的地方性有力地切入了普遍的、整体的知觉结构。再比如林棹的《潮汐图》，从广东独特的前近代经验出发，构造一种语言、想象、知觉的奇观，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地方性想象。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地方性注定是一种“世界的地方”，注定包含着离开和前往、在和不在，注定要内化为自我的身份和体验问题，地方是风景，按柄谷行人的说法，风景是主体的投射，风景包含着精神和意识的“内面”。

这种地方性的发现和表达，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潮流，你刷刷抖音就知道，无数中国人在这广袤国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在自我表达，这种表达中，我和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互为表里的。我认为这是伟大的文化运动，是人民对“吾土吾民”的大规模浏览、辨认和领会，是在文化上塑造自己和自己的土地。传统中的地方性建构和表达主要是精英的，比如修县志，那是地方士绅的责任和权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草根和民众自己在展现地方性风景，表达地方性记忆。所谓的“新南方”恐怕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认识，在草根的、民众的经验激活之后，获得一种新的视野。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表达中，再发现和再创造的意义是什么？

李敬泽：比如五条人的歌，一方面是地方性的，另一方面是城乡接合部的，是杀马特的，它打开的这个混杂空间是对我们整体性经验的有力的扩展和命名。我刚才说，地方是世界的地方，地方更是中国的地方，这些年，思想界的热点是“何以中国”，在世界中确认中国的特性，“何以地方”必定汇聚为一种“何以中国”的新的自觉，这既是个人和群体身份意识的自觉，也是文化上的自觉。一个时代的创造力在于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的地方，在这种认识中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宽阔。

回到新南方，以广东为例，我们原来有一个历史图景，1840年以前大门是关着的，但实际上广东地方性的历史经验要复杂得多，你看《潮汐图》，它在地方记忆里构建出的一个高度混杂的新的想象场域，包括岭南的、世界的、海洋的，激荡流转。广东在前现代直到近现代就是流散的出发地，改革开放以后，又成为无数人迁徙流散的目的地。这样一个迁徙的、流散的和奔向远方的经验，是南方经验，也是宽阔的中国经验中没有被充分表达的区域。对于南方的再发现和再想象，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对我们自己的再发现、再想象。



作家林棹

林棹 辨认风从哪来，自己从哪来

记者 · 孙若茜　摄影 · 张雷

我想知道是什么将林棹推向了 19 世纪初的广州，也想知道当她走近怀揣“蓝蔼蔼的珠江”“珍珠灰海皮商馆”“十三支旗杆”“花船”“罟仔”“舢板”“鸬鹚”等那一切的时代时，她将提笔写作的那个 2020 年的她安放在哪儿。

星期四的上午，我站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门口，眼前是挤满木船的绵长江岸。船帆让水面显得拥挤，舢板倒是能给视线腾出些空间，望到对岸。水面算得开阔，但船只都不大。风领航，风也引导着船靠岸。作家林棹站在我的旁边。一个星期前，我们约好 7 月初这两天在广州碰面，她由深圳来，我从北京去。之所以在广州，是因为她的小说《潮汐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书里写鸦片战争前，一只巨蛙上了珠江疍家渔船，又被苏格兰博物学者养在广州十三行、澳门，最终在欧洲一教授家中的澡盆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

出发前，林棹问我都有哪里想去。我没什么主意，想要她带我去的是那些曾经让她的脑子里发出“叮”一声的地方，“叮”一声之后写出了某个人、一段话、整个故事，“叮”一声地走进了记忆里的某个角落，“叮”一声就去到了书中的 19 世纪 20 年代。我不奢望一路上都叮叮作响，但希望能接近、辨认，怎样的行走观看可以触发那些声响。

只有一个地方，我额外提出想去，因为小说里的那幅画面纠缠了我很久。书中写十三行里的画师冯喜带蛙去黄埔看大船：“一人一蛙，立在洲头上任江风吹，看白艚、米艇、老闸、公司商船。”“冯喜靖遠街翩翩公子，不介意同流沙怪胎做朋友。”他与蛙的对话中有这样一句：“两个生埗人初相逢——不是在路口，就是在港口——他们立定，交换世界。世界在路口港口相逢，似乞儿王缝起百衲衣。”世界在路口港口相逢，这里自然会是最理想的文学空间，广州最吸引林棹之处恐怕也正是这种港口属性，在《潮汐图》聚焦的时代，这也是唯有广州才有的特性。

林棹用手指抻开手机屏幕上的地图，戳中长洲岛上一个点——冯喜和蛙当时就站在这儿，她说，“不过我们已经没法去了”。曾有一次她走到附近，被“闲人禁入”的牌子挡了回来，那儿如今是块“重地”。他们俩立在洲头，是 200 年前的事了。

我们俩，还立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门口。200 年，千帆过尽，甚至我眼前的水面也早就该被柏油马路推远，不得不隔着人民高架桥眺望西堤，根本不可能看到一点儿珠江的影子，来往不息的是车，帆影都只在书里，街对面的高楼挡住全部视线。小货车里塞满成箱的手机，电动车的后架上绑着成捆的衣服，如今十三行连成片的高楼，是硕大的服装批发市场、电子通讯市场。这工作日，车流拥滞，电动车耐不住性子地穿梭。“十三行路”的地名还在，林棹说“地名是一种化石”。她曾经也被这化石吸引而来，明知道街道面目全非，却认定在任何空间存在过的人或事都会留下气息。除此之外呢，哪里是时间的入口？

把耳朵露出来，就知道风从哪儿来了

在《潮汐图》里，林棹总是写到风，每一处都写得让人惊艳。她写“风跑。夏季正午的日头晒热了风，晒臭了风的汗。风闻着像江底泥”，写“风吹碎桅杆，似吹散一撮鸭绒”。

有一天，我们走到黄埔古港的一段水边，路到了尽头，终于有理由立定和风交手，也因此聊起了风。为什么总写风？理由简单，帆船时代如果没了风，没有了人对风的发现，船就没了力气，没有那些因风和帆带来的各种交集，广州也许就是另一番模样，现有的一切可能都不再成立。

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在海上耕作的疍民还是随着商船远道而来的水手，每一个生活在水上，





上、下图：夏日正午黄埔古港水边，渡口的树荫下是水边人家最好的信息集散地

或将营生放在航线上的人都无比关注风、在意风、依赖风。在那个时代，风所能牵动的情绪，是立在岸边的我们无法获取的经验。

林棹需要具身体会，专门跑去学驾驶帆船。她得到了一种直接且新奇的体感，完全不同于我们乘坐马达船、渡轮或者公园里的鸭子船。我想知道她和风最初的交往模式，她就把披散着的长发别在了耳后，说："把耳朵露出来，你会对风变得特别敏感，头向两侧来回转动，这样就能知道风从哪里来了。"而那些更有经验的水手，靠脸就可以判定风的方向。

这种感知方式，原始得就像辨别方向时连指南针都抛弃，只依靠太阳。我想起林棹在书里写"水手在虚空中摸，渐渐地，摸出了风"。水手都是靠身体去感觉风的。摸出风是为了掌帆前行，因此与风的关系变得真正切近——风决定你能否启航，能去哪里，以及前行的速度。

林棹说，站在船上向着大海出发时，除了惊奇还有恐惧，恐惧来自船行进的速度之快以及海水的颜色逐渐加深。学习的过程并没有真正的危险，为了保证安全，只要浪尖有一点点翻白，教练就不允许学员们出海了。但教练们却偏爱风大些的时候扬帆，甚至连台风都不躲避，他们聊起风时，关于从山上下来的风、海湾里回转的风等，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潮汐图》里还有这样一句："水手将风径的秘密代代相传。"

我问林棹，驾帆船出海的实际感受和她学习前的想象差别有多大。她说，在学帆船之前，她其实并没有做什么想象，肉体的感受无从想象。那么，当身体与风进行过真正的较量之后呢？在林棹的笔下，风有了形状。她写："风吻水。风长久地吻水，使它老了、起皱纹。

等到密密麻麻木船遮起水面，风一滴水也沾不着，就生气。风使劲打木船里人仔。”写：“帆又升起来。风躺进帆里睡觉，帆就受孕。帆大大地隆起了。帆分娩，船滑进港口。”

还好“地名是一种化石”

我们住在了沙面岛上的胜利宾馆。广州十三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烧毁后，英法盟军迫使清政府填筑西南边的沙洲，也就是今天的沙面岛，作为新的租借地。因此，领事馆、洋行、教堂、网球场……沙面至今保留着最接近十三行样貌的建筑群。

下午，我和林棹在岛上闲逛。起初就顺着沿江西路走，有一段路左手边簇拥着灌木，右手边是灰扑扑的水面，我不知道就算打开所有的触角能抓取什么，也许走路本身就是意义？林棹说，她经常会用的一个笨办法就是“走”，通过走路搭建起对空间的想象。她会依循某本日记——某个外国人某一天的流水账里，有时就记录着他如何沿着我们脚下的这条路，一路前往天字码头的老法场旁观一场行刑。从某个建筑行至另一栋建筑，从某条街道穿到另一片区域，日记里写着他全部的所见所闻，脚步所及的一连串地名。

还好“地名是化石”，林棹就按照撰主的路线走，老旧的地名容易让人对时间的痕迹抱有幻想和期待，但通常什么都没有，因此这种走与小说落笔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她乐于体会步速、视角，以获得另一时空的空间体积。

宽窄、体积，用处在哪儿？林棹提到《潮汐图》里有一段讲冯喜在澳门学徒的时候住在詹士的家里，写：“冯喜常在夜里听见隔壁女主人（一个壮实的番妇）抽打一名叫保禄的黑奴。黑奴保禄哭号声之强韧，可以穿远去一直撞到风顺堂钟上。”她去过那住处的原址，那房子不在了，但仍保留着的街道的宽窄，决定了此前那房子和邻居之间的距离，可以推理出住在里面的人是否能在夜晚听到隔壁的响动、声音清楚到什么程度，以及当他打开窗，他能看到什么，视线十分逼仄还是可以放得很远，能不能看见黎明天亮，这些都在影响他每天的生活。

绕回岛心的建筑群中后，我们进出了几条窄巷，多半是两栋楼之间的缝隙。但凡遇到，林棹总会很想溜进去。我跟在她后面，角角落落使劲看，对我而言那像是一种搜寻，像第一次闯进一个游戏关卡，并不知道自己要找的宝物在哪儿——细长的木瓜树上？砖缝的苔藓里？或者通往下一关的密钥就是要猛吸一口不小心踩爆的黄皮散出的清凉气息？也许还是该掉头回去。但木瓜、苔藓、黄皮的香气，不舍得丢，都似塞进了口袋。林棹的口袋塞过些什么呢？快走到一条窄巷尽头的时候，看起来是有路可向左拐的，结果我们撞上墙。榕树细密的气根扎在墙里，墙皮破败脱落，与它形成拐角的楼上开了一扇窗。林棹说，如果她写窗里的人向外望去，一定会写到他的视线要绕过



沙面至今保留着最接近十三行样貌的建筑群，如今也是广州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那些角落里的根须。一路上，我们又往“口袋”里塞过木质楼梯上的花纹，教堂院墙上水位线的刻法、不同颜色的百叶窗，岛上住家楼梯上花盆排列的队形，等等。

林棹笑自己好似有收集癖，就像出门时旅行箱里一定要装很多东西才能感到踏实。这种收集，也包括对于物种的认知、名称的揽纳之类。《潮汐图》里博物学者将物种在不同大陆间转运，做标本生计，既是当时当地的生活方式之一，也正是她博物学兴趣的一个出口。她关心人对待动物的方式，胜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如何对待其他物种，可以同构出一切权利关系，又变成一个入口。而那些日常里俯拾即是，像我们在窄巷就可随手“捡到”装进口袋的“宝物”，因心里盘算着最终会用在写作中，变成了写作能将她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都填满的意义。

一个傍晚，我们去了海鸥岛，为了等待更柔和的光线拍照，我和林棹，还有我的同事、摄影师张雷站在开阔的狮子洋岸边放空。林棹的手指向远处一棵细瘦的树，说，它叫伯劳，是吃肉的鸟，青蛙、老鼠，有时还吃别的鸟。我上下左右挪动视线，才发现树顶的绿叶之间落了一个白点。其实对错我是根本无从验证的。就像带着无数知识盲点进入了她的小说，作者再巧妙的铺陈也未必都能看得出。林棹也并不在乎，她认定写了什么和读出什么完全是两码事。

张雷说起在福建宁德采访时，见到一木拱桥边的大圣殿里，工匠在每个房檐内侧都悄悄雕只栩栩如生的公鸡——既展示技术精湛，又不想过分地外露。如果有人走过，仰头寻着它，一定会惊叹。但位置极隐蔽，一般人发现不了。林棹感慨自己特别能理解那工匠的追求，自己也是同样的人。

《潮汐图》开篇就写：“我是虚构之物。我不讲人物，因为我根本不是人。”这是巨蛙的独白。它会说几种语言，认得十几个字，它好奇、善变、怕死。它并不是现实中某种已知蛙类的巨型版本，故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它死掉，又被魔法复活。在如此飞扬的设定里，为什么林棹在书中写下现实的细节，“茉莉 · 钟斯的墓碑小小的，缅栀子花瓣离开多岔的道路落在上面”。林棹说，她去过东印度公司的基督徒墓园，那里至今都有一些无比高的缅栀花树，树的高大，使林棹猜出它经历过的时间，因此确认当她的笔落在一个 19 世纪初的故事中时，缅栀子花是会落在墓碑上的。

林棹说，蛙虽是虚构，但她笔下时间具体到年代，地名具体到街道，因此例如去确认 1830 年的某处是否有 A，或是否没有 B 就变得十分必要。这是一种来自现实世界的限制，限制越强意味着与现实世界的相连越紧密。它们也不存在于资料里，资料有时并不解决问题，反能带来更多疑问。当然，小说也正是要带着疑问前进的。在写《潮汐图》时，林棹读了不下 300 本书，之后她一次次带着问题去到现场——哪怕所谓现场以一种近乎隐身的方式存在。那些确认、发现，让她感到安全。因此她才在写作时一再地拿着老地图，对照着旧时风景画追逐珠江。

我读到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一个观点，他讲我们永远是从断裂中看到历史，人生的特质也是断裂，如果过于连续，我们的生命就没多大意义。但同时人又追求连续，对于激烈的变化是让人感到害怕的，我们总是不停地抓取连续的东西获得安定感。所以，人们总是想着我的此刻和过去有什么连接，有哪些部分是一样的。这里的“安定”并不等同于林棹口中的“安全”，我们想抓取的与过去的连接，与作家一角一角地搭建出有实感的空间或也不同。但这其中又似有些相通之处。

我想知道是什么将林棹推向了 19 世纪初的广州，也想知道当她走近怀揣“蓝蔼蔼的珠江”“珍珠灰海皮商馆”“十三支旗杆”“花船”“罟仔”“舢板”“鸬鹚”等那一切的时代时，她将提笔写作的那个 2020 年的她安放在哪儿。

被时间抽掉的词

在十三行博物馆陈列的一只广彩花蝶纹圆碟和一只广彩花蝶昆虫纹碟前，林棹告诉我，这都可算是触发她写作的开关。这纹碟上的昆虫与蝶，是西方博物画和东方写意的混合体。以我的理解：它们是熟悉和陌生的混合体，模糊了远方和近处，因此带来某种惊奇。至于《潮汐图》，林棹提到过另一个关键的“打火石”——一本 1824 年的粤英词典《通商字汇》。她说那是“一口方言生态缸，一个幽灵魔盒，其中最生猛强劲的词破壳而出，啸叫着，胁迫

我开辟一段时空供它们称霸”。它既贡献出那些被时间抽掉的词，还能提供许多词与物间的互联和失联，对于林棹而言，那就是让她向自身的来处回看。

前几年总有人谈“普通话霸权”“普通话入侵”，我生长在北京，虽然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但假使前者对后者“入侵”恐怕还是很难识破，所以感触不深。这次在广州，往返机场的出租车司机是两个河南大哥。据说，广州每两辆出租车里就有一个是河南人。河南大哥说，之前在广州当的哥可不容易，得先好好学粤语，听不懂说不溜那就等于没了耳朵和嘴巴。现在，能听懂就行了，其实听不懂问题也不大，广州人能说普通话。林棹的姥姥家就在广州，家门前的路上有几个凉茶铺。说起来，从小到大她都看着装满凉茶的大铜葫芦摆在街边。凉茶铺的店主原本是讲粤语的，这几年，她也听着他们的普通话说得越来越多。

林棹家里的语言环境有些复杂，她的爷爷和姥爷是北方人，爸爸妈妈出生在潮汕。妈妈青少年时代就在广州度过，在不同的生活场合里会讲不同的方言——卖东西的摊主是潮汕人她就讲潮汕话，摊主是客家人那她就讲客家话。回到家里，一切节日礼仪都来自北方，爷爷和姥爷多年不改北方口音。但家里电视机，很少会拨到北方的频道。

离林棹最近的语言是粤语，上小学的时候，同学在学校里几乎都讲粤语，潮汕家庭的孩子也一样，只有很少的几个从北方来的孩子讲普通话，但听得懂粤语。在孩子们还不太懂事的年纪，方言就已经将他们私下分成了一个个小团体。我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溪》里读到过这样的段落：“在我就读的咸水城小学，粤语就像一把凉凉的精钢筛子，机械地晃。说不好粤语的北方小孩从网眼漏下去，啊——惨叫着，坠入黑漆漆深渊。精通粤语的南方小孩呢，在筛子里成群结队地跳呀，抖呀。说不好粤语的北方小孩只能跟说不好粤语的北方小孩做朋友。每个班级都有两三个北方小孩，很自然就玩在一起，尽管他们可能彼此憎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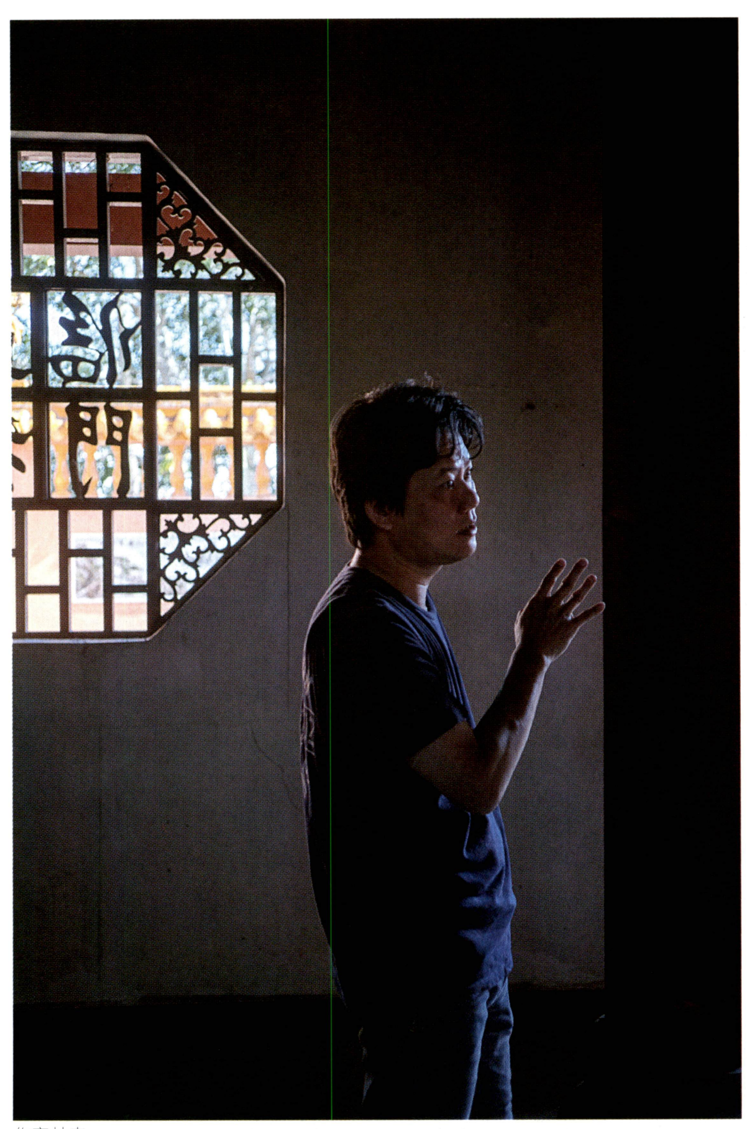
书中还写：“在九〇年代的咸水城，‘本土’常常沦落为‘土’——‘土’，是咸水城青少年的大忌。土很微妙。要警惕土。咸水城以北都是土。以南呢？香港完全不土，海南岛倒又土了，东南亚却不那么土。普通话是土。不标准的粤语是土。省城粤语比香港粤语土。潮州话土，客家话土，但没有普通话那么土。康夫土，大雄则不土。冇有是土，冇是不土。”

粤语在《潮汐图》里称霸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后三分之二因蛙离开广州，环境里再听不到粤语，林棹才转换了语调。初读的时候，粤语字词对我也是“啸叫着”的，像“乸”“孖”之类，有的字理解意思其实并不难，比如书里写到“乸”时是说：“水上一半乸、一半公：月是乸，日是公；风是乸，雷是公；蛤是乸、虾是公……”论谁都知道那就是“母”了。我也喜欢它们的字形，比如“孖”是双人舞，“乸”看起来就像一艘扬帆的船。可我猜不出它们读什么。偏偏我是个要让句子在心里发出声音才能读取内容的人。因此，我的阅读就像一列火车，咣当咣当地颠顿前行。林棹说，这很像她去北京刚到第一天时的感觉——也不是真的听不懂北京话，但又的确有些吃力，黏稠的连读和儿化音总是让她需要两三天的时间磨磨耳朵，适应适应。说起去北京，林棹第一次去时三岁，再去已经是三十几岁的事儿了。北京使她感到陌生，去时的秋天加重了陌生感。她看到北京街道上的树叶变红或变黄，那是南方的植物少有的颜色。红墙黄瓦也是同样的色调，连阳光都是金色的。南方一年到头扑满绿色，非常绿。可北京又能让她感到熟悉，与她其他的城市经验混在一起。她出生在深圳，读书在成都，在上海居住过，大城市的生活对她而言有着太多相似之处。她也因此才要在《潮汐图》里回到19世纪初——她要去现代性发生之前寻找地方化，其中当然也包括回向过去的语言。

有位广东作家跟我说，林棹写的粤语他有时也是看不懂的。我赶紧现学现卖，解释说那书里的很多用法属于清朝。比如有一个词是“霞气”，意思其实是“蒸气”，她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能听见它，大概也没多少人能听懂了。遇到这样的词，即便是生活中会使用粤语的读者，也需要问问他们的长辈，爸爸妈妈不懂，就再问爷爷奶奶。林棹会为此高兴，因为他们一旦问到，那词就会在某个人的记忆深处唤醒情感联结，即便那个人不是她的直接读者。还说“霞气”这个词，有一次林棹去到马来西亚，在用粤语和一个当地的中年人聊天时，对方用了它。林棹当时很想说：“你这个词好老啊！”又怕对方听不懂，就忍住了。可她的心里当时是炸了一朵烟花的。

林森 到了北方之后，南方出现了

主笔 · 薛芃 摄影 · 金海



作家林森

深藏海南内陆的小镇，在以往的文学与历史叙述中很少出现，它们被海滨的阳光沙滩或是下南洋的故事所遮蔽，它们是怎样的南方小镇？

北方的生活经历给来自海南的作家林森提供了重看南方的距离，“只有在外部世界的衬托下，本土性才会凸显出来”。

下午 2 点，热得无处可躲。当地人说，此时的 7 月中旬算不上海南酷暑的顶点，真正更热的时候是 4 月到 6 月，白天暴晒下流出的汗一直黏腻到夜里，从早燥热到晚，时间好像停滞了一样，感受不到温差。到了 7 月，太阳落山后，海风是能吹来凉意的，夜晚很舒服。可中午两点，依然躲不过极致的暴晒与酷热。

林森带着我们爬到农村老家的屋顶上，是个四层小楼，村里的高点。虽然海南农村的“空心化”不比内陆严重，但林森家中的年轻人也都离开老家去了更大的城市生活，家里只有父母常在。好在儿女都在不远的城里，回来得勤。老宅总没人住，通向屋顶的楼梯落了厚灰，像走在雪地里一样，灰尘中能踩出鞋印。再不留神，会踩到一只死去的小麻雀。

老宅的北面，南渡江流过。这里是南渡江的中上游，水面不算那么宽，但沉积物多，深且险，到了下游入海口处，河面就宽敞了。站在老宅屋顶，村庄、河流、茂林、远山都在眼底。另一侧，水泥灰瓦和芭蕉林间，几座琉璃瓦屋落在其中，让人一眼就看得出，这是村里既昂贵又隆重的几座房子。在海南，走在乡间路上，每个村子都会冒出几间这样华丽的宗祠。这些年海南大兴房产，有些村子住宅都拆光了，但祠堂是不能动的，经常能看到在一片商品房的间隙，几座琉璃瓦祠堂还守在那里。虽然拆迁户也有相应的拆迁费，但若祠堂一拆，心里就没了底，不踏实。

烈日正盛，村里没个人影。没人会

在这个时间在路边闲逛，只有几只鸡瞎跑。镇上也是，空空荡荡的，房屋也显不出影子，有种不真实的末日科幻感。祠堂院门的门牌下，有个两平方米的阴凉地，只有那里有三两个人乘凉，是晒稻谷的农民。下午5点过，店家往街铺边洒些水，把路面的温度降一降，桌子摆出来，卖菜的、卖茶的，清补凉、粉面铺，都出了摊，一天好像才刚刚开始。

林森从小在村里和镇上长大，街坊邻里全是熟人。小镇上发生点啥事，很快就传遍了，听到耳朵里的时候已经真假难辨。“小镇上的秩序，是一种原生的混乱。”老家枝节盘错的人与事，成为他写作的起点。

小镇故事

“不是每个海南人的儿时记忆里都有海的样子。海边的人与海岛中间的人，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林森的老家在瑞溪镇，隶属澄迈县，距离最近的海边有三四十公里。

林森早期的小说，写了很多瑞溪镇的事，最典型的一个故事就叫《小镇》：老潘是镇上杀羊的，老客人都认他，他有两件自豪的事，一个是杀羊的手艺，另一个是有两个从小有出息的孙子。他有个老哥们儿，叫黑手义，在镇上开茶馆。老潘上了年纪后，一直过得不错，不过孙子慢慢长大，离“有出息”越走越远，先是一个把女同学肚子搞大，再来一个染上了毒品。后来，儿子又因帮人销赃了偷盗来的车，被判入狱。在这期间，黑手义一直多多少少帮衬着。老潘重新操刀杀羊，带着孙子一起干活，但在儿子出狱前，儿媳重病去世，另一方面孙子的毒瘾反反复复，老潘成为镇上人们闲言碎语的对象。

老潘人生中的每一个悲剧都是被动发生的，带着强烈的宿命感，他没得选择，儿孙犯下的错他都不得不间接承担后果，除了杀羊，他似乎从没有主动选择过什么，他的人生是被推着走的。而小镇上的人大多如此。

这个小镇是林森最熟悉的上世纪90年代的瑞溪镇。镇上的普通人，像老潘这样的人，可以有别的人生选择吗？或者说，他们能摆脱宿命吗？深居海南内陆的小镇，在以往的文学与历史叙述中很少出现，它们被海滨的阳光沙滩或是下南洋的故事所遮蔽，它们是怎样的南方小镇？

80年代初出生的林森，在成年之前，几乎没出过小镇。村里是农耕生态，但他也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见到海是什么时候了，印象中，见得不多。海洋对于海南岛内陆的人来说，很近又很遥远，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地方，但在公路修通之前，去趟海边是件奢侈事。很多同龄人，直到十几岁才第一次看到海，在他们的童年生活经验里，与海洋最直接的接触是日常的海风，以及台风。一年会有几次大的，而海洋本身像是个幻影，他们触及不到海水与沙滩，祖辈也没什么人出海打鱼，可面对这些却又习以为常，因为他们是岛民。

瑞溪镇的人，没有对海洋的依赖，反而因为南渡江流经小镇，他们更多有关水的记忆是有关江的。南渡江是海南岛最大的河流，始于白沙，斜贯岛上的中北部，最终在海口市流入琼州海峡，“海口”便是南渡江的入海口之意。

从前镇上有很多录像厅，因为离香港近，镇上很快就能看到最新的港片，比大陆的内陆城市更优先。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录像厅还没那么普及，林森冲着最新的黄飞鸿，第一次走进录像厅，播正片之前，还插播了一小段日本情色片，这一刻，他意识到躁动的青春期来了。那时候，镇上年轻人都穿梭在录像厅和台球厅之间，手边还拿着一本盗版的武侠小说，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闭塞小镇，正在被新兴文化的荷尔蒙撞击着。后来，每家茶馆都配了录像机，满街的男女老少一边喝着五毛钱的绿茶，无限续杯，一边看着武打片、黑帮片。黑手义的茶馆就是这样一个茶馆，老潘是他的常客。

与此同时，赌场、毒品也在侵蚀小镇，小镇没法跟上迅速的现代化进程，感官上的刺激与金钱的诱惑让小镇的秩序变得更加混乱，人们交织在一个被人情堆叠的熟人社会里。林森早期写下的不少故事，都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林森清楚地记得，在老宅的院里，为了帮助堂兄戒毒，他的父亲亲手焊了一个大铁笼。关在铁笼里，人像一只被圈养的猪，定点喂食。毒瘾严重的时候，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发作一次。《小镇》中老潘的那个孙子，就有很多这位堂兄的投射。其中有一段写道：

毒瘾每次发作，他都头痛如裂，根本睡不着，李堂清就直接开了一盒安眠药，让陈梅姑叮嘱他按时吃。有一次后半夜，宏亿发作得案首，趁着没人，解下裤腰带，朝桌子上一甩，套住那瓶药，拉过来。盒里还有二三十粒，他倒得满满一手掌心，好一会儿后，他手一甩，药粒撒满地，手摁太阳穴，在笼子里无声地抽泣。

镇上稍有些阅历的人，几乎每个人都能回忆起一些当年关于毒品的事，他们看着身边人吸食、坠落，庆幸自己抵挡住了猎奇心。

林森的写作是从这些混乱无序的青春记忆开始的。后来，在《小镇》的基础上，他把这个故事扩展成了正式出版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关关雎鸠》，写老潘与黑手义祖孙三代的兴衰。在这些小镇故事里，很难找到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限，几乎每个人物都有原型，每件事也都似曾相识地发生过。林森讲述着他的人生经历，我听得有点恍惚，分不太清哪些是真实发生，哪些是小说的文本。

还是有很多快乐记忆的。镇上有个五层楼的建筑，一楼是农业银行，林森读书时，晚上总在那个楼顶睡觉，他喜欢躺在屋顶上，四面都是风，抬头有星夜。每个夜晚，小镇上的屋顶好像能连成一张大床。他总在小说里写屋顶睡觉的桥段，这里是现实之外的飞地，少年在这儿幻想着未来与外面的世界。

出逃与回归

今年林森 41 岁，作家之外，现在还是《天涯》杂志主编。编辑部在海南省省委院子里，有很多年了，最近要搬新家，林森正在张罗着给新编辑部简单装修一下。

现任《诗刊》主编李少君曾任《天涯》主编，是杂志的元老。他告诉我，《天涯》是一本海洋式的文学杂志，吞吐性很强，只要是通过文字输出的，有关哲学、艺术、诗歌的讨论都会包括，这与创刊人之一韩少功庞杂的个人趣味相关。这块阵地影响到几代海南的文学青年，林森就是一个。

在 2022 年底出版的最新一本短篇集《书空录》里，林森第一篇写的就是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个杂志编辑，一个有名的无名者，我的恶趣味是编一本全是废稿的杂志——在这本刊物里，一切标准都是颠倒的，言辞不通，标点混用，错漏百出，所有的表达都饱含硬邦邦的粗俗和低劣的煽情，这个杂志叫《0》。一旦刊发了谁的稿子，谁就在这世界上没存在过。故事里的很多细节都是林森做编辑的经验，其中难搞的老头也是从现实里搬运的原型。但故事架构在幻想之上，是个超现实的讽刺故事。

林森进入《天涯》工作已有十四五个年头。而更早的时候，他还在天涯社区短暂工作过。与“天涯”的渊源，得从出岛说起。

高考那年，全国扩招，林森考取了一所山西的二本大学，工程力学专业。爷爷高兴坏了，在村里大摆宴席。去山西报到没几天，他逃了回来。到现在他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回来，只能隐约地归结为“适应不了北方”。

北方，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他人生里，但时间太短。复读，再高考，林森考进海南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不过家里会算命的亲戚说，水会改命，这个专业好。他开始在网上写连载小说，在学校编辑民刊。那段时间，诗人多多从荷兰回国，在海南大学教授诗歌，给学校里的文艺青年们增添了几分精神信念。一直以来，海南写诗的人都多，比写小说的多得多。本地诗人自己开玩笑说，海南的天气实在太热，没法静下来写小说，最多写写短篇，长篇太熬人了。反而是写诗容易，半小时就琢磨出来一首，是适合这种燥热天里的创作。

但林森还是喜欢写故事。李少君记得，他在论坛上读到《北门》，觉得有意思，这是林森发帖连载的小说，也算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长篇。“北门”就是海南大学的北门。有一回李少君在海南大学做讲座，两人便结识了。



南渡江流经瑞溪镇，是傍晚散步纳凉的好去处

后来，林森去《天涯》实习，毕业的时候，实习报告写的是编辑部的经历，跟水产养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没进《天涯》工作，换了几份不靠谱的工作后，他进了天涯社区。回忆起来，因为海南是边地，文化思想野生多元，也有生存空间，所以无论是《天涯》还是天涯社区，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不同声音发声的地方，接纳各种思想的碰撞。天涯社区在经营状况不错的情况下，显不出野生的缺陷，可到了这几年，经营困难，BBS 最终还是关了。

2007 年他得到一个新机会，去北京到鲁迅文学院研修班学习一年。这是他第一次北漂。第二次大约在 10 年后，也是去进修。北漂的生活，让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南方，什么是海南所在的南方。他完整地体会到一年四季的更迭，原来北方冬季满目枯枝真的如此萧瑟，二十四节气来得如此准时，这些最基本的气候差异让他感到兴奋，更不用说饮食、语言、人情、风土各个方面的差异。

海南人出岛，尤其是往北方的大陆去，留下定居的不多，他们说，还是没法适应，吃得不习惯，天气不习惯，说普通话也总得闹笑话。海南岛与北方之间有一道“结界”，不容易跨出去。出岛定居的，多是往南走，临海的岛民眼界开阔，一波一波地下南洋。岛陆里的人早些年没有南下的风气，也不北上，他们就窝在岛上。

当走出小镇、走出海南岛之后，林森意识到，没见过枯黄落叶，没穿过羽绒服，调料放小青橘，


林森小说《岛》中的原型小岛附近即将建成一个深海码头

从小很少见到海……在北方的世界里，这些海南日常反而是特殊的存在。"到了北方以后，南方才真的出现了。"林森说。他试着跳出海南岛，抽离，远观，用他者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应该写别人不知道的海南，他想写特殊性，更想写普世性。

岛与孤独

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学氛围相比，海南不算出众，虽然偏安一隅，环境相对宽松，又有《天涯》这面旗帜，但文学对于海岛生活来说依然是曲高和寡的。在本地的文学圈里，大家有一个玩笑式的共识，谁写的作品能跨过琼州海峡，被广东地区的读者看到，就已是成功的作品，要想北上，进入更主流的文学圈子，对于海南本土的作者来说，遥远得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该写什么，成为写完小镇故事之后困扰林森的难题。

大约10年前，林森听人说起一个故事。在海口西边不远的临高县大雅村海边，有一座荒岛，不大，随着潮水进退，小岛的地形和面积总在发生变化。小岛挨着海南本岛很近，对于那座孤岛来说，海南本岛就是大陆一般的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荒岛上搬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一个人住，一住就是三四十年，与世隔绝，谁都不见，在岛上捕鱼吃，自给自足，只有在最强劲的台风即将袭来的时候，他会短暂搬到岸边住几日。待台风过去，又搬回岛上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他过着独居荒岛的日子。

林森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迟迟没下笔。2017年，他又到北京进修，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制三年，集中学习一年。广西的朱山坡和广东的陈崇正也在班里，他们仨都来自最南方，聊得来，总一块玩。北方的生活经历给他们都提供了一个重看南方的距离，"只有在外部世界的衬托下，本土性才会凸显出来"。研一下学期课业闲散，他们商量着该写些什么了。在这段时间里，陈崇正写出小说《美人城》的雏形，朱山坡写下小说集《蛋镇电影院》，林森则写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岛》和一个中篇《海里岸上》。《岛》的蓝本便是那个独居荒岛的故事，这一次，他想探讨的是海岛独有的海洋性。

"下次再来这岛上，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在林森和本地作家的带领下，我们上了岛。小岛的边上正在动工修建深海码头，小岛将如何配合改建，尚不得知。它靠近海南岛的地方，是一处深入海面的小半岛，东面迎着洋流，西面相对风平浪静一些。站在岸边望去，孤岛很小，有一些植被覆盖，又有大片的滩涂，并未觉得它遗世独立，因为离岸边不远，总能看到附近高耸的商品房。小艇的马达发动起来，七八分钟就到了岛边。曾经住在上面的那位"隐居者"有一块木筏，那是他上下岛的交通工具。他因为一场冤案失去了自

由、爱人、名声，不得已住上荒岛，但其实，他的老家就在荒岛的不远之外。如今，老人 80 多岁，在医院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不知还能否再回到岛上。

“有谁见过夜色苍茫中，从海上漂浮而起的鬼火吗？咸湿凛冽的海风之中，它们好像在水面上燃烧，又像要朝你飘过来，当你准备细看，它一闪而逝。”林森在《岛》的开篇写道。沿着滩涂往岛中央走，红树林越来越茂密，一道用大火山石块垒砌的石墙隔出了自然与人为的界线，由于火山群的分布，琼北地区多有黑色火山石块散落。石块隔出了鱼塘，存放每次涨潮时带来的渔获。再往里走，是老人居住过的石屋，这几年，又有岸上家族里的人帮他修了一间水泥房。

“假设一下，你一个人在这孤岛上，面对着无边的时间和无边的空间，你怎么办？你也无法直面死亡，要活下去。在这无边无际的时间里，你只有这个小荒岛和岛屿之外无边的海洋，你怎么办？怎么打发这个时间？这个隐居的老头一块一块地垒石头去打发时间，他自己生活在这个被人称作鬼岛的地方，被人看作是制造鬼火的人，他一边对抗自然，一边对抗时间。”林森说，“这就是我想写的故事，探讨命运与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要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痛苦，而在小岛上，岛与海洋的关系将这种孤独不断放大，甚至大到成为生命中唯一的课题。”

之于鬼岛，海南岛是大陆；之于更北方的中国大陆，海南岛只是一个海洋中的岛屿。正是这样，海南人总有一种既闭塞又开放的心态，他们的退与守都依赖于这座岛屿本身。林森总会谈起苏东坡，这是一位对海南和他自己都影响颇深的人物。被贬儋州时，苏轼感慨何时才能出岛，写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没有谁不在一座孤岛上。

比南方更南

海南无疑是特殊的，它是比南方大陆更南的地方，它是海岛，深受粤地传统影响但又因独立成岛而自成一体。很大程度上，林森赞成地理决定论，这是海南之所以成为海南，区别于南方其他地域的独特性。他下意识地指了指天，“过剩的暴晒阳光，”——“我们是躲不掉阳光的，除了台风，就是烈日。这让很多人觉得海南人懒，白天就躲在树下喝老爸茶，可当外地人来到这里，但凡在户外作业，要不了多久，也会加入老爸茶的行列。在海南人的意识里，只有四季常青，没有四季更迭，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时间感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一天和一年之内的劳作秩序都不一样。”

“我读《霍乱时期的爱情》，潮湿的港口、海水泛出的腥臭气味、持续不断的暴雨，这些场景在海南都很常见；满眼都是香蕉园，植被的相似性也会带来强烈的共鸣感。我们读拉美文学，可能感受会更独特一些，一种真正属于南方的、属于海洋的相似性，放在全世界的视野里，它们都是相通的。”对于林森来说，这种相似的文学体验首先是感官性的，皮肤能否感受到海水的咸湿，鼻子能否嗅到岸边腐烂鱼虾散发的腥气，在潮涨潮落时海水激岸时声响的变化，这些体感是先于一切故事到来的。

地域性特征明显的小说中都会用大量的环境描写来铺陈，潮湿黏腻的空气、突然来袭的台风暴雨、压低的如大理石纹般的云层，等等，它们营造出强烈的氛围感，迅速把读者拉进南方的讲述中。那抽离出环境呢？如果没有这些用浓密树林遮盖的看不清周围的南方环境特质，减弱环境制造出的猎奇感，这些小说的迷人之处又在哪里？林森试图在《岛》中探索岛屿与海洋环境中的本质问题，海南的本土作家都试图在地域性之外，寻找写作中有关时代与人性的基本问题。

李少君提到，海南本土的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过三次小高潮。一是解放海南的那个时期，由于是战役的边疆前线，诞生了一批文艺和文学作品，也有黎苗族地区的采风作品，这是一段海南文学盛放的时期，在 1957 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后，达到高峰；第二个阶段是“文革”后期，一批广东知青下乡到海南，他们对原始森林和海洋充满好奇与想象，比如文学理论家黄子平就是这批作家的代表，这时还有不少本土



上图：在过剩的阳光下，海南的水稻通常可以一年种三季

下图：下坡村里的日常生活，远处的琉璃瓦房是祠堂所在



少数民族作家涌现；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在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韩少功、叶蔚林、蒋子丹等作家相继来到海南，他们打开了年轻人的文学自觉，虽然很多作品并非写海南生活，但他们带来的文学氛围影响了一代青年，其中包括林森。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次海南文学的黄金时代，在《天涯》的影响下，林森正式从在论坛写小说的网民，转向成为一名职业写作者。

直到现在，林森之外，还有一批本土作家在写着海岛自身的故事。他们的写作，几乎都是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开始，写故乡或身边的人与事。王海雪写带有自传色彩的《无敌之年》，一个小镇女孩成为作家的故事，也写家乡较早辍学又不安心进厂的少年或青年形象；秦子积写故乡东方市淘金的诱惑与取舍；王勤写自己生活的年代的海南知青故事；还有更早成名的作家崽崽，写海口的城市生活，等等。如果近来被不断讨论的“新南方写作”是指在写作方式上跳脱出传统叙述方式的“新”，用一种更解构、更微观、更内省的文字表达来写作，那他们未必有那么“新”，但如果这个“新”是在地域性的深探与拓展上，那么他们的写作维度足以拓宽读者对海南及海岛生活的认知与想象，这些诸多切口，打破了海南与大陆、与北方的结界。

宗祠与故土

不久之前，林森刚写完“海洋三部曲”的第三部《心海图》，这是三个中篇小说，前两部是《海里岸上》与《唯水年轻》。《海里岸上》不断在海里和岸上两个场景中切换，渔民老苏不再出海，但对海上生活念念不忘，对大海的敬畏持续一生；年轻一代进城务工，即便是出海也不再需要罗盘和《更路经》，人与海洋之间朴素的依存关系正在瓦解。《唯水年轻》讲年轻的海底摄影师潜入海底，拍摄几百年前淹没在海底的一个古村落的故事，而其中又贯穿着与水性不好的父亲之间的父子关系。

读林森的小说，无论是早期的小镇故事，还是近年的海洋系列，家族性与代际之间的矛盾和连接是他讲述的重点，人物关系往往建立在家族之中。“这种家族伦理结构，或者说是乡村的权力结构，在很多地方正在消失，甚至已经不被重视，但在南方，尤其是潮汕地区和海南还保留得很完好。所以，以前读《白鹿原》这类家族史的小说会很有共鸣，这种共鸣不来自地域性，而在于家族内部的情感连接和人物关系。”

林森一早就带我们去看村里的宗祠。宗祠在住宅边上，再往不远处去，便是祖坟。“人、神、先祖和死人是要住在一起的，天天都能看得到，这样活着的人才踏实。”下坡村有一个全村人都祭拜的宗祠，叫境主庙，林家祠堂建在旁边，还有村里几个大户李氏、何氏的家族祠堂。祠堂边，还设有一个朴素的土地神庙。每到大年节祭典的时候，从祖屋出发，到境主庙、家族祠堂、土地神庙，最后再各自回屋祭拜，这是一套完整的仪式，不能缺一环。而在日常，但凡有点不顺心的事，或是需要向神明与先祖告解的事，都可以随时回老家祭拜。虽然年轻人都去了城里生活，但老家祠堂的香火从没断过，村里总有人来来往往地祭拜。我问林森：“通常什么样的事会回来告解？”他说：“任何。”就在这天，我们恰好遇到林森一个同辈村人回来祭拜，因为他刚买了一辆新车，一来高兴地“炫耀”一下，二来求个平安。

这是海南人最深层次的情感联结。家族的代际与传承被看得很重，因此林森写故事，家族性总会成为讲述的线索之一。海边的人格外敬畏神明和先祖，是因为海洋的不确定性，一旦出海，生死难卜，岸上的人除了祈祷还能做些什么呢？《海里岸上》有一段，写老苏有一回跟船出海，摊在水面上抱着救生圈休息，“幽深的水底在一瞬间，强烈地吸引了他。他主动往深处潜去。胸口绑救生圈的绳子阻碍了他，他竟然拉松了绳结，继续往深处去。身上的水压越来越沉，呼吸也越发急促了，老苏很清楚，继续往下，就会永远留在海里了。他明明知道后果会怎样，可海水更深处，还是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眼前不再是碧蓝的水，而是闪亮的光，是金碧辉煌的海底宫殿。无数已经消失在海上的面孔，就在那宫殿里欢迎他。”后来，老苏被人救了上来，这是他这个老渔民最后一次出海，在更年轻的时候，他经历了无数海上的风浪，没有成为进入那个“海底宫殿”的人，但海洋对他这样一生出海的人来说，就是一切。而真正长时间漂泊在海上的人，四面除了海水，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极端孤独与不安的时候，唯有与家族和宗祠之间的情感联结可以成为慰藉的解药。孤船远行的渔民，依赖海洋的诱惑，更依赖岸上的牵挂。

后来，我们又去了海口东边的演丰镇，《唯水年轻》里写的海底遗迹在那里，有一些靠近海面的石雕、石柱被打捞上来，不过更多的还沉在海底。大约是万历年间，一场地震将这个村落掩埋进了海里，被掩埋的大概不止这一处，只是现在这里是可被清晰探测到的。我总试图在这些海岛故事中去寻找更个人化、私密化的讲述，就像是我们对南方的印象那般：潮湿、黏腻、隐秘、魔幻，可再个体化的讲述又怎么能脱离时间、空间与人际的架构而真空存在呢？小镇、宗族、海岛、海洋、行船，人的故事总是发生在这些时空交错的密不透风的网中，每个坐标都是一个命运的挣扎。老潘大概是无法摆脱后来的宿命的，因为他是家族中的长辈，他必须撑起整个家族，维系这个牵挂，他不会想走其他任何一条路。虽然海水会冲洗掉这些陈年往事，不过作家把它们写了下来，“海老了，唯水年轻，凡是潮刷过的也都年轻”。

彭剑斌 为渺小者写的真实

记者 · 肖楚舟　摄影 · 蔡小川



贵阳黄金路，彭剑斌跑业务时候租住的地方，临近客车站和批发市场。回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



世纪之初那种还未完全形成的南方城市生活，混乱无序，但又总在逼仄处给人留个出口。彭剑斌在肉体经验的百无聊赖中，报复似地在头脑中演绎自己的渺小。

业务员

贵阳罗汉营路，五金商店集中地，与市西河平行，附近还聚集着厨具市场、毛线批发市场。20年前彭剑斌在这里跑业务，跑业务的意思就是推销产品，他推销的产品是一家广东工厂生产的灯管和灯泡。

五金店分很多类型，水暖、电气、灯具、工具店各司其职。灯具店还分两种，他跑业务的时候不是去那种漂亮的家装灯饰店，而是去朴素的五金灯饰店。“村里的人都是直接买个灯泡回去挂在墙上的嘛。”他站在被手推车、小板凳、货箱挤占的人行道上给我介绍。

彭剑斌打断一家老板娘与熟客的闲聊，有些拘谨地问人家，街尾那家“奇利王”是不是搬走了。老板娘说是，“五六年啦，老板去做房地产啦”。老板娘的音量几乎是他的两倍大，离远一点听，像是在单方面地教训他。

彭剑斌没对老板娘承认自己是个“写小说的”，只说自己很多年前是广东灯具牌子“奇利王”的业务员。20岁到30岁，湖南人彭剑斌把很多时间花在中巴车、出租屋和小旅馆里面，辗转贵州、浙江、广东、成都，在动荡的生活里不停地书写。

这次偕家人出游，是他多年后头一次回贵州，难得大方地用掉了10天年假，像是要逃脱那个越来越把他的写作当回事的生活圈子，还魂到那个无人关心也不关心别人的小业务员身上。他把2004年到2006年间在贵州跑业务的生活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检点与倍缠绵书》。多年后，2003年，这篇文章与那段时间写的小说一起合为一本集子，构成了一个漂泊的年轻人生活的内外两面。

在遵义，作为一个业务员，他的活动范围只有车站、旅馆和门店，他记得客车站的名字叫“春天堡”，但车站已经搬出了老城区。我们坐在市中心的河岸上闲扯，他说

到有一次出差回去，刚下车就看到眼前惊慌失措跑过一个女的，后面三四个男人追着她打。“我就在那里很麻木地看着他们跑过去了，自己掉头回去了。”关于这件事他在日记里写，“可能她是该死的呢？好像她就是我，我们谁没被陷入过那种境地呢？被一种让人吓破胆的、置你于死地的力量追赶的境地。我就想象自己就是那股让人逼到死角的力量，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去帮助他们。”

我们在遵义见到了彭剑斌重要的朋友何攀——是他从网上交到的第一个文友。跑业务之余，彭剑斌在当时很红火的网络论坛“西祠胡同”发表一些练笔性质的小说或者日记，何攀看到后很欣赏。因为觉得不成熟，那些东西后来都被彭剑斌删掉了，幸好何攀把他在网上的文字全部存了下来，才有了《不检点与倍缠绵书》这本书。何攀第一次在贵阳见到彭剑斌的时候，对业务员的生活状态还挺羡慕。他那时候上高二，因为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一些浪漫的向往，于是离开学校出门流浪。在他眼里，已经当上业务员的彭剑斌是个挺滋润的社会人，拿着1000多元的月工资和每天70元的差旅补助，在省会有自己的住处，用着翻盖手机。而他自己，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高中生，只能做些体力活，搬砖、打灰、进厂、端盘子或者安装空调外机。彭剑斌领他在快餐店吃了一顿便饭，告诉他还是要回去好好读书。

在彭剑斌都对自己的写作毫无自信的时候，何攀到底被什么打动？何攀搬出一个贵州方言词：“弯酸”，类似矫情的意思。“说句弯酸的话，就是把我们那个时候的光荣和屈辱写出来了，他是理解我们底层的屈辱的，并且能真实表达出来。”他很喜欢《稻田和屋顶》，里面的“我”在田间劳作，心里想到父亲、母亲和妹妹那种辛劳、贫困又龃龉不断的生活，止不住地发泄怨恨和悲哀。何攀觉得“他一下子把生命的切肤之痛写出来了，他一边在痛苦，一边又跳出来欣赏这种痛苦”。

何攀现在已经在遵义数一数二的高中当了很多年语文老师。他在晚自习前来找我们，请彭剑斌去班上给高二的学生做个小讲座。站在讲台上，彭剑斌肢体僵硬，神色紧张，开口从“作家其实是很普通的人”开始讲，最后突然励志起来，“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想写作的同学，我觉得你只要敢这么想，只要可以把自己完整地表达出来，那你的作品就是成功的”。

出了学校，我们和何攀坐在遵义街边热气腾腾的烧烤摊上面。老板上错了菜，过来道歉，跟熟客搂搂抱抱，嘴里像撒娇耍赖一样地辩解。彭剑斌跟我说，“你看他们说话就是这样，道歉要搞得跟调情一样”。

途中的房间

在罗汉营路和市西河的夹角处，一片地摊吸引了彭剑斌的注意。那里贩卖着一些称得上是“文物”的二手物品：没了电池的翻盖手机和BB机、不知搭配什么电器的遥控器、门把手、忘记归还的共享充电宝。彭剑斌看中一只手表，叫我看看怎么样。旁边一个明显是托儿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晃晃手上金灿灿的表，“我昨天也在他这里买的，要300多，这个商场里都要卖几千的”。我一时分辨不出彭剑斌是真打算相信还是在配合表演，不知该不该捧场。最后，彭剑斌砍了两成价，满意地把那只150块、刻着歪斜“欧米茄”标志的手表戴在手上，快乐地领我们沿着河朝前走。

“我感觉这些人像小动物一样。你说贵了，他也不敢很大声说话，细声细气地辩解。如果你真的还了一个很低的价钱，他就很痛苦地把眼睛一闭，说拿去吧，拿去吧。”彭剑斌看到别人细微的痛苦，跟看见自己的一样，不自觉地要去描述，“包括我自己身上痛苦的事情，写下来就好像是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了。”

我们是在从罗汉营路去黄金路的途中经过那里的，这段路连接了彭剑斌在贵阳的两个住处——代理商的仓库和后来的出租屋。刚到贵阳的时候，他住在代理商仓库的阁楼里，和两个工人同住，不跑业务的时候也帮忙打杂，平时在老板家里吃饭、洗澡，一年多后才搬出去。

这是一片杂乱又热闹的区域，和黔灵山公园南门相距不远，地势离奇地复杂。最下层是浅浅的市西河，河岸足有十来米高，露出崎岖不平的崖壁。主干道地下的通道兼作商场，向无数方向



彭剑斌的大学同学许多都跑过业务，长年在市镇间奔走

延伸。彭剑斌记得当年这里流行售卖一种民族歌舞影碟，唱着很亲热粗俗的歌曲。我们穿过去，看到所剩无几的商家仍在经营一些仿佛来自上个世纪的商品，比如双桶洗衣机和碟机。

黄金路是一条有明显坡度的小路，典型的南方街道样貌。行道树枝干纤细，树冠却遮天蔽日，沿途各式各样的饭馆、菜铺，亲亲热热地混杂在一起。我们顺着彭剑斌模糊的记忆从路边的楼梯爬上去，钻进比路面高出一层楼的小巷，寂静中传来不绝于耳的麻将声。巷子只有两米来宽，一楼的人家多数把阳台窗子打通成入户门，好几家改成了麻将馆。一张麻将桌上坐了三个老伯，彭剑斌站在桌旁看了一会儿，提出“我陪你们打一圈”，但被拒绝了。他有点讪讪地给自己找借口，“他们怕我打得大”。

旅馆和出租屋，几乎是他长期漂泊生活里面唯一能把握的锚点。为他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的冯俊华记得，彭剑斌还在给“奇利王”跑业务的时候，就跟他和金特这两个爱好写作的朋友在广州认识了。常找他们一起切磋文学。后来他辞掉灯具厂的工作，和冯俊华他们在城中村里住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冯俊华和金特在一家餐厅送外卖，而彭剑斌除了靠打麻将挣一点必需的伙食费，就是在合作社写东西，有时候点份外卖等冯俊华送过来。《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就是在广州的城中村开始写的，写的像他自己住的屋子。南方寒冷潮湿的夜里，一个青年在“暗得令人严肃的屋里”，对着破旧的电脑玩纸牌游戏。一张和房间不成比例的大床，床和墙壁之间只能卡住一把椅

子，床沿里面卡着大衣橱，人被包围在一群无用的巨大之物里面。在南方的雪夜取暖的过程也事无巨细地写出来，先是穿着保暖内衣、毛衣和羽绒服缩在一张棉被里面，后来套上了牛仔裤，穿着两双袜子的脚塞进毛拖鞋里面。最后“我”突然决定离开，把大半瓶洗发水都送给了楼下刚搬来的女孩。

现实里，彭剑斌离开广州去了成都，在一间同样只有床、衣柜和桌子的房间写完了《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后来发表在文学期刊《西湖》。几年后，出版人陈凌云正想做文学方面的书，在杂志网站上顺着“新锐作家”的名字一个个点进去，按照拼音首字母排序，彭剑斌的文章排在很后面，但是一下子击中了他。

“我主要是看语言，或者说他的基本经验能不能打动我。《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里面有一种很冷峻的东西，好像用一个摄像头，冷冷地看着一个在异乡非常孤寂的年轻人。”比起它呈现出的类似法国新小说的形式感，更打动他的是一种在他自己生活里面已经很少见的不动声色。

他特别翻到《肯德基早餐》，指着结尾处，男人和女人在出租房做完爱，出门吃了一顿肯德基早餐，走出餐厅的时候女生说：“如果有一天你发达了，给我买套房子好吗？”“两个穷光蛋，只能用一个巨大的妄想来满足自己。他把那种困境中的心态描摹得特别好。”陈凌云说。

相似的故事一个个发生在别人的房子里，主人公们在陌生的房间里麻木流浪，包括偶尔发生的爱情都搞得不成样子。世纪之初那种还未完全形成的南方城市生活，混乱无序，但又总在逼仄处给人留个出口。彭剑斌就在肉体经验的百无聊赖中，报复似的在头脑中演绎自己的渺小。

我们走到黄金路那条背街小巷尽头，在小卖部买了两瓶水。店门口有一只肥硕的黄狗，门外的小平台上摆了一张木沙发，上面摆着漂亮的手缝坐垫，跟故事里出租屋的床单一样，在贫瘠的空间里“散发浪漫气息”，身边居民来往，默默打量着明显不属于这里的外人。彭剑斌坐在沙发上拍了一张照片，他低着头，像是在抵抗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他评价镜头里的自己“像个闯入者”。

下坡，下坡

从遵义到贵阳，再到都匀、凯里，彭剑斌租了辆车带着我们跑。宽阔的路上，限速很低，导航和路标不断提示，“连续下坡，减速慢行”。我想起从遵义的机场出来也是这个样子，路标提示不断下坡，好像在往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深坑里面钻。在贵阳跑业务的最后一年，彭剑斌写了《从现实到梦境所要经过的路程》。故事的开头像个现实故事，“我”坐上一辆中巴，跟周围人说他要去看一个姑娘，并要和她结婚。那辆车不断地下坡，不知开了多久，突然转入一个恐怖的梦境——“我”惊恐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周围人说已经过去十年啦，司机说停下来很难，而且“这里离任何地方都很远”。

在我们这趟旅途中间，彭剑斌被一位意料之外的故人截下了，他是彭剑斌唯一还在联系的大学同学胡成贵。我们在贵阳的一家酸汤牛肉店里见到他，前一天，他刚刚从都匀跑业务回来，做女装批发生意。

在大学时期的同学里，彭剑斌只和胡成贵还有联系。可能因为胡成贵也来自湖南的农村，上学的时候爱写诗。饭桌上，他们互称老板，像是一种辛辣的戏谑。他们谈论班上同学的去向，按胡成贵的说法，家里条件好的去当会计或者自己当老板，条件好的男女同学在学校里看对眼很快就结婚了，他们这样“没背景”的才出来跑业务。

彭剑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胡成贵介绍的，去了以后发现是传销。胡成贵咧开嘴无辜地笑，“他们说得很好听，我天真地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才把彭剑斌拉进去的”。彭剑斌在旁边补充，“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很激动地打钱，我让我妈给我寄钱，说要买电脑”。一套产品 3000 块，彭剑斌凑了 5000 块，后面再也凑不到了。命运好像残酷，又好像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没受到什么人身监禁之类的折磨，在传销组织被警方端掉之后，原地解散了。

被拉去传销的人里面还有立中，彭剑斌小说《水晶》的主人公，也是他初中就认识的发小。故

上图：清晨的都匀山顶观景台，斗鸡、爬山和旅游的人在这里相遇



下图：西南地区城市坡道很多，视野常被遮蔽

1



3





2



4

1. 凯里街头仍保留着繁杂热闹的集市

2. 一家三代人挤在车内，前去戏水

3. 夏天河边纳凉的人群，烧烤摊也支在水里

4. 台球桌，小城街边常见的娱乐设施

事里，立中读书不好，高中没考上，去复读了两年初三。他在一个个厂里打工，服装厂、五金厂、塑料厂、模具厂……没有积累经验，也没有积累财富，只能空口吹嘘他在汽车美容店爱上过一位贵妇。在这个很现实的底层叙事里面，插入了一个传奇，透过立中和“我”的夜谈讲出来，像梦话一样。立中家的村子有水晶矿，挖出过珍贵的“水晶王”。立中家守着矿，好不容易守来一个值得信任的香港老板，眼看要把矿卖出去了，结果老板在镇上的酒店被杀，巨款被抢走了。天降的财富成了灾星，父亲大哭一场，把水晶矿石倒进了粪池。

他故事里的人用不熟练的语言说话，字眼没轻没重，句法不讲逻辑，把现实的荒谬染得更浓。《墨渍》里面，爱写毛笔字的工人老丁盯着自己裤子上的一点墨渍，忽然觉得它开口说话了：“老丁，你干脆去死好了，当然我只是随便说说。”过了一会儿，老丁流着泪可怜地回复墨渍，“哈哈，你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哈哈，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可怜？”没过几页，老丁毫无解释地死了。

墨渍喊出的那个“死”字，连同老丁后来的死和被人彻底遗忘的命运，让陈凌云印象深刻，“像这样的人物，他把他写得一点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但是你读完以后，又会感觉到一种虚无的存在，意味深长”。彭剑斌写的东西不会像东北作家群体那样突出一种近似的语言特征或者风格，因为南方的语言过于庞杂。从语言延伸到叙事，南方人的故事也不追求集体的命运感，一个人的失败就是他个人的失败，不寻求跟社会或者时代的联系。在第一本小说集的封底上，彭剑斌说这是“南方语言一次梦想中的胜利”，那是他多年前和冯俊华在讨论中提出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冯俊华的解释是“需要创造一种和他们在南方的生活经历相匹配的语言”，它的形式千差万别，但有一种独特的气息。“一个是松弛，不会有标准的语法，还有一个重点是不下判断，而是一种倾向于描述、不急于总结的开放性语言。”彭剑斌对我具体形容了一下，“我会想象我们老家人说话的方式，不是直接说土话，而是把一句方言用普通话的逻辑翻译过来。”往往是不规范的，文白夹杂，语序颠倒，“是一种用口语逻辑改造的书面语”。

和渺小重逢

彭剑斌现在住在长沙西北边的望城区，这里还保留着一些城乡接合部的特色。和我们刚刚离开的贵阳相比，是另一种南方的省城。

他领我们从单位大院前门出去，绕到后门的一片菜地前，“你说要我带你在长沙什么地方转转，我想来想去只有这里”。

这片菜地紧邻着单位后面一排集资建造的员工住房，中间有一片泥汪汪的小水塘，一个造型颇为现代的凉亭支在水塘上面，庞大得茫然无助。包围着水塘的土地，被编织袋、木栅栏、绿色的网纱横七竖八隔成一块块小菜地，种的是湖南人最爱吃的那些，辣椒、茄子、丝瓜，偶尔点缀些香菜。

彭剑斌是2012年回到湖南的。在那之前，他尽量地远离自己的家乡，“因为不想离现实太近”。老家在一个国道旁的村子里，夹在山坡中间呈狭长形，在湖南这样的地形很常见，地名里都带着“冲”。家里种植烟草，烟草的处理过程冗长复杂，他从小就跟妹妹帮着摘除大烟叶旁边的“烟孙子”，用一根杆子把烟叶绑起来挂到烤烟房里去。父亲除了干活，不会操心别的事情，每到开学都是母亲去借钱，父母为此不停地争吵。后来家里的孩子大了，父母就出门到广东等地打工，母亲通常是在制衣厂，父亲先在建筑工地，后来去当保安。直到他回长沙工作前一年，家里才凑了笔钱，在县城买了房子。

那是农村家庭的常态，但彭剑斌不愿意写那些事情，“这东西写出来真的不好看。我还是一个文学的唯美主义者”。包括父亲有一次在工地摔伤，恰逢爷爷去世，他代表全家回去送葬。他把那件事藏在《寂静连绵的山脉》里面。

回到长沙是因为杂志社的朋友给他提供了工作。那之前两年，他在深圳房地产公司写广告，又在广州送过快递，好像再没有一份工作能给他提供业务员时期的写作自由。后来他甚至想，要不回到农村去种地，虽然他实在不喜欢那个村子，但可能这就是命？他写了一句话：“接受，并且主动寻找自己必须像安于漂泊一样安于了稳定接受之物。”

回来长沙后，他在那家杂志一干七年。在此期间，他有了妻儿，和杂志社里交好的同事在同一个小区买了江景房。房子的位置很好，从窗子看出去，一边是湘江，一边是靳江，岳麓山也在附近。山下有个阿克梅书店，店主小七和江涛，加上书店的常客陈勇，构成了彭剑斌在长沙的新朋友圈子。

书店三年前开张的时候，彭剑斌因为工作的杂志社倒闭，有一年没有工作，一个人过来转悠。登记会员姓名的时候，彭剑斌顺口自我介绍说是“写小说的”，江涛记下来了，小七找来《角色》看，“气死了！写得这么好怎么能这么便宜”，端走了打折清仓的初版《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主动提出帮他卖书。很快，彭剑斌在阿克梅书店办了第一场签售会。书铺满了柜台，他在这里签了一下午，小七也不知道怎么答谢，想到开店的时候买了一条芙蓉王，就把这条烟给他了。

年轻的时候，彭剑斌曾浪漫地希望过一种悲剧性的人生。现在他发现自己承受悲剧的能力太差了。他对住房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把家里的地板拖得一尘不染，根本很难想象过去随便一个摆上床的单间躺进去就睡，“现在就连比地板上的灰尘大一点的悲剧我都受不了”。

他喜欢已经拥有的东西，同时也感觉现实越来越重，“飞不起来了”。在新书《寂静连绵的山脉》的《代序》里面，彭剑斌说他坐在自己那间很像样的书房里，突然遇见了他的渺小，“难以置信，我们竟然阔别了那么久”，他和过去那个渺小的自己紧紧相拥，忽然意识到自己那好几个房间的住宅、庞大威猛的车，这些巨大之物几乎将他吞噬。

他的新家已经整理好了，是带阁楼的顶层，也有一间单独的书房，但他还是想在单位对面的城中村里面挑一个用来写作的房子，预算一个月400块。正午，我们坐着他的大红色菲亚特，钻进私房中间不大宽敞的水泥路，和小货车、卖卤菜的电三轮艰难错车，在一个个铁门前停下来，挨个拨打房东留下的手机号码。

他在最后一排找到了中意的屋子。比屋后的地面低下去半层，窗子正对着后面的菜园，更远处是大片待开发的荒地。一楼租给了房东的亲戚，做卤菜的，站在门廊里，整个人都泡在卤凤爪的体香里面。隔壁房间是一个建筑工人，再隔壁是跟儿媳妇处不好搬出来单独住的老头。彭剑斌看起来挺满意，“就是要这样周围人很杂的房子，接地气”。


2023.07
少年新知
第七期
少年
夏日里的味觉探险
ISSN 2096-9740
国内统一刊号：
ISSN 2096-9740
CN10-1742/C
邮发代号：82-51
定价：25 元
扫码购买

林白 记忆与想象中的北流边城

记者 · 艾江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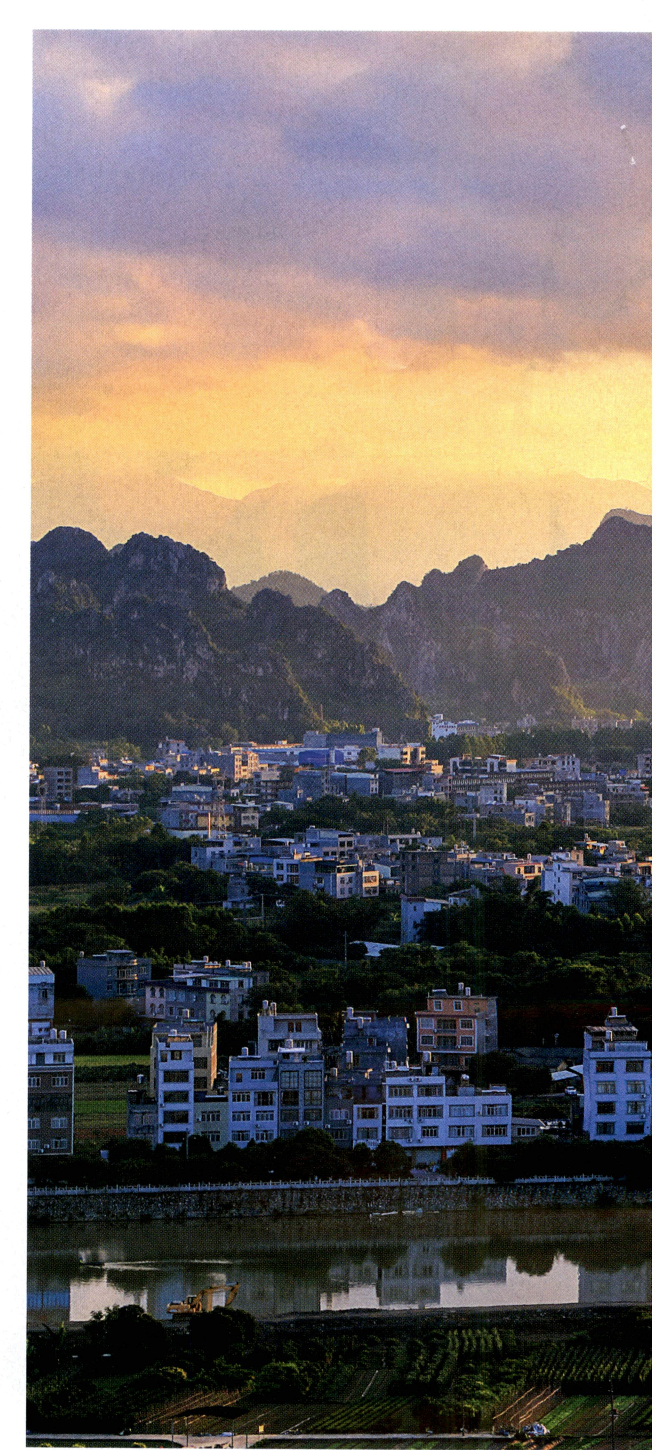
粤桂边城北流，有南方之南那种肆意生长的植物，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还有浮动其上的神秘色彩，在林白和朱山坡两代作家笔下，构建起北望与回望的种种况味与想象。

通往家乡的“秘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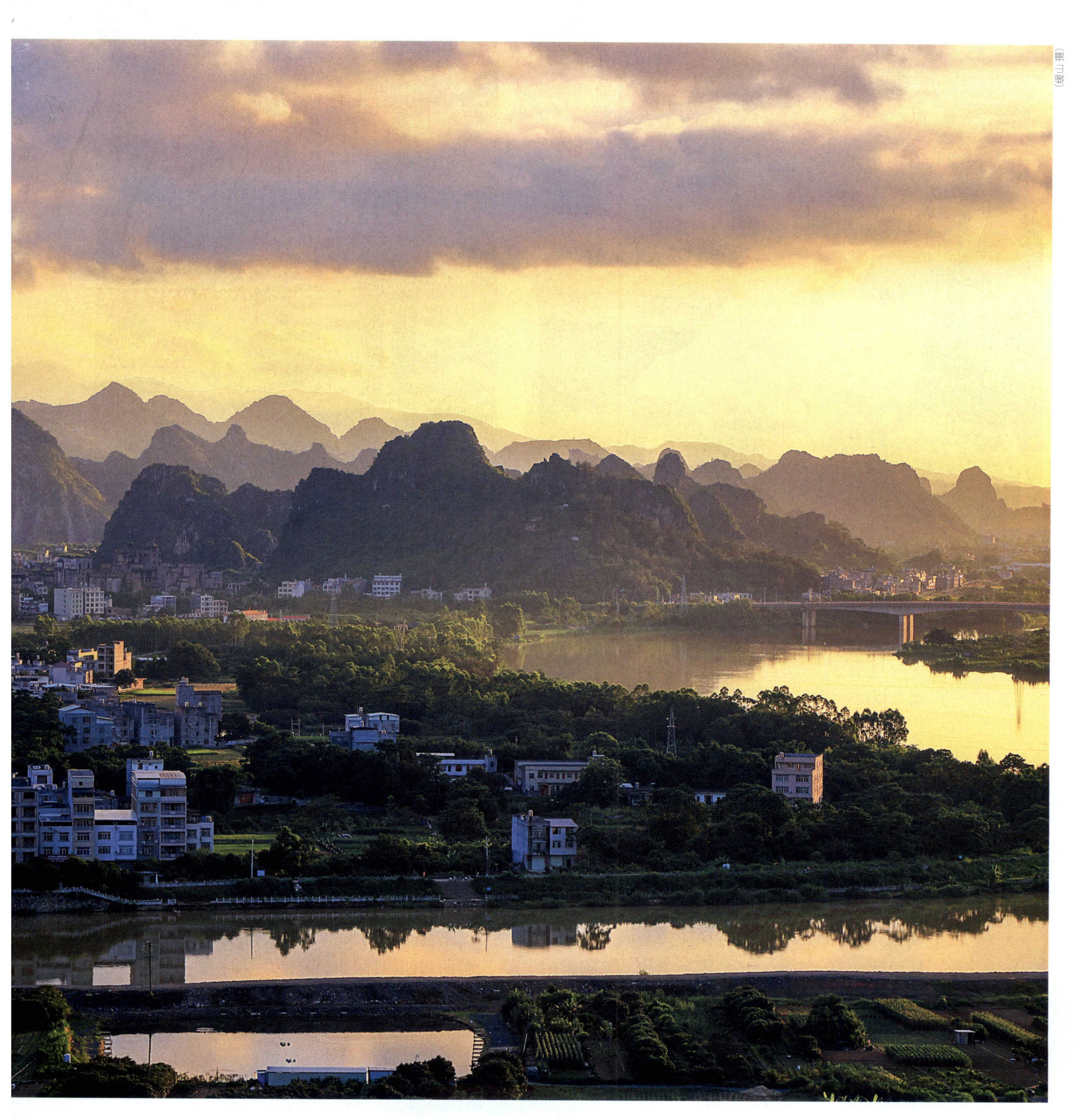
或许是进入汛期的缘故，北流河有些浑浊，宽阔的河面上偶尔漂荡着一两艘小船，锈迹斑斑的码头上停放着一排竹筏。当地人口中又叫圭江的这条河流，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重要的水道。千百年来，人们正是沿北流河而下，在这里上岸后，通过一个两峰对峙之间的关口——鬼门关，前往钦州、琼州、雷州还有交趾（越南）。看到我发去的照片，林白回复：“我以前还没发现，怎么这么像湄公河！”

粤桂边城北流的那种蛮荒和神秘，或许只有离开，才能感受更深。1990 年定居北京后，林白的一系列小说，要么以北流为背景，要么直接写记忆中的北流人事，始终不曾离开这里。2022 年，她干脆以家乡为名，出版了一本长达 60 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北流》。那些反复出现在她以往小说中的北流往事，还有她数次返乡的见闻、闲聊，都被她以注卷、疏卷、散章、时笺的结构，事无巨细地以主人公李跃豆的故事安排进去。林白的北流，密集而集中地进入文学叙述。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林白在这部小说中采用家乡方言——一种被称为广东乡下话的“勾漏片”粤语写作，还为此编写了《李跃豆词典》。这种选择，与她在 2016 年参加香港的一次讲学活动有关。在香港，她发现用自己的乡下粤语不但可以日常交流，还可以正式演讲。小说中，李跃豆“讲普通话时她心里畏缩，不与生人搭话。粤语使她开朗，在楼道或者大堂，远远望见清洁工或者保安，她就欢喜道：‘早晨！’如果天晏了，她就说：‘食佐饭未？’他们很开心，保安大叔每次见到就帮她推开门。她欢喜得很。稍有蹊跷的是，与知识分子或做文学的人她无法说粤语，即便是刘颂联。只有同卖饭的大妈、打扫卫生的阿姨、保



北流河与群山环绕下的粤桂边城北流



（缓山 摄）


（于楚众 摄）


（缓山 摄）

左图：作家林白在北京的工作室

右图：作家朱山坡在北流南部的家乡老屋门前

安大叔这一类人，她的粤语才可以顺畅。”

长期以来，林白都有轻微的社恐，害怕与陌生人见面聊天，这与方言带给她的某种自卑感不无关系。“在我们这个七县小城，在岭南这里离中心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粤语地区也有文化中心，一个是广州，一个是香港，我们的方言跟它们比起来很土。虽然语法、词与词的组合方式基本一样，都能听懂，差别在于语调，广州香港那边会轻柔一些，我们呢，听起来好像比较蛮横。”小时候，林白就意识到当地白话的那种土气，曾到广东工作、见过世面的继父和表姐说的是正规的广东话，代表着某种权威。那时，北流去过远处的人都竭力讲一口广东话，即使没有去过广东，也要讲广东话，以显示自己见过世面。

不过，那时的林白崇尚书面语，那些遥远而高拔的事物，往往闪烁着诗性的光泽。就像小说中，李跃豆和她的儿时好友泽鲜喜欢“散步”，而非本地人说的“荡街”，“散步这个词是书面的，因而够高级。本域不讲散步，讲行街，或者，荡街。……我们要求自己至诚正经、认真严肃地散步。这件叫作‘散步’的事情，我们赋予它喜马拉雅的高度，然后专注精神沉浸其中……”。

书面写作与日常交流之间，横亘着某种难以跨越的东西。林白向我谈起那种断裂：“我去武汉大学读书，那是第一次离开北流，那是一个普通话的环境，我几乎是失语状态，根本讲不出来。虽然我们在北流对着报纸讲普通话没有问题，但是变成口语，就是一座跨不过去的大山。”

用方言写作，对林白来说，似乎意味着某种敞开与和解。林白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后来再婚，把11岁的她放回老家半年，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失学的痛苦，成为她长期的隐痛，也让她从小与母亲产生了隔阂，“那时候的情感就是要走远一点，有出息的人才会走得远”。

一旦回到方言，交流便顺畅起来。那个植物疯狂生长，有着码头、水运社、布行、登龙桥、犀牛井的林白记忆中的北流，从书页进入口语。

边城的日常，自然浮现的神秘事物

2005年8月，写小说不久的朱山坡第一次见到回乡参加“天门关作家群研讨会”的林白，会议结束后，陪她重游北流。从这位前辈作家的口中，朱山坡才弄清从沙街到沿江大道，从俞作豫故居到十二仓，那些大街小巷中的陈年旧事。

历史上，北流因“鬼门关”这一地名被不断提及，极言其荒蛮偏远。在《辞海》的描述中，这一古关，“在今北流县西，介于北流、玉林两县间，双峰对峙，中成关门，古代为通往钦、廉、雷（今广东雷州半岛）、琼（海南岛）和交趾（今越南中北部）的交通要冲。因‘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太平寰宇记》），故名”。唐朝诗人沈佺期、名相李德裕，宋朝诗人苏轼兄弟、名将李纲，正是由此南下，开启他们的贬谪岁月。如今这里仍是北流和玉林的分界，不过双峰对峙中的小路已变为宽阔的G324国道。朱山坡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附近水泥厂为取原料，不断炸石挖山，后来政府相关部门立碑保护，保留下半山腰上刻于明代宣德年间的“天门关”三个大字。连绵不绝的植物，首先涌现在林白的《北流》中。在序篇中，她以《植物志》为题的20首诗歌，开启自己的叙述。“无尽的植物从时间中涌来/你自灰烬睁开双眼”“无穷无尽的植物/在时间中喃喃有声”。

小说中还记下她吃花蕊的片段：“我们去执扶桑花，食指和拇指捏住中间细长的花蕊，出力一猛，细长的花蕊就拔落了。扶桑花蕊细长像吸管，中空储有甜汁，轻轻一嘣，甜水如蜜。我们嘣了一根又一根，全公园的扶桑花蕊都被我们揪光了，少了花蕊的扶桑花可不好看，空洞、丑陋，非常之莫名。”

植物的疯狂生长，在朱山坡看来，映射出当地人的性格。“这种生长不讲道理，水泥地有点缝隙，马上长草长树，屋顶长树，树上长树，藤上长藤，没有办法，生命力太强大了。这种植被直接影响到人，生存的顽强性，吃苦耐劳，蓬勃进取。”

南方从不确定，对当地人来说，岭南才算南方，那是一个更野更蛮、有点自卑与别扭、闷热潮湿的地方。在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震撼于第一次见到北方（武汉大学）集体澡堂的场景：“在我亚热带的B镇，洗澡被叫作冲凉，从四月到十一月，每天都是三十多度，热且闷，汗水堵住毛孔，浑身发黏，洗澡是一天中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每家都有单间的冲凉房，每个机关都有一至两排乃至三至四排冲凉房。这是我们的裸露之地，我们无法想象集体澡堂，前所未见。”因此当小林见到集体澡堂中密集的裸露的身体时，绝望地哭了出来，直到一位年龄比较大的同学从人堆中走出，牵着她来到喷头下方。

当我谈到这个印象深刻的细节时，朱山坡补充道，海南的小说家林森当时考到北方的一所大学，一看集体澡堂，马上决定离开，完全无法接受这样赤裸裸一排洗澡的场景。

老的北流城并不大，据当地诗人谢夷珊（《北流》中赖诗人原型）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北流城除北门外，三面有门，从东到西800米，从南到北600米。从东门口到沿江路再拐往纪念苏东坡上岸的景苏楼的一段L形的街道，正是林白小说中反复写到的沙街。8岁到12岁时，林白曾经住在沙街母亲所在的妇幼保健站，那时的沙街汇集着畜牧站、农业局、水电局、水运社、防疫站等重要单位。少年林白最喜欢看沙街尽头码头河流上的船只和物品：“1965年，我的沙街就这样浮动在我故乡的大河上。这条河新鲜、丰盈，拥

植物的疯狂生长，在朱山坡看来，映射出当地人的性格。

（缓山 摄）

上图：夜晚的北流市西门一带，人头攒动，热气腾腾

下图：北流市登龙桥附近西河上的一座小石桥。登龙桥在《徐霞客游记》中留下记录："街墟由城北隅东转，有溪自城北来，石桥跨之，曰登龙桥。"



（缓山 摄）

有一个木船厂和运砖瓦瓷器的浩大船队。船厂和沙街遥遥相望。船队浩浩荡荡，自上流而来。它们停泊在码头上，码头的伸延就是沙街。船队停泊在码头，把船上运载的气味带到沙街上。新出窑的砖瓦、水缸的气味、咸鱼的气味、豆豉的气味，沿着码头走上沙街……船上的人全都光着脚。他们光着脚走在沙街全是细沙的街上……”

林白早期的创作，常被批评家冠以“巫气森森”。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主人公多米是一个爱幻想的女孩，“我常常遐想，深夜里的河流就是冥府的入口处，在深夜的某一个时刻，那里汇集了种种神秘的事物，在某些时刻，我会到那里，等待我存在的真相，我不止一次地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是被虚构的。”于是在小说中，林白写了在南宁河堤大街上卖能够预测命运的相机的妇人，在阁楼上等待主人公的已经死去的穿旗袍的女人，旅途中路边等着自己的熟人。

我曾向林白求教，这些神秘的想象所来何自，她答道：“这些神秘的东西很难说是什么经验，只要你是松弛的，能够放开来写，写作到了那时候，就会出来这么一段，并没有刻意设计这些东西。”

如同鬼门关的意象，当地人普遍对神秘的事物抱有浓厚的兴趣。林白向我回忆，当年还住在沙街的时候，有一次她在河边洗衣服，一件灰蓝底上印有碎花小玫瑰的新衣服，结果因为发大水，一下没抓住被冲走了。为此，她还懊丧不已。第二年的一天，她正在厨房择菜，两个小伙伴忽然过来跟她说：“你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的？”一看还真是，原来这件衣服当时并没有被冲远，而是被卷进沙子里埋了起来，后来又被冲出来，主动跑了回来。那种神奇的感觉，如同不期而至的记忆。对出生于北流南部小镇六靖镇的朱山坡来说，这种在一些读者看来神神道道的东西，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种巫气森森的气息，很像他喜欢的作家马尔克斯所写的《百年孤独》，不止一位作家曾经讲过，“广西就像中国的拉丁美洲”。“出生的时候，我们就要请巫师取名，帮你祈福，仿佛与神之间的一份契约。我小时候多病，就请玉皇大帝当干爹，但是请的神越大，越麻烦，以后要还，比如脱契之前，不能吃狗肉。我们这里说的‘契弟’，其实就是干兄弟，帮你取名字的人叫‘契爹’‘契爷’，他的儿子就是你的契弟。这些巫师往往也懂一些医学，神秘病都用艾火烧，烧之前要点香火，念动咒语，神符烧化在水里再喝下去。很多小孩见到他们，马上就哭。”朱山坡说。

在小说《尖叫》中，朱山坡写了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河边散步时，突然感觉被人捅了一刀，全身随即开始痉挛抽搐，后来才得知，同一时间，和他关系要好的姐姐因为债务纠纷，被人捅死。更多时候，朱山坡会有意识地以神奇的想象，实现小说的飞升。在系列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中，朱山坡最满意的一篇小说是《荀滑脱逃》。小说中，那个盗亦有道的小偷荀滑，被愤怒的村民误认为偷盗一个贫苦农民卖猪所得的钱财，群起攻之，当此时，他走进电影院，跳上银幕中飞驰而来的火车脱逃。

许多作家都会写到神秘离奇的元素，但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迟子建笔下的东北相比，朱山坡认为广西本土并没有像湘西、高密那样，经历兵患匪患剧烈的外部侵入，也没有东北那种萨满教的原始神秘，更多是从民间传下来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一定是宗教，可能是风俗性的东西，没有那么激烈，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思维生活习惯的世俗性的日常。”

北望中原，还是直面世界？

刚到北流那晚，我和朱山坡还有谢夷珊、梁晓阳、吉小吉等北流作家消夜聊天，大家的共同感受是作为粤桂边城，北流往往是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用朱山坡的话说：“我们这个地方很特殊，你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广东那边非常相似，文化上归附广东，但区划上又属于广西。”

这种感觉，对来自北流南部的朱山坡等人来说，尤为明显。北流有两大水系，北流河北上而入西江；流经南部六镇的河流则汇入鉴江入海。也正因此，北流北部和南部，被当地人称为上里和下里，信息来源甚至口音都有差别：北部更多来自梧州，口音受那边影响更大；南部则主要受毗邻的广东高州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毗邻广东，北流南部最先受到影响。那时往往是高州的商贩到村里收购农产品贩卖。朱山坡回忆，“给我们观念冲击最大的，一个高州商贩到我们村里来，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穿五分裤、长筒丝袜和凉鞋，当时围着看，觉得太好笑，好像只有香港电影里，英国警察穿成那样”。不久，大批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广东打工，那时父母攀比的主要是谁家孩子寄回的汇款单数字更大。那些年轻的打工者也把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回来。以前村民们学习模仿的对象还是临近的广东化州的宝圩镇，看到他们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渐渐地，他们对广东的了解从广州、深圳、珠海这样的地方拓展到虎门、中山、江门这样的小城，“甚至连具体的街道我们都知道，比如东莞后街，那里是鞋厂成衣一条街，大家谈论着，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然而，和当年那些年轻的打工者不同，朱山坡当时的理想多少有些怪诞，他一心渴望跨越大海，去美国。“那时候没有国外的邀请，个人无法办理护照，也没有出国旅游的概念。如果没有海外关系，没有签证怎么办？只有偷渡一种方法。为此我开始努力学习英语。那时经常跑到西江下游的梧州码头，和外国人打招呼，陪他们吃米粉，想法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我还跑到书店买下所有跟美国有关的书，认真研究怎么在美国打黑工生存。”这种奇怪的念头，朱山坡直到结婚后才打消。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入小说《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

与林白偏重个人化、碎片化的追忆风格不同，朱山坡在写作中有意识地构建起米庄、蛋镇这样的小说世界。如同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蛋镇”是个充满隐喻的意象，用朱山坡自己的话说：“鸡蛋本身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蛋同时孕育着多种可能性，既有破壳而出的欲望，也有躁动不安的东西：要么破蛋而出走向世界，要么就憋死在蛋里面，成为死蛋。”

以蛋镇电影院作为人物活动出没的舞台，则缘于电影对朱山坡的深刻影响，“对我们来说，电影就是认识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一天中午，朱山坡和谢夷珊带我们去看六靖镇街头早已破败的电影院——小说中蛋镇电影院的原型。扒开荒草掩映中锈迹斑斑的铁门，电影院内部布满灰尘和杂物。37 年前，读高一的小镇诗人谢夷珊带着读初一的朱山坡，从一个狗洞钻进电影院，看了《伊豆的舞女》。“当时电影院只有两三个人，谢诗人告诉我，电影改编自小说，小说的作者是川端康成。饰演女主角的山口百惠好漂亮，我想当作家几乎都是那时开始的。”

于是，在后来的《蛋镇电影院》中，就有了那个陪着已在越战中死去的凰远去的售票员凤；有了不知自己已经死亡，出事后仍将片子送回的跑片员孙昊；有了在电影银幕中脱逃的小偷荀滑。

在他那些充满荒诞和隐喻的作品中，南方意味着什么？朱山坡回答，首先是热气腾腾的气息，还有那种骨子里的南方思维：“比较务实。从行文风格来看，直来直去，不写那么多废话；不讲绝对的话，做事情讲话都留有余地。”

上世纪 90 年代，学者陈思和曾在《林白论》中写道：“林白是带了自己独特的童年记忆进入文坛的，她来到北京以后，无论是出于一个边地女子对现代文明的向往还是出于女性亘古而来的软弱，她都自觉地愿意向主流的文明社会臣服并且同化那些来自荒蛮之地的记忆，这表现在她的创作里总是弥散了难以言说的委屈和自怨自艾。”林白对此不以为然，“还是那句话，全世界的文艺青年都想向文化中心靠拢，19 世纪大家去巴黎，20 世纪去纽约；萧红去上海，沈从文去北京……其实我去了北京，一直写的仍是自我”。

如果说林白早期写作中的北流，还带有北望的不甘与低回，那么在长篇小说《北流》中，她则在北望与回望中实现了某种平衡，边地庞杂细碎的记忆，无不值得珍视。

而在更年轻的写作者朱山坡那里，风似乎来自海上，“与其北望中原，不如直面世界”。

（感谢季亚娅、徐则臣、吉小吉、梁晓阳对采访的帮助）

在他那些充满荒诞和隐喻的作品中，南方意味着什么？

饶晓志 来自生猛的小城

文 · 孙雅兰

《无名之辈》让许多人认识了饶晓志，也将充满地域特性的贵州小城推至我们眼前。那些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边缘人物行走在新旧交错的小巷里，充满荒诞感的故事，令人心情复杂。饶晓志承认，这是一部有关家乡的电影，记忆中那些既生动又生猛的面孔给了他创作的冲动，而在他描摹的这幅众生相中，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虚构的创作藏着他真实的个体生命经验。但是，不同于毕赣在民间信仰的浸润中展现出的神秘，以及陆庆屹在偏安一隅的自然主义中体现出的淡泊，饶晓志与故土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

7 月初的北京，连续多天被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炙烤着。位于温榆河边的大道戏剧谷，距离北京首都机场不到 10 公里，走进园区，安静得能听见风声。在室内，话剧《杏仁豆腐心》正在紧张排练，这是饶晓志时隔 8 年回归舞台的新作，最近他和团队每天都排练到晚上 11 点，为 7 月 21 日在北京的首演做准备。

在搭建的简易舞台上，两位演员正在对戏。正对他们的是一排工作人员，饶晓志坐在正中间。在排练现场，他说话不多，但句句落在细微。"'我总是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把这句词里的'一些'改成'那些'吧。"他对演员说。有时候，他会纠正演员的一些微小动作，比如说某句词之前，先加一段踱步；或者拿起酒瓶后先顿一顿，别急着开酒。说完上台示范一遍，幽默的动作惹来一阵笑声。

两年前，饶晓志发起晓年青剧团，已在电影界成名的导演重新回归舞台，这被视为"逆流"之举。问及背后的理由，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喜欢啊，我就是从这地方（舞台）出来的，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乡土情结。"

之所以提到"乡土情结"，缘于我这次拜访他的目的。近年来，尤其自 2016 年以来，毕赣、饶晓志、陆庆屹等一批贵州导演相继冒头，被称为贵州电影新力量。毕赣以一部《路边野餐》将故乡凯里的独特空间和神秘气息融为一体，并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进一步延续自己的主观体验。饶晓志在《无名之辈》中呈现出贵州边远小城的粗粝质感以及底层人物的挣扎。陆庆屹的《四个春天》则以影像记录了自己这个普通家庭和父母的平常生活。他们的作品在短短几年迅速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令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主流话语中博得一席之地。

不同于毕赣和陆庆屹充满个人色彩的诗意，饶晓志镜头下的贵州彪悍生猛，更加主流的叙事让他的作品赢得了更广泛的观众群体。《无名之辈》2018 年上映，在豆瓣上被 216.4 万人标记看过，评分至今保持在 8.0。故事围绕一群小人物展开：进城务工的小伙"大头"和"眼镜"为了出人头地，妄图靠抢劫对抗命运不公；因车祸不幸瘫痪的姑娘马嘉旗，一心想要自我了断；保安马先勇想考协警却屡次失败，还因醉酒驾车害死了妻子……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生存的尊严，不惜以身犯险也想证明一次自己，内心的卑微和不甘同样强烈。"每个看似滑稽小丑的无名之辈，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悲喜与坚持。"一条高赞评论道出了观众的共鸣。

对饶晓志来说，这是一部有关家乡、有关自己的电影。电影中身处荒诞困境中的人，有许多他从小到大认识的身边人的影子，那些人"既生动，又生猛"。在位于北京七棵树创意园的工作室里，饶晓志说起自己已离开 22 年的老家，有些细节残缺模糊了，被一种笼统却挥之不去的感受所取代。

生猛的人

2017 年，饶晓志和剧团参加完爱丁堡戏剧节后，从伦敦飞回北京，同行的还有演员章宇。行



上图：工作中的饶晓志（中）

下图：剧组在片场



（徐舟毅 摄）

左图：饶晓志的老家，贵州桐梓县响水村

右图：贵州桐梓县官仓镇街头

程中饶晓志有些恐飞，通过听歌来转移注意力。突然听到手机里放出一首很陌生的歌，“初听有些搞笑，细品又有些忧伤”，听到最后，他流下泪来。一下飞机他就找到曾经合作过的编剧雷志龙，把这首歌放给他听，并告诉他，一定要把这首歌加进电影里——虽然那时候，他连要拍什么电影都还不知道。

歌是贵州籍歌手尧十三所作，歌名为《瞎子》。尧十三将北宋词人柳永的名作《雨霖铃》转译成了贵州织金的方言，歌词写道：“我要说走喽，之千里的烟雾波浪嘞，黑巴巴嘞天好大哦。拉们讲是那家嘞，离别是最难在嘞，更其表讲现在是秋天嘞。”对应的是原词：“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粗粝的方言直白地宣泄，离愁别绪在忧伤的曲调中显得更为黏稠。

那时饶晓志已离开贵州16年，在此之前，他内心很少泛起过乡愁，听歌时，有关故乡的面孔和画面却一一冒出来。有些是对他来说算不上重要的人，比如某个过世的亲戚，性格很古板，跟儿子感情不好，很平淡地过完一生；小时候念过书的中学，校门口有一棵树，树上刻着女生的名字。一股强烈的冲动涌现——要做一部有关家乡的众生相的电影。“可能是年纪大了，打开开关只需要一首歌。”饶晓志说。

这股乡愁直接触发了2018年《无名之辈》的诞生。那首《瞎子》果然作为插曲在高潮处出现，同坐那趟航班的章宇则是他的男主角。作为影片的编剧及导演，饶晓志为《无名之辈》里的角色注入了强烈的情感。片中的小人物处境卑微却又



（徐舟毅 摄）

不甘心如此，在一出出“闹剧”中尽显荒诞与辛酸。家乡那些忘不掉的面孔，给了饶晓志最大的灵感，不一定具体指某个人，而是某一类人。“章宇饰演的‘眼镜’，喜欢吹牛，一天到晚尽想干大事，这就是我生活中认识的人，血气方刚也是对自己尊严的一种粉饰。”回想起这些，饶晓志也说不清是好是坏，但这些生动的人物和家乡的烟火气，都刻在他的脑海里。

作品一旦诞生，就开始了自己的生长。剧本创作过程中，对白在饶晓志手中不知不觉变成了西南官话，这让人物的性格多了几分火爆和耿直。“眼镜”想敲打兄弟被爱冲昏头脑时，骂他道：“我爱你妈卖麻花情！”瘫痪女孩为了激怒抢匪帮她了断生命，怒吼道：“数到三你要是不开枪，你就是个趴皮！”在饶晓志看来，用这种方式说话，才更符合他对家乡人一贯的血气方刚的印象，一旦换成普通话，“那个劲儿就不对了”。

在《无名之辈》之前，饶晓志曾有另一个想拍的故事，也来自贵州。那是发生在六盘水的一个真实案件，弟弟遭抢劫被杀害，哥哥千里追凶。那时饶晓志还没跨入电影行业，等到他跟朋友聊起时，才知道这故事已经被人拍了，就是蔡尚君导演的《人山人海》（2012）。故事中的人物有着极致的生命力和韧性，熟悉的乡土气息令饶晓志动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饶晓志并没有形成一种地域上的身份感，即便是在只身闯异乡的年月里。他家所在的遵义，是一个从四川划分到贵州的地方，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文化杂糅的地方。直到多年后，那些不断在脑海中闪现的面孔才提醒他，自己身上始终存在着与家乡同频共振的渊源。


（蔡小川 摄）

电影《无名之辈》取景地都匀的日常街景

边远小城

在北京见完饶晓志的第二天，我来到《无名之辈》的拍摄地都匀。这是一座地处贵州南部的县级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户籍人口50万左右。都匀没有机场，我只能先飞到贵阳，再从贵阳乘坐30分钟的高铁。然而这天，我计划乘坐的列车却被困在路上。"遵义下暴雨，发大水了。"售票员告诉我。问能不能改签，答："今天的票都没了，都抢着去（旁边的）榕江看'村超'了。"我只好转乘汽车。

来都匀之前，我请饶晓志介绍一位当地的朋友带我转转，饶晓志笑了，这还用介绍啊，当地很多人都知道这电影在哪儿拍的。坐上出租车去酒店时，我问司机："您知道《无名之辈》在哪儿拍的吗？"他立刻指向不远处的西山大桥，"就是那儿啊，拍的时候我都来看了，现在成网红景点啦"。

都匀城不大，站在九龙寺的山头上，几乎可以一眼望穿。在《无名之辈》外联制片范颖轶的带领下，我和摄影师一路步行就逛完了电影的几个主要取景地。都匀早年沿着剑江河呈南北走势，后来再朝东西两边扩建，由于东西方向多山，城市的宽度始终受限。都匀人傍水而居，剑江河两岸全靠桥梁连接，都匀号称"高原桥城"，全城不同风格的桥梁多达近百座，最古老的白子桥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这里没有界限分明的新、老城区，往往是老建筑旁边就耸立着几栋新建筑，高低错落。这些特征，都是饶晓志相中它为取景地的理由，"空间层次丰富，整个逃跑的动线拍起来有意思"。

这些桥，在《无名之辈》中处处与剧情呼应。桥成为一种隐喻，既是人物走投无路的困境，又是绝处逢生的希望。片中笨贼章宇与瘫痪姑娘任素汐有一段对话：

“你说为啥子会有桥呢？”“因为路走到头了。”“那桥也是路啊。”

都匀是章宇介绍给饶晓志的，是章宇的老家。几番实地勘景以后，饶晓志很满意这座小城的烟火气，这与他遵义的老家有共通的气质，随处可见站在路边卖菜、坐在路边吃饭的人，即便深夜，街上也到处是走动的人。西山大桥的旁边就是一条宵夜街，午夜12点，年轻人的大嗓门响彻河岸。范颖轶是土生土长的都匀人，他告诉我，都匀的年轻人，哪怕一个月只拿三五千，也敢一晚上花掉一两千。宵夜、酒吧、KTV、麻将馆，想娱乐的人总是不缺去处，在二十五六度的凉爽夏夜里，舍不得睡去的人宁愿躁动起来。

对饶晓志来说，《无名之辈》的故事是先有了人，才有了场景。那些始终企图对抗命运的人，让贵州成为最适合安置他们的场域。有时候，仅凭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他就能迅速找到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仿佛是同一地域的人身上自带的雷达。38岁的范颖轶身上也有，《无名之辈》中的那些人，仿佛都是从他记忆中走出来的朋友。他20多岁时，身边全是想出人头地的朋友，该奔的奔过，该闯的闯过，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志气。他说的这种“志气”，具体讲不清楚，但和字典里的“志气”不是一回事，“哪怕身上只有50块，也要买包45块的烟”；有时表现在特别能吃苦，“反正已经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了，就放手一搏呗，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范颖轶拿自己的一位朋友举例，什么活儿都干过，跑过车、干过工地、搞过装修，“没办法，都是逼出来的，能干的都干”。而他自己的经历也颇为丰富，做过厨师、开过酒吧，干过十几种不同的工作。摆在大家面前的稳定工作不多，无非是在医院、银行、机关任职。

都匀曾有过一段还算辉煌的历史，那是一段少有人知的过去。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开展大规模“三线建设”，贵州成为重要腹地，来自全国的100多家军工企业和20余万职工迁入贵州，集中在都匀、遵义、六盘水、安顺等地。都匀是电子军工基地之一，范颖轶的父母当年便是从重庆迁到此地工作的，他也成为一名工厂子弟。章宇和他一样。他们从小都是在工厂的学校上学，去工厂的医院看病，直到80年代末，都匀跟上国企改制的浪潮，工厂没落，下岗的人们纷纷自谋出路，各路小生意成为首选。

如今，整个贵州都在积极寻求转型，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到文旅行业，耗资数十亿打造的秦汉影视城以及火爆全国的“村超”都是成功例证。当年《无名之辈》的拍摄也曾得到了都匀政府的大力支持。西山大桥位于交通要道，但剧组仍能争取到两周时间用于拍摄，每天从晚6点拍到第二天早6点。《无名之辈》带火都匀后，来拍摄的剧组多起来。2022年，饶晓志监制的网剧《消失的大象》也来到都匀取景，剧情带着一股熟悉的味道：五线小镇象城准备转型，举办“国际盛事”万人马拉松，一位落魄青年想搭上这趟顺风车，却意外卷入伪钞案的旋涡之中。黑色幽默的故事继续在这座小城上演。

个体生命经验

在饶晓志这批电影人出现之前，贵州其实也曾多次作为故事背景被呈现在大银幕上。2002年，由陆川导演、姜文主演的电影《寻枪》在贵阳的青岩古镇取景，这里是姜文极力推荐的地方，他小时候随父母“支左”（“文革”期间，军队被派出支持“左派群众”）来到贵州，在这里度过了几年小学时光。故事以寻找一把丢失的枪为线索，带出一桩命案的真相。小镇陡然起伏的地势、迷雾遍布的天气，营造出影片扑朔迷离、躁动不安的气氛。

对饶晓志来说，《无名之辈》的故事是先有了人，才有了场景。那些始终企图对抗命运的人，让贵州成为最适合安置他们的场域。

后来，王小帅的“三线厂矿”三部曲也将一段残酷青春安放在贵州阴郁潮湿的环境中。《青红》（2005）中高圆圆饰演的女孩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从上海来到贵州，女孩对新家乡渐渐滋生的情感却与父母渴望离开的意志发生冲突，最终导致自己和男友的双重悲剧；《我 11》及《闯入者》，相继在犯罪和谋杀的剧情中将这种情绪推至高峰。2012 年蔡尚君导演的《人山人海》更是直接用灰白色的喀斯特原生态地貌来映照麻木残忍的人性。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安燕长期从事电影史研究，她认为在非贵州籍的创作者视角下，边远地区滋生罪案的荒蛮气息被聚焦放大，而到了饶晓志等一批本土创作者手里，贵州被去除奇观化的凝视，回到了一片既藏污纳垢又生生不息的土壤。“他们丢掉了历史包袱，只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

具体到饶晓志，他的生命经验绕不开青春时期的县城生活，在遵义山区的响水村长大，在桐梓县城上学，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底色。

从都匀往北走，途经贵阳，便可抵达遵义桐梓县。我和摄影师租车前往响水村。车子驶出桐梓县十来分钟后，眼前兀然出现一座座崇山峻岭和悬崖峭壁，提醒我终于来到了贵州山区。此后一个小时的车程里，车子始终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之中，迷迷糊糊中驶出一条弯道后，我被跳入眼帘的景象惊醒了。一片云雾缭绕的青翠山谷中，点缀着一串连绵的白色房屋，悦耳的鸟鸣声盘桓上空。一查地图，这里就是响水村。

走进村庄，摄影师拿起相机“扫街”，引起村民的警惕，好几次过来询问我们在做什么。说明来意后，村民带我们去了镇上的集市，“逢三和八都是赶集日”，显然是按农历的算法。这里的集市仍保留着几十年前的布局，什么东西都可以摆在路边叫卖，猪肉、豆腐、干豇豆、塑料拖鞋，喇叭里高声叫着：“衣服 20 元一件，件件 20 元。”我想到饶晓志在北京时跟我说到的 30 年前的响水村：他被爷爷奶奶牵着去赶集。村里总是停电，学校在半山腰，到了晚自习时，山上一排排的马灯就走动起来。他父母都是老师，村里的孩子多半都是父母的学生，这让他在村里很受宠，晚上经常跑去别人家睡觉。街上的铁匠有次从水库打上一条大鱼，大到需要四个人抬，整条街的人都被请去一起吃鱼。镇上还有一位电影放映员，过年过节，总能在路上遇见他，身上挂着各种电影的拷贝，遇到车他就搭一段，没有车回县城就要走三四个小时。

小学五年级时，饶晓志随工作调动的父母搬到桐梓县城。桐梓县北与重庆接壤，如今坐高铁去重庆只需一个小时。这里比都匀更凉爽，除了商业中心的几条街道相对热闹，其他地方都行人稀少，商店有一种未经装修的八九十年代的简朴感。饶晓志的青少年时光基本在这里度过。2022 年他执导主旋律电影《万里归途》，情节和贵州本来不搭界，讲的是中国前外交官在努米亚共和国的战火中历经艰难组织撤侨的故事，但在结尾的镜头中却闪现了“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的字样，作为万里归途的终点。导演的乡谊、人情由此可见。

贵州多山，以交通不便闻名，但上世纪 60 年代开通的川黔铁路以及川黔公路在半个世纪前便途经桐梓，给小县城带来川流不息的人群。桐梓老火车站离饶晓志家所住的小区仅百米之遥，后来因为铁路老化，雨季经常线路中断，几年前才转为货运线路。在懵懂的少年时期，饶晓志和身边朋友都觉得桐梓县就是个大都市，其实那时县城最摩登的地方只是一个带喷水池的大转盘。小学毕业时，他和一帮同学约在一家锅贴馆里庆祝，一名同学喝着杨梅酒，大声宣告：“全世界我就知道中国，全中国我就知道贵州，全贵州我就知道桐梓！”

县城历经几拆几建后已经变样，现在饶晓志回去，发现脑子里的画面都对不上了，乡愁也无处可寻。城市化的滚滚进程，以一种庞大的气势笼罩着每个人。《无名之辈》中，“眼镜”和“大头”的本名分别为“胡广生”和“李海根”，寓意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生，然后被迫留守在贵州的人。进城务工的两人迷失在新旧更替的高楼大厦之中，努力寻找栖身的位置。

在当年缺乏娱乐资源的桐梓县，香港电影开启了饶晓志这代人的文化启蒙。“县城的世界不大，

日复一日，但电影带给我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详谈·饶晓志》一书中，他提到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带他去县城电影院，里面都是年轻人，穿着喇叭裤，大家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弹座椅，发出一片“哒哒哒”的声音以示催场，整个影院充满躁动的气息。

香港电影对饶晓志的影响，总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踪迹。《无名之辈》中，“眼镜”和“大头”这两个笨贼在落魄中维持着兄弟情谊，“眼镜”对“大头”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先拿钱把装备更新。老子整把AK，给你弄把来福，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也是在县城的青少年时期，饶晓志萌生了进入影视圈的念头，不过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演员。“那时候并不知道表演和生活有什么关系，只是羡慕演员身上的光环。”那时候饶晓志只知道有个北京电影学院，并不知道还有中央戏剧学院。当时明星黄磊是北影的老师，饶晓志和同学就一起给他写信，信中详述了自己的出身和对表演的向往。后来收到一封回信，里面夹着一份招生简章，他看完就“绝望了”，上面写着考表演系对视力的要求，而他却是个近视眼。考北影的念头就此放弃。

1998年，饶晓志考上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之后，摆在面前的路不多，就在他不知道何去何从时，一位师哥无意中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这位师哥刚去中戏进修了一年回来，他插班读的正是后来出了章子怡等一众明星的96级表演班。师哥向大家讲了许多在中戏的见闻和感受，告诉他们中戏和贵州艺校有多么不一样，这让饶晓志听得入迷，走出贵州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2001年，饶晓志考入中戏，这里的求学生涯彻底打开了他的眼界，他开始了解戏剧，知道了塞缪尔·贝克特、路伊吉·皮兰德娄，从此对荒诞派戏剧产生浓厚兴趣。回想当年跟他一样立志要考北电的同学们，后来大多去读了师范类学校，大家就此走上了人生的三岔路。三十几个同学中，如今只有三个人从事本行，还都是饶晓志劝来的，他对他们说：我们得走出去，不然没有出路。

2008年饶晓志和李亚鹏联合成立春天戏剧工作室，7年里导演并制作了9部话剧和舞台剧，包括《你好，打劫》《咸蛋》《东北往事》《蠢蛋》等，渐渐在戏剧圈有了一点位置。“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从天资到各方面，甚至我的经历也没有过于异类的事。”多种场合里，饶晓志都很乐意提起自己的出身，并用“小镇青年”的身份来描述自己。从小到大，他一直在努力往外走，这个过程被他描述为，“不断打破一些东西，再不断重建一些东西”。故乡的印记一点点在他身上淡化。

在安燕这样的研究者看来，贵州新一批创作者各有特色，毕赣在民间信仰的浸润中展现出一种神秘，陆庆屹在偏安一隅中体现出自然主义的淡泊，而饶晓志和故土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继而与普遍的现代化联系更紧密。“他随时都可以跳出地域。”言下之意，饶晓志的创作对地域的依赖没有那么强，后来他拍了一系列商业电影，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2021年他发起成立晓年青剧团后，一口气签约了10位青年导演，并宣称未来5年要在不同城市设置5个“晓剧场”，让剧团形成集体效益，不再耽于一部戏的成败。剧团还将涉猎广播剧、剧本杀、密室逃脱、即兴戏剧工作坊等不同领域。饶晓志自嘲这可能是因为小镇出身带来的影响，在很多关键性的抉择上，他都体现出一种理性和谨慎。即便做影视项目，他也始终重视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平衡。《无名之辈》之后，他开始进军商业电影，《人潮汹涌》和《万里归途》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

《无名之辈》以后，饶晓志再没有回过贵州拍戏，“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使命感”。仿佛他的乡愁和青春情绪已得到抒发，想说的话暂告一段落。不过，他仍然推荐了两部自己监制的戏去贵州取景，“这里适合黑色幽默、有小城质感的故事”。

从小到大，他一直在努力往外走，这个过程被他描述为，“不断打破一些东西，再不断重建一些东西”。



王一通
“荒诞就是把世间万物都打上书名号的过程”

记者 · 卡生

《宇宙探索编辑部》并不是一部称得上典型的南方电影作品。提到南方电影，我们脑海中会产生一些固有的关键词，比如说，“潮湿”“超验”“神秘”“魔幻”。但在影片中依然能看到在特有的南方叙事空间里的情感经验和神秘奇观，借由一群人对宇宙外星文明的探寻，展开了一场对人生意义的追溯。

空间隐喻

《宇宙探索俱乐部》的拍摄地在四川宜宾和雅安荥经附近，编剧兼主角之一的王一通就出生在雅安荥经。在影片里，他寄身于乡村少年孙一通这个角色所写的诗歌深受观众喜爱。在网易云上，王一通上传了他用方言念的诗歌专辑《通往鸟烧窝村广播站的路上》，竟然很快卖掉了两万多张，这在诗歌低迷的时代的确是一个让人惊讶的数字。

见到王一通时，他正以演员身份参演一部新片，离杀青还有几天时间。我们相约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一个顶楼花园，他刚结束一天拍戏，落座之后说想要喝一口热汤，他今天在戏里吃了五六个



（陈博 摄）

左图：《宇宙探索编辑部》在四川宜宾和雅安荥经附近取景

右图：王一通做过导演、编剧、演员。相比这些角色，他更喜欢小说家这个职业

冰淇淋。相比第一次见面，王一通瘦了一圈，他为剧中角色减肥，比起《宇宙探索编辑部》时期的“孙一通”，少年感又添了几分。

《宇宙探索编辑部》是2023年很独特的一部院线电影，甚至很难确切地描述清楚它的类型。你可以说它是科幻、文艺、喜剧、荒诞、黑色幽默，但似乎又都不是。导演孔大山告诉我，这个电影不能算作科幻电影，这样“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状态，更像一种“民间科学”。王一通告诉我，“荒诞就是把世间万物都打上书名号的过程”。正是因为影片存在多重的解读空间，让这部影片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均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当时定档在4月1号，这个日期也颇有“玩笑”的意味，只不过这是一个严肃的玩笑。

影片讲述的是《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主编唐志军面临着杂志即将倒闭的现实困境，为了拯救编辑部，写出吸引读者的报道，他带领一群人前往西南腹地寻找外星人的信号。影片中出现了各种超自然的奇观混合着“民间科学”的田野调查，一切真真假假，亦幻亦真。“村子里走丢又出现在河滩边的驴”“伫立在村庄中的石狮和嘴里消失的球”“深山中出现的废旧太空舱”，以及“孙一通在洞穴外被麻雀卷走的神迹”，如果换一个地方拍摄是否还有现在的效果？南方空间给这样的“白日梦”情节提供了怎样的存在的合理性？

影片取景地之一是王一通的老家，四川雅安南边的荥经县，离雅安40公里。我和摄影师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沿途风景渐渐呈现平原到高原的植被变化。这座小城被群山环绕，常年有雨，即使是晴天，天空中也总有厚实的云层遮蔽直晒的阳光。在《宇宙探索编辑部》的采风时期，拍摄地确定在四川后，王一通和孔大山就在宜宾和



（陈博 摄）

荥经常常下雨，多云、大雾、潮湿，这里的植被郁郁葱葱，这样的天气与植被给叙事表达增加了一层神秘感

荥经附近辗转。两个地方的地理地貌和天气都极为相似。“鸟烧窝村”最终选在宜宾，但影片里发现宇宙飞船以及遭遇一对新人拍婚纱照的场景是选在荥经附近的河滩边。

我们途中看到很多村庄，或是房子年久失修，或是村子里的年轻人已经全部离开，只剩下老人固守此地。在路过一个村庄时，在公路和村之间有一个小拱桥，我想如果鸟烧窝村选择这里一定也很不错。王一通看了我拍给他的照片说，这个地方的确是当时鸟烧窝村的备选之一，但后来没有选是因为那个拱桥是新建的，觉得太新、太突兀。而我们照片里的拱桥，仅仅几年光景，已经分辨不出新旧。福柯曾说：“如果在今天的语言中，空间是让隐喻最痴迷的东西，这不是说空间因此提供了唯一的依赖，但正是在空间中，语言从一开始就展开了，在自身上滑动，规定了它的选择，描绘了它的形象和转变。”《宇宙探索编辑部》便是对过去时代的一首挽歌，在新与旧的交替中，以唐志军为代表的这类人是被时代遗弃的，在他的精神世界和现实困境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裂缝，故事发生于这样一个远离中心的南方，那种对意义的渴求和寻找才更具有了真正的浪漫主义气质。西南环境的植被、天气以及相对静止的生活方式，给影片营造了一种天然的基调，王一通说：“影片虽然神神道道，但有一种未被定义的自由感，是一种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想象和浪漫色彩。”

方言诗

开拍前，孔大山带剧组在村子里采风，想试拍一些东西。他买了一口锅和一身蓝色运动装，让一起勘景的王一通试试。孔大山拿着 DV 在后面拍，王一通在前面走，走得呆呆的，就像被外星人附身了一样，他当时就觉得，王一通就是影片里的少年诗人孙一通。进入到创作环节后，王一通调度了小时候住在村里奶奶家的记忆，以孙一通的身份写了十七八首诗。

在路演过程中，很多观众觉得王一通这些诗和毕赣在《路边野餐》里写的诗很像，因为他们书写的都是和南方相关的潮湿、暧昧、神秘的记忆。但实际上，王一通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们俩写的诗像？大部分的原因是我们都在影片里用方言念诗，但如果注意听那些诗歌，你会发现无论是意境还是所指区别都很大。”

毕赣是贵州人，在西南地域外的人听来，贵州话和四川话没有太大区别。毕赣写“背着手，在亚热带的酒馆，门前吹风，晚了就坐下，看柔和的闪电”，透露着电影里中年人的惆怅、遗憾以及迷醉中的平静，是一种非常老练的感怀。王一通饰演的孙一通是一个家里穷得只有一本《新华字典》的少年，他无父无母，一个人住在自家的老屋，他“把麦穗打成灰，在幽深的咀嚼中，大雪过镜，困住风的气球开始斑斓地远行，蝉鸣铺

满河床，人们聚在秋天的岸边”，“麦穗”“大雪”“蝉鸣”“岸边”，是大自然给这个少年的“先验性”表达的天赋，也是那个闭塞村庄里唯一的生活乐趣。

王一通给了我一个县城附近叫火烧桥的地址，那里和他小时候印象中暑假去奶奶家生活的村庄很像。途中我们碰上了一辆运菜的车子，车上载着西红柿、土豆，走到一个村子停下，便有村民来买自家无法栽种的菜。车上装有喇叭，方言叫卖声响彻山谷。

在去过火烧桥之后，我重新理解了所谓的“奇观”。电影中，生活在村里的孙一通说出来的话总是很朴素。唐志军问他：“你平时以什么为生？”他回答：“我家里有一只老母鸡，但我们关系处得不错，我不舍得吃她下的蛋，所以我就用蛋去徐天顺家换一些大米。”这是一种白描，但由于其中的叙述有城市人遥不可及的陌生感，让这种对话具备了某种意义的抒情与纯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王昕说：“无论是《路边野餐》还是《宇宙探索编辑部》，都给诗歌提供了一个恰当安置的方式。当它在这个影像空间里存在时，与影片中的人物、环境、情绪融为一体，在意象上形成一种交互，所以诗歌在电影里的存在会更强调其音乐性和感受性，它制造了既陌生又熟悉的一种体验。这也是他们所写的诗歌能够获得观众共鸣的一个原因。”

王一通将《宇宙探索编辑部》中那些没有用上的诗歌上传到了网易云。他说：“诗歌是需要朗诵的，语音、语调可以还原一个在场感，尤其是方言朗诵会带来一种强烈的间离感，听得懂或者听不懂都不是重要的，这会让观众一边听一边看文字时，产生一种奇妙的韵律感。”相比文字，他认为诗歌通过听觉系统可以抵达一个更远的地方。

超验与荒诞

孔大山与王一通的相识是从早年各自创作的短片开始的。孔大山在贾樟柯组织的柯首映上通过短片《杀猪匠》注意到了王一通，王一通则是因为看了孔大山2015年拍摄的一部伪纪录片《法制未来时》而感到惺惺相惜。

《杀猪匠》虽然只有四分钟，但能看出王一通的粗粝和生猛。乡村有一个习俗，每到过年过节都要杀猪。拍摄源自一次“生态猪肉采购活动”的观摩。“那致命一刀非常需要技术含量，浅了杀不死，还会闹得人仰马翻，深了猪肉就不好吃了，血液倒灌。”这次观摩，让王一通惊呼：“我当时几乎疯了，生出了一种使命感！一种关乎本初的刺激！一种达到哲学高度的自觉！”托了亲戚，他找到了火烧桥村的杀猪匠杨德富。影片里有杨德富杀猪的高光时刻以及看什么都不顺眼要骂两句的日常，这让王一通想起了尼采的“都灵之马”，他要把“雅安之猪”献给尼采。后期剪辑里王一通配上了狄兰·托马斯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以及一首《我的心在燃烧》的德文歌，那种语义和画面的错位、爆裂以及残酷，让贾樟柯看到了他身上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才华。

近距离接触王一通，会发现他是一个擅长隐藏自己的人。比如他用孙一通的身份写诗，那是一种极度安全的抒情，比如在一段悲情的回忆之后，总会添上一些消解苦痛的视角。这种视角不远不近，不亲不疏，不会让人觉得过度忧郁，又不会觉得过度戏谑。

有一次母亲和他一起翻看相册，翻到一张婴儿时期的照片，里面是母亲抱着他在老院子的橘子树下，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天空上掉落一个红色的东西，他如实把这个感觉告诉母亲，“当时我妈惊呆了，她说当时舅舅家住在四楼，并且从阳台上扔下了一个红色的气球”。王一通并没有神化这些记忆，他只是觉得日常生活中时不时会闪现出一些不可名状的时刻，这些记忆点全都是以视觉记忆的方式存在于脑海中的，“我怀疑人的记忆其实并不会丢失，只是没有被唤醒”。

王一通每次回来，总会发现县城变了一些模样，河边起了带电梯的高端楼盘，桥墩子上新建了凉亭，和雅安市的极为相似，只不过这个地区多雨，新建的亭子没过多久就变得斑驳。唯一的一条老街被拆得只剩下一半，据说最后一部分也

将在最近拆除。

这里和他小时候的记忆早已有了偏差，但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创作依然和这个地方息息相关，无论是《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的诗歌，还是他正在写的一个以县城为主的短篇小说集，回忆的种种皆是以这个西南县城里各色人物为灵感的故事。

“这是一个地道的熟人社会，出去吃一个早点，你不付钱也会有人帮你付了，出去散步都要和人打无数个招呼。”荥经太小，十几万人的县城，骑上摩托车15分钟就能逛个遍，注定不是一个能留住年轻人的地方。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和摄影师回到重庆，关于这座县城的一些片段竟时不时浮现，比如它的清凉、慢节奏、好吃、松弛，以及河流两岸无所事事漫游的行人，是那种你久居城市之后会极容易怀念的场景。我突然理解了王一通所说的距离感，“故乡的概念成为想象，与它保持适度的距离，你会不自主地在脑海里形成对它描写的冲动”。尽管现实里，那只是一个在春节才会回去待七天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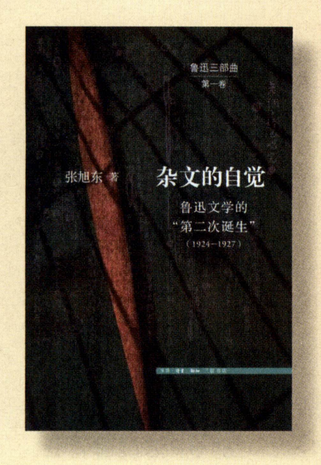
荥经并不是一个有太多外来游客的小城，很多游客会止步于雅安市，或是前往它周边的牛背山和龙苍沟旅游景区。所以，当陌生人进入小城，当地人可以一眼识别出外来者的身份。小城生活很慢，慢得让人发慌。“这座小城一直没有变的是那条流经县城的河流。”王一通说。人们在河边散步、跳舞、钓鱼、谈情说爱，周边有那种老式的理发店、棋牌室、餐厅。河流上游建起了水库河坝泄洪蓄水，每一年开闸放水前，县城的河边每隔一两百米就会用高频喇叭发出警报，那声音刺耳且洪亮，让小城处于一种极端紧张的气氛中。上高中时发生过一件让王一通感到震撼的事，班级里最受欢迎的一个男同学下河游泳时被淹死了，很多女生自发到河边给他烧纸，河边星星点点的火光忽明忽暗，这一幕给他留下了奇怪的记忆点，他把这种感觉写进了剧本《灾星下的恋人们》，在这个故事中，他幻想着一个穿着校服的男同学逆流而上，从河流中走来。豆瓣上，《灾星下的恋人们》的词条写着上映时间是2025年，导演是王一通，编剧是孔大山。他告诉我，这个剧本目前还没有开拍，在电影创投会上很多前辈喜欢，但觉得应该把这个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从高中生变为大学生，但他觉得记忆中情绪的走样不是他要的。

《灾星下的恋人们》和失序有关。“外星文明降落在这座小城的山里，它发出了一种信号，在信号响起的时候，刚好河道里的防空警报同时响起，两种信号交织，让所有在睡梦里的人意识交汇，相互理解。所有人都在梦里看到了和自己有关的淹死的人。”在王一通看来，语言有时候反而是一种隔阂，人们很难在现实中达成的理解，或许在想象力的尽头可以完成。这种“打破隔阂，达成人类之间的共识与理解”的愿望也是《宇宙探索编辑部》里一个重要的概念。

在正在拍摄的新电影的剧组，王一通从演员角色里获得了一些新的体验。王一通近视，但眼镜度数不高，演戏时一般不戴。前几天拍的一场戏是需要他在臭水塘里游泳，导演要求他站在水塘里看看四周。突然有一刻，太阳变得猛烈，周围一切都开始发光，他看到远处岸上有一束光打下来，中间出现拱门一样的洞，两束一模一样的植物像火炬一样立在两旁，他凭着直觉，朝着那个洞走去。那种不明意义的时刻是他在电影世界里最有获得感的时刻。

很多电影工种王一通都做过，导演、编剧、演员，但本质上他更喜欢做一名小说家。对于王一通而言，那是一个彻底成为自己的职业。他从手机上发来自己刚写完的一个短篇小说《河鱼》，“雅安有一种鱼，它只能在自然的水域生活，岸上的水养不活。更奇妙的是，它头上的骨头像一把大宝剑，小时候河边捞起炖汤，汤是纯白的……”。这种王一通小时候常吃的鱼，现在在荥经和雅安的饭店里几乎绝迹，这边现在流行吃椒麻江团鱼，麻辣俱全，符合大多数人对四川的想象。当地人的想象和外地人的想象已经再无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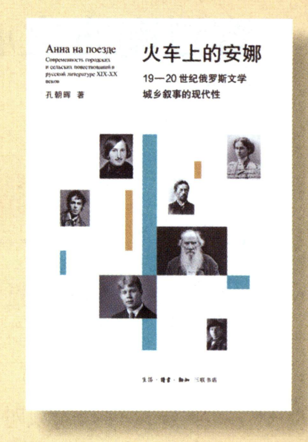
人们很难在现实中达成的理解，或许在想象力的尽头可以完成。



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

张旭东　著　定价：1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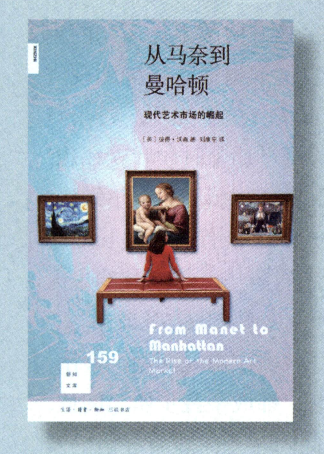
“鲁迅三部曲”首卷，分析鲁迅文学在1924—1927年间如何以“杂文的自觉”为标志从而“成为自己”。此期间鲁迅文学所面对的空前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压力，带来一系列深刻且不可逆的风格史及文学原理意义上的选择、决定和突变。



火车上的安娜：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城乡叙事的现代性

孔朝晖　著　定价：87.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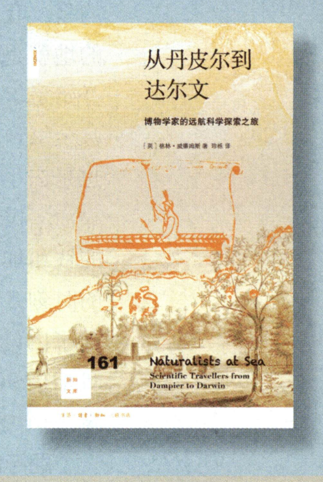
12位作家的12种命运串联起19—20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城乡叙事。在俄罗斯漫长而曲折的现代性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土地，西化与传统的冲突始终未能和解，而现代人在这冲突漩涡里的觉醒、激情与惰性，反抗、毁灭与妥协，正是典型的现代性体验。



从马奈到曼哈顿：现代艺术市场的崛起

[英] 彼得·沃森　著　刘康宁　译　定价: 79.00元

人们关于艺术的审美判断究竟是源自本心，还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控大众的审美取向？本书通过丰富翔实的材料，对现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细致详尽的梳理，对艺术和商业、美与金钱的关系做了深入透彻的分析。



从丹皮尔到达尔文：博物学家的远航科学探索之旅

[英] 格林·威廉姆斯　著　珍栎　译　定价：68.00元

“漫长的18世纪”，是太平洋大探险时代，大批博物学家首次远洋探险，从欧洲扬帆起航，去发现未知的异国动植物。本书就是这一群勇于奉献也离经叛道的探险学者的故事，科学启蒙时代的精彩人物会聚一堂，记录了一个充满了新奇迹的自然世界。



美国南方纪事三部曲

[美] 瑞克·布拉格　著

瑞克·布拉格，曾任《纽约时报》记者，1996年获普利策专题写作奖。布拉格是一个以“红脖族”（Red Neck）文风著称的南方乡土作家。

瑞克·布拉格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亚拉巴马州，这里属于美国深南部，是传统南方文化的核心区域。他的“美国南方纪事三部曲”《库萨河的查理》《悲歌长啸》和《蛙镇王子》，生动呈现了一个中国读者远未了解的美国。他以敏锐、生动、明亮的笔触，描绘着他的家族及其生活的时代，时间跨度从1920年代至今。超出家族史层面，布拉格还在书中记录了美国深南部社会面貌的变迁。在他力求克制的笔下，没有大历史的芜杂，没有大人物的荣耀，唯有普通民众的欢笑与眼泪、卑微与梦想，却也让读者亲历了一个个平凡而震撼人心的瞬间。

穿过南方之心，故事开始了

文 · 杨庆祥

故事可以不受限制地抵达任何时空。

我对南方的感知，起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在此之前，我生活在皖西南的一个湖区，以为世界之大不过就是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而它们对我的诱惑，远远不如我眼前的大湖。到了 90 年代，正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变化开始了。最直接的是，我身边的亲人们纷纷外出打工，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南方。最开始是男性，然后是女性；最开始是年长一些的人，慢慢地年轻的也跟着去了，甚至每到开学就发现班上少了几位同学，不用问，也是去了南方。他们带来了最直接的南方信息：靠海、炎热、说粤语、遍地工厂和老板、挣不完的钱和加不完的班。每年春节返乡是他们最高光的时刻，他们将南方以肉体和故事的形式直接带回了内陆，不过这些故事的主要内容，是金钱。我相信 90 年代中国大地上遍布了这样的南方故事：一个中国式的“淘金梦”，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一个翻身的传奇。但是作为一个少年，我在 90 年代体验到的却更多是一种乡愁。是的，我在内陆的大湖前意识到一个封闭但安全的文化开始土崩瓦解，数代人的宿命将是漂泊和迁徙。我并不知道他们将落脚于何处，因此也完全不了解南方故事的全貌。

2006 年我第一次去了南方，第一站是广东东莞。我在东莞住了一段时间，从事“普通工人精神生活调查”的相关社会调研工作。当我在东莞火车站出来的时候，接我的朋友说：“你这样穿很像是本地人。”我穿着宽松的 T 恤和短裤、拖鞋，其实一切是为了凉快。朋友告诉我，只有本地人才有资格这么闲暇，西装革履的都是打工仔。南方的初体验并不美好，在大巴车上遭遇过明目张胆的抢劫，在酒吧夜场差点与小流氓斗殴，朋友租的房子隔一条街就是灯红酒绿之地。所有的地方都挤满了大群大群的年轻人，空气中弥漫着青春和力比多的气息——仿佛一个眼神就会引爆战斗。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一个跟我少年时候听到的完全不同的南方，财富的后面有剥削，体面的同时有屈辱，奋斗的过程伴随挣扎，传奇与死亡、堕落密不可分。它们同样都是南方的故事。最初的南方生活就像一个梦幻，我常常觉得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错觉，因为过于真实、过于热烈、过于直接，人性反而变得不可琢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中国的南方应该拥有一群像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这样讲故事的人，应该有一个漫长复沓的南方故事，这南方的热烈繁华，这南方的虚无深刻，这南方的人歌人哭，这南方的方死方生。

在随后的这些年里，我多次由北而南，岭南、西南、东南、南洋、南海，都成了我步履、阅读、思考和想象的对象。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意识到了南方故事讲述的历史，它一直深陷失败和被凝视的漩涡，这一历史的讲述逻辑甚至可以上溯到楚辞。自从那以后，仿佛一种文化的基因，“南渡”“南迁”与“北望”“北伐”构成了一组对位的结构，并以前者对后者的仰望为叙事目的。这是基于中原内陆的地理文化意识所建构起来的宏大叙事，在这一叙事惯性里，南方往往止步于江南和中南，而更遥远的南方之南，几乎被烟尘和海雾湮没。一直到了近代，借助海洋贸易的便利，这遥远的南方之南才获得其故事的雏形。人群的流动和迁徙在多个维度展开，从内陆而沿海，由沿海而向海洋更深处，海洋变成了一种无法划定界限的空间，那是一片新的疆域，汉语也在漂泊和迁徙里获得了其丰富的生长和变形。

自 2018 年以来，我开始思考“新南方写作”


（张雷 摄）

广州荔枝湾老城区

的问题。我关切的核心要点一方面是“南方”作为一个拓扑学的地理空间在历史中的继承和断裂，另一方面我意识到地缘政治的变化将对中国故事的世界化产生巨大影响。我认为“在南方书写”并不等于“新南方书写”，或者说，我提倡的“新南方书写”并不仅仅指向与“旧南方”（江南、中南）的区隔，我汲汲关切的，更是“新南方写作”作为“文化书写实践”的历史指向，汉语只有通过这种书写实践，才有可能获得语言通用货币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流动性与可译性甚至可以与经济货币互为表里。因此，“新南方写作”是一种从历史中生长、立足于当下现实，同时指向未来时势的一种立体性的书写实践，它是纵向的，同时也是横向的，在这样的坐标轴里，它将加入并重绘世界文学的地图。我曾经借用黄锦树《迟到的青年》和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这两部作品来隐喻这一写作的远景：在历史中不断“迟到”的青年在中国的南方再次出发，他迟到的错位性恰好建构了其主动性，他驾驶着语言的潜水艇在远洋漫游，无目的性是他的目的，它在自我放逐的同时也重新勘探了世界（文学）的深度和广度。

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新南方的新故事。它首先是一个解码叙事的重述，在对宏大叙事的解码中，南方找到了其文化的自觉，它不再匍匐仰望，而是立足于自己的语言、历史和传统。同时，它不再求助于任何中心来赋予其价值，因为独一无二的生命情状和生活样态本身就是最好的价值。再次，它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讲述。它反对那种与现实同步的“浅写作”，“怎么写”与“写什么”高度同一，在这一过程中故事获得其普遍的美学结构。

故事可以不受限制地抵达任何时空。意见会过时，故事不会；放逐者因此赢得了空间，失败者反而获得了不朽。穿过南方之心，更汹涌澎湃的故事之海向我们涌来。故事开始了！时间也开始了！

（杨庆祥，诗人、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世界等于零》、《另一个世界的入口》等）

江与海之间的南方地理

主笔 · 邢海洋

古时，即使江南亦被视为瘴疠多毒之地，更遑论岭南，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迟滞了汉人南移的步伐。可每次中原战乱，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南压，尤其宋元时期，蒙古铁骑横扫，大批汉人在与瘴气、疟疾等不利环境博弈的过程中，逐步进驻并开发了岭南。

东南丘陵

你一定记得牛顿第一定律吧，也就是惯性定律，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地球在旋转，绕着地轴平滑地旋转，惯性使所有处于地球表面的物体都有被甩出去的倾向。我们在行进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跑偏了方向。这就是地转偏向力在起作用，在北半球，直行的你会倾向于偏向右走。但相对于我们的行走，地转偏向力太微弱了，几乎感觉不到。可对于河流，像长江那样水量巨大且昼夜不息地奔流，地转偏向力的作用要明显得多，河流的右岸会被不停地淘蚀。其结果就是，长江出了湘鄂西大山，一直在努力向南探寻。中国东部的地貌，长江的北面以平原为主，而南面是我国三大丘陵之首——东南丘陵，面积足有百万平方公里，比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黄河下游平原加起来的面积都大得多。

长江以南，浙江、湖南、江西、福建和两广，还包括安徽、湖北的江南部分都是山环水绕。这片巨大的丘陵地带北至长江，南至两广，东至大海，西至云贵高原，由大片低山和丘陵组成，也有山脉间杂其中，黄山、九华山、衡山、庐山、井冈山等都是其中典型的山脉。丘陵和山地，又呈现出北东—南西走向，平行于海岸线，仿佛是被太平洋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挤压而成形。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按照板块构造学说，扩张中的太平洋板块俯冲挤压欧亚大陆，在大陆板块的边缘便推挤出褶皱状的地表构造，在雨水、阳光和风等外力的作用下，就形成了北东—南西走向的山脉丘陵。我们古代的南方先民，就生活在这长江与大海之间不平坦的地貌之中。

“七山两水一分田”

我从杭州沿着新安江向着徽州进发，道路两边山峦连绵，云蒸雾绕，火车不时要钻入隧道。火车沿线，凡是地势稍缓的山坡都种上茶树，山谷则填平了，不再是“V”字形的凹槽，而是平整出的庄稼地。山峦围合的山谷，只留出了很小的沟渠，有的沟渠在田地中间，有的在山脚，随着山谷的大小和地势建设沟渠。在这里，几乎每一片土地都被深思熟虑地利用着，可如此寸土必争，意味着要面对大自然不规则的暴雨、泥石流等天灾的操弄。

到了徽州古城，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还是大山中间相对平展的一片盆地，可耕地资源依然稀少，有着“七分山两分水一分田”的说法。尽管如今黄山毛峰名满天下，能卖出好价钱，可一户人家只有很少的土地，地块还很分散，采茶集中在春天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那里的民生还是挺艰难。徽州人之走出大山讨生活，徽商行走天下，原因就在于资源匮乏不得不经商立业，于艰难中寻出生活出路。

鲁迅先生在《南人和北人》里提到，“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若非迫不得已，生活在最先文明化的黄河流域的北人是不愿意迁居南方的。鲁迅先生提到了《洛阳伽蓝记》里有多处北人对南方的不屑，我找到一处，北魏朝中一位大臣，乘着喝醉，对北魏


（视觉中国 供图）

新安江流域风景

朝廷自嘲了一下，“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于是他遭到了激烈的驳斥，“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攒育虫蚁，壃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即使在南北朝时期，南朝怀揣着自秦至汉流传下来的掌国玉玺，可当地民众无非是渔猎的部落野人，连刚刚汉化的北魏鲜卑族都怀有优越感。

瘴疠之地

南方对于北人，一个最大的环境障碍，是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湿气。有一年在广州，赶上春节后的回南天，雾气从大海北上，彼时南方的大地还没有从冬天的清冷中缓过来，水汽遇冷凝结出水滴，湿气无所不在，从地板、墙壁乃至玻璃上“钻”出来，那种湿冷让人难受到了骨头里，并且是无处可逃。不过，仅仅是湿气还算不得什么，古代北人来到南方，往往为山岚瘴气所病，那才是最令北人裹足不前的，杜甫在《梦李白》中写道，“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南方多水泽湖沼，瘴气又与湿热相伴，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瘴气与水汽联系在一起。其实所谓瘴气，实际上是一种传染疾病的蚊虫、按蚊。

北方战乱，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南方山高林茂，是躲避战乱的好去处。故而每逢封建王朝跌宕，中原地区动荡，大批的世家贵族便举家搬迁至南方。他们的迁居，并非均匀连贯，而是逃难，一批一批。每一批次都带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南方的“百里不同俗”，也和北人聚族而居有关系。

北方土地沦陷，逃亡江南的政权往往以北方的州县命名南方的地域，接纳北人，是为侨置郡县。以侨郡、侨县安置北方士族，保持其特权，还可以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

因为多山，南方林深树密，山峦间常笼罩着薄厚不均的云雾，虽然诗情画意，却给生活带来诸多麻烦。交通不便，人员交流隔绝，故而有“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说法。同一个乡镇，不同村说话的音调都不一样，跨乡的甚至相互听不懂。因为差异明显，南方人相互之间也有着比

较强的个体意识，小群体意识也相对较强，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很容易分辨出口音的细微差别，但对于北方人似乎都是一样的。

南北通路

南方多雨，有时候一片云彩一场雨，更多的是连绵一两个月的梅雨以及夏日汛期滂沱的大雨。南方的土地于是河流密布，千山万壑。除了长江和珠江，这里没有大河，但走在那里，却时时能感觉到江河融入了日常生活。宁波有甬江流过，甬成为宁波的简称；温州有瓯江，瓯成为温州的代称；金华旧称婺州，因为有婺江流过。河流名称与城市地名或简称同名，在其他地方有零星存在，在浙江却是“遍地开花”。

南方最大的两片水域还是和长江有着直接的关系，一片是洞庭湖，一片是鄱阳湖，两湖周边淤积出广阔的平原，是江南粮仓之所在。两座大湖均位于长江南岸，水面动辄数千公里，且接纳了来自更南方的水流，于是，溯溪而上就成了北方人向着国土最南端土地行进的通路。

北人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南方腹地，要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南征百越。第一次征战，始皇派出 50 万军队，分 5 军南征，每军要占领五岭中的一个主要的隘道，而占领湘桂两省边境山岭隘道的，就是其中的一股大军。这支队伍进击得并不顺利，3 年兵不能进，军饷转运困难，于是在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是为灵渠。

灵渠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上最早的运河之一，又因为发明了堰坝系统，在古代工程技术上独具意义。灵渠最了不起的地方，还在于打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的联系，自此北人沿着洞庭湖，走水路也能进入岭南，再直下广州了。

秦朝是个短命王朝，国祚不过 15 年，居然两次南征百越，足见秦始皇的雄心，但穷兵黩武也耗尽了国力和民心，秦朝二世而亡。第二次征百越，有一位副将赵佗在王朝兴替间，机缘巧合成立了南越国。今日广州越秀山边有一座南越王陵博物馆，就是赵佗孙子，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赵佗活到 103 岁，是帝王中最高寿的，他的儿子没有等到即位，于是传位于孙。这位来自河北真定的一代枭雄似乎对南方的山岚瘴气完全免疫，由此可见瘴气也如同天花或新冠肺炎，部分人天然免疫。

秦汉时期，国人的南北行旅，也多贴着中部山地，沿着山路南北而行。沿着洞庭湖和湘江翻越南岭大山，是那个时候古人的经行路线。我们看地图，从长安出发经南阳、襄阳直下荆州，坐船由长江顺流而下到岳阳，进入洞庭湖，在沿湘江一路直上桂林，经由灵渠转入珠江水系，即可直挂云帆去南海了。当然这种南北交通，不是不可能存在，并且是中学地理考试喜欢用的题目，但只要看看湘江在西南大山里蜿蜒前行的路径，就会感叹古时行舟之艰难，甚至怀疑，彼时南北交流的必要性。

到了唐宋，中国的地理中枢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都从西部向东部移动，广州成为国际贸易大港，南北货物和人员往来不再像此前那样似有若无，比洞庭湖更靠东的鄱阳湖，在交通方面的地位变得重要了。唐代开元年间，丞相张九龄主持在大庾岭开山辟道置梅关，这条借鄱阳湖南下的道路繁荣起来。

一条交通途路的繁荣，带来的不仅是商旅和经济，也带来了教育繁盛，由地灵而人杰。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来自抚州临川，即今江西省抚州市，这里现在并不起眼，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子之乡，晏殊、曾巩、晏几道、陆九渊、汤显祖等一大批名儒巨公皆成长于此，这里出过 7 位宰相、3000 余位进士，很多村子都是一门数官宦。

这条通路的繁荣一直维持到清代《南京条约》一口通商结束。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对外港口的地位被颠覆，上海一二十年内便迅速超越了广州，江南的财货由海路直接运往海外，不需要经江西翻越梅岭运往广州港了。

深入山岭之间

各地都在建设恢弘大气的博物馆，广州也不例外，珠江边和岛屿上，现代化的博物馆星罗棋布。可广州博物馆，却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改造的。这是华南首座博物馆，位于越秀山脚，利用的是一

座古老的建筑——建于明代初期的镇海楼。

镇海楼的名字让人好奇，通常，若是要“镇”，应该置放在被“镇”的物体边上，比如颐和园的镇水铜牛，再比如黄河边的开元铁牛。镇海楼建于明洪武年间，是当地罕见的5层楼砖木建筑，最初的名字是望海楼，“望”字其实比“镇”字语义更实，说明当时在广州是看得到海的。可如今，坐时速160公里的地铁，从广州城去南沙海滨都得半个小时。

秦汉时期的广州的确是海滨城市，其南边的中山和珠海还是海上的岛屿。珠江夹带的泥沙，南宋后加速堆积。广州南面，南海本来以一个“门”字的形状插入内陆，如今却被泥沙逼退，只留下一个不及当时五分之一面积的出海口。今日所谓的大湾，和两千年前的珠江湾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古时，即使江南之地亦被视为瘴疠多毒之地，更遑论岭南，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迟滞了汉人南移的步伐。可每次中原战乱，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乘势南压，尤其宋元时期，蒙古铁骑横扫，大批汉人在与瘴气、疟疾等不利环境博弈的过程中，逐步进驻并开发了岭南，明中叶以后，汉人深入南方山林之中做棚民，加速了山地的开发，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的破坏、土壤的侵蚀。而西南广大山地里富饶的土壤，被珠江转运到三角洲地区，成就了沿海士农工商的聚集。

中国的人口在清代爆发，很大一部分爆发在南方的崇山峻岭和沿海新开辟的土地之上。清朝开国时期人口是7000万，到了乾隆六年就增长到了1亿多人。过了52年，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全国人口突破3亿。道光时期，全国就已经超过了4亿人口。不足200年时间，人口激增了近5倍，并且，是过去的中国这块土地历朝历代极限值的3倍。这究竟该如何解释？一种解释是过去人口统计有误差，清代“摊丁入亩”了，才没有了瞒报。但人口的膨胀，却并非统计误差可以纠正的。

清朝的疆域面积比明朝大，更比偏安于南方的南宋要大得多，清朝仅在四川一地，人口就多出了几千万，在广西这样偏远的地区，人口也暴增。平原之外，丘陵和山地涌入了大量的开发者，南美洲原生的马铃薯、白薯和玉米等耐旱耐贫瘠作物的引种，刺激了高仰之地的开发，这是肯定的。

但清代中国人生活质量之低下，人均粮食占有量处于汉代以后各朝代中倒数第一，也得到了多种统计的证实。低水平的人口爆炸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似乎要从中西方的文化和技术传播去探求答案。

北方人到南方，对气候之不适，经常出现的词汇是山岚瘴气，瘴虐之疾。所谓瘴气，其实就是生活在潮湿环境里的按蚊。按蚊携带疟疾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疾病。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7世纪初，欧洲人将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引种到了欧洲。治疗疟疾的金鸡纳，也就是奎宁，是否传入了中国，并帮助人们克服南方山地的瘴气呢？另一个医疗上得到确证的事件是，按照马立博在《中国环境史》中的说法，在16世纪，中国已经掌握了一种早期的水痘预防接种方法，通过将受感染病人的痘痂粉末吹送进儿童的鼻孔，来激发人体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康熙还在皇室中推广过种痘。那时候的人们已经有了靠隔离来防止病毒传播的知识。而英国人詹纳发明牛痘还是19世纪的事。《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的作者彭慕兰则注意到，中国人对自然科学与数学的兴趣在17世纪时大增，特别是满族人入主中原后，那时的出版商发现了一个现象，贩卖医学书籍大大有助于销路。

马立博另一部讲述岭南环境史的著作《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新》则提到，宋元时期汉族移民对瘴气的免疫能力就提高了。这本书还着重讲了一个事实：汉人在南方的山谷间排干沼泽，平整土地，却把聚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排挤到大山深处。一系列水利设施的建设，使得汉人能够深入到土地肥沃的河谷地带，并逐渐取代了土著民族。而珠江上游农业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在蒙古人入侵时被南逃到珠江口的汉人拦截下来，遂成珠三角肥沃的土地。

烧荒的传统，日益加速的垦殖，南方丘陵和山地的森林分布日趋零碎，生态系统被不断消耗，华南虎不见了，大象也消失了。

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主笔 · 谢九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其中提到房地产时有一句重要的表述——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我国房地产在经历了 20 多年的高速市场化发展之后，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确认，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前 10 天，央行有关人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此次政治局会议，在最高层面确认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这种确认，既是对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最新总结，也是为未来房地产政策的出台奠定基调。

2003 年，我国房地产政策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从 1998 年之前的以保障房为主的新加坡模式，切换到以市场化为主的模式。这一年，我国首次正式确认了房地产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地位。国务院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指出：“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此为起点，中国房地产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狂飙之旅。从那时到现在，中央确定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间刚好 20 年。

所谓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过去中国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现在已经变成供过于求。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住房极度短缺，人均居住面积只有 8 平方米左右。正是在这种短缺局面下，我国开启了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在这种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之下，住房价格持续上涨。

经过了 20 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我国住房不足的局面已经大幅改观。央行在 2019 年曾经做过一次调查，按照当时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 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 58.4%，有两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 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占比为 10.5%，户均拥有住房 1.5 套。美国住户总体的住房拥有率为 63.7%，我国的住房拥有率比当时的美国高出 32.3 个百分点。按照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20 年，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为 41.76 平方米，与 20 年前人均 8 平方米的水平相比，大幅增长了 4 倍多。

当住房不再短缺甚至过剩之后，供求关系的影响很快体现在市场上，住房销售从过去的抢手变为滞销，直到销量大跌——2022 年，我国的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年下降 24.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26.8%；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26.7%，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28.3%。

我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我国房地产投资一直高速增长。1998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 3580 亿元，到了 2022 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达到了 13.29 万亿元，累计增长 36 倍，年均增速超过 15%，远远超过 GDP 增速。在这样的高速发展之下，我国的住房供应自然快速增长，很快就从短缺转向过剩。

从需求层面来看，支撑我国住房需求高速增长的主要是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城镇化比例不到 30%，经过 20 多年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发展之后，截至 2022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65%。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为房地产市场贡献了巨大的需求。不过，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甚至尾声，城镇化带来的需求会大幅减少。

过去 20 年，我国住房市场除了存在居住需求之外，还有一部分投资需求。由于房价上涨带来

巨大的财富效应，很多人都将房产作为最重要的资产进行配置，除了居住之外，还要拥有一套投资性住房。按照央行的数据，我国户均拥有住房 1.5 套，可以看出投资性住房的比例之高。

随着最近几年房价下跌，住房的财富效应越来越弱，尤其是我国的租金回报率很低，一线城市的回报率只有 1% 出头，甚至无法覆盖房贷成本，房产作为投资性资产的回报率越来越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不再将房产作为资产配置的首选，这就意味着，楼市的另一大需求——投资性需求也开始大幅萎缩。

从房地产市场的整体来看，供给持续增加，需求却越来越少，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对房地产展开多轮史诗级救市，但是效果并不理想。随着最高层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出最新定调，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房地产的刺激政策可能继续升级。过去一些对房地产市场的限制政策，有可能陆续迎来松绑。

7 月 14 日，央行做出表示：“考虑到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在市场长期过热阶段陆续出台的政策存在边际优化空间，金融部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政策研究，因城施策提高政策精准度，更好地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7 月 24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地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住建部迅速做出回应，住建部部长倪虹表示——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落实好降低购买首套住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改善性住房换购税费减免、个人住房贷款“认房不认贷”等政策措施。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认房不认贷”，这是过去遏制投资性住房而推出的重要限制性措施，这意味着政策层面对二套房的限制开始慢慢松绑。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过去在房地产调控时期推出的各种限制性政策，预计都会被慢慢解除。


（视觉中国 供图）

韩国房价"过山车"：疫情下的"全租房"之困

记者 · 刘畅　编辑 · 徐菁菁

韩国房价从疫情暴发开始暴涨，一年多翻倍，又用半年多的时间几乎跌回原点。如此剧烈的起伏，既是韩国全租房制度助推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缓慢的背景下，疫情期间宽松经济政策堆砌的泡沫迅速生灭的反应。当房价降幅趋缓，韩国经济或许将进入一个平稳的新周期。但在房价"过山车"行情中贷款的人们，还债之路却刚刚开始。

房价"过山车"

"2018年我买的是新房，在首尔西侧的市郊，与京畿道有一山之隔，一共花费了4.5亿韩元，相当于230多万元人民币。"李平离开中国到韩国生活已20多年，退休时看中了一套新房，房子虽然在市郊，但周边设施齐全，楼下就是地铁站，坐地铁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首尔市中心，相当方便。户型在韩国也是最受欢迎的，三室两厅，方方正正，建筑面积80多平方米，还有一个外挂阳台，足够他和老伴儿两人住。

选到这样的房子，李平并没有费多少周折。因为上一套房子周边设施差，他卖房时，十年之间房价几乎没有变化。他拿到卖房款后开始从网上寻觅首尔周边的新房。那时，除了像首尔江南区的房子因教育资源丰富，受非富即贵的人们追捧，房价一直上涨外，周边地区的房价很稳定。李平关注的区域整体价格在4亿到5亿韩元之间，多年未涨过价。他在网上找了两晚，就选定了房子。没想到，一年后房子落成，就赶上韩国房价近十年来最大的涨幅。

新冠疫情暴发后，李平家的房子价格开始飙升，到2021年就翻了一倍。同样的情况从首尔逐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韩国房市的风向标在首尔的都市圈

右图：疫情之前，韩国房价对社会各阶层来说并不是多大的问题（摄于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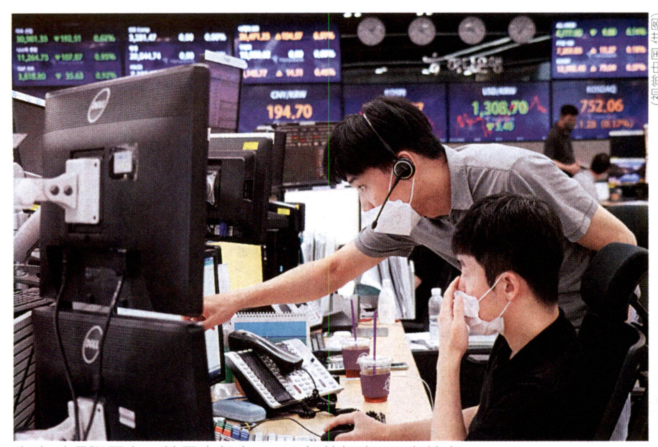
渐向周边蔓延。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首尔国立大学市场与政府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朴龙告诉本刊，2020年疫情暴发后，韩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大幅降低基准利率，2020年5月基准利率降至0.5%。如此低的基准利率维持了15个月，大量资金流入房市，推动了房价翻倍上涨。资料显示，2020年9月，首尔的公寓平均交易价格突破10亿韩元，到2021年4月突破11亿韩元，半年后又突破12亿韩元。那时就连北邻三八线的京畿道的公寓平均交易价格涨幅也超过15%，创了200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也是从2020年起，韩国政府出台抑制房价政策，比如提高首付比例、第二套房限购等。2021年1月，时任韩国央行行长的李柱烈表示，近期大量资金涌入资产市场，家庭负债规模也大幅增加，“2021年有必要适时有序地将宽松政策转为正常”。韩国央行开始加息，增加贷款压力，但看起来并没有遏制房价上涨的势头。

杜丽几乎与李平同时买房，只是买的地方是离首尔更为遥远的金浦。房子在她韩国丈夫的亲戚家旁边，也是新房，周边设施一应俱全，建筑面积有130多平方米。杜丽头脑一热就买了下来。疫情以后，她眼见自家房子的价格从4亿韩元，一路涨到2022年初时的7亿多韩元。政府的限购政策出台后，因为担心房价下跌，杜丽把房子以7亿多韩元挂出去卖。但此时房市已然疲软，观望的人多，没有人接手。当她还想再看一看市场行情时，2022年3月房价就开始下跌，2022年末房价又回落到5亿韩元左右。房子便宜了，却更找不到下家。

杜丽遇到的情况是普遍现象。从韩国全国来看，2022年1月房地产价格首次下降，泡沫已经破裂。此后，因为美联储加息，为保持汇率稳定，韩国央行不得不加息，十几个月的时间里，韩国央行加息300个基点。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交易量骤减，不仅二手房市场无人问津，新房也卖不出去，甚至有开发商打出广告——“买房送奔驰”。

朴龙介绍，跌幅最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首尔周边城市。资料显示，2023年以来，韩国的公寓、多户型住宅等共同住宅公示价格较2022年平均下降18.63%，降幅创下历史新高。狂跌半年后，如


（视觉中国 供图）

为应对通胀压力，韩国央行在 2022 年曾加息 50 个基点

今的房价已经普遍降到 2020 年下半年的水平。降幅趋于平缓，房产交易量已聊胜于无。

全租房的推波助澜

“像完全依靠市场调节的股票，在数月内就能经历大起大落。韩国的房价在一年半时间里剧烈震荡，说明基本是受金融市场影响，政府的作用有限。”朴龙说。从 2021 年到今年上半年，韩国的房价获得广泛关注。推究原因，韩国国内质疑此前文在寅政府控制房价政策的效果，认为那些政策太过“温和”。

韩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一方面，疫情发生后的 2020 年和 2021 年，为刺激经济，韩国政府推出了总额将近 120 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直接发放补贴、放宽贷款要求等。但疫情阻隔，百业低迷，大量资金涌入房市，这是泡沫涌现的根本。另一方面，原本惠及弱者的全租房制度，在暴涨暴跌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全租房是韩国在月租之外的另一种租房手段，介于月租和所有权之间。租户与房东一般会签订两年的长约，签约之初，租户需缴纳当前房产市场价值 50% ～ 80% 的保证金，其后在整个租约期间无需支付其他租金，房东则需在合约期满后退还所有押金。租约期间押金的利息收入与租户无关，归房东所有。结合月租、全租，还有半全租，租户可以选择交一部分保证金，同时每月再交相对低廉的房租。比如全租是 3 亿韩元的房子，保证金如果交 1 亿韩元，每月就再交 50 万韩元的房租。

全租房可以让房东一下子拿到一大笔钱，相当于租户贷给房东的一笔款，抵押物就是房子，利息就是租户被免掉的租金。“这种方式金融风险低，购房的交易成本也低。”朴龙介绍。

这种租房制度看起来匪夷所思，但追根溯源，全租房制度在上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发挥过重要作用：一方面，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房东可以用保证金投资，或是存在银行里赚取利息；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加快，但银行贷款所依据的“信用”只能体现在有足够还款能力的高收入群体，而中低收入群体难以贷款，全租房可以成为中低收入群体解决刚需、在城市扎根的第一步。

从 2008 年以来，因为基准利率低，全租房成为解决刚需人群获得安身之所的重要途径。针对租户往往不能或不愿全款缴纳保证金的情况，银行会为他们提供专门的贷款，贷款利率比月租低。“一旦两年租约到期，房东有三个月的时间将保证金还给租客，这期间下一位租客会将空出的保证金缺口补上。如果没有下一位租客，房东又拿不出保证金，租户就可以把房主告上法庭，房子会被拍卖。因为保证金不是房价的全部，在房价稳定的时候，租户不会有损失。”对于房东而言，当房价走高时，贷款买房后用于全租，乃至通过全租房获得一大笔钱后再买房，就成为房价飙升的助推器。

既是房东又是全租房租户的杜丽深知其中的门道。与李平全款买房不同，她买下金浦的房子时，贷款了 3 亿韩元，先还利息，每月要还 80 多万韩元。她和丈夫工作、生活在蔚山，但没有余钱再在蔚山贷款买房，去年有了孩子后，便全租了一套公寓。她将金浦的房子按月出租，起初每月能收 90 多万韩元的租金，还能有些盈余。杜丽动过把新房全租出去的念头，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新房子全租出去租金偏低。一般的保证金可能是房价的 70% 到 80%。她的新房周边也都是新房，出租竞争激烈，最终保证金可能就只有房价的 50% 到 60%。“而且，如果别人知道我家是贷款买的房，会担心他们退房时，我们还不上保证金，就会选择其他家来租。”

杜丽的谨慎并不普遍。她在与房屋中介和朋

友的聊天中得知，“冒险”贷款买房出租，用保证金还房贷，乃至再买房的人并不少，甚至她全租的房子，房东就是用贷款买的房。

然而全租房制度既能迅速推高房价，也能将房价快速拉底。当房价快速攀升时，在加息周期下，随着利率走高，需要还的贷款接近或超过月租，越来越多的租客会选择从全租房转向月租房。资料显示，从2021年8月开始，全租房的数量逐渐下降，2022年韩国全国的租赁合同中，月租房的数量首次超过了全租房。

全租需求萎缩，房东很难从新租户那里获得足够的保证金，以将之前的押金还给租赁合同到期的租户，就会导致房东以大幅折扣价格抛售房产，助推房价下跌。又因为房价下跌，抛售或拍卖后的房子贬值，不足以覆盖所有的保证金，就会导致租户再也拿不回自己的全额保证金。“比如价值1亿韩元的房子，按房价的70%交保证金，就是7000万韩元，但房子跌到只剩5000万韩元。”朴龙说。

类似情况已经频频发生。据其他媒体报道，韩国住宅都市保证公社（HUG）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房东恶意不退还保证金的事件频传，仅在首尔阳川区新月洞就发生了157件，仁川富平区富平洞发生了189件，全南广域市发生了131件。

家庭负债之困

作为韩国房产市场的一个重要过渡手段，全租房曾为有抱负的外来人口安居都市提供了便利。但随着全租房在房市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却成为这轮房价波动的核心危机点。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韩国自有住房率常年不到六成，在首尔更是刚刚超过五成。租房的形式中，大部分还是全租房。韩国经济研究所在2023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称，韩国全租房贷款的规模高达1058万亿韩元。在韩国人的普遍观念里，年轻人结婚时起码要租得起全租房。一方面是因为婚后全租房比较方便，另一方面也是家庭经济实力的体现。“比如一套房子价值10亿韩元，保证金大约需要7亿韩元，其中的首付一般是2.1亿韩元，这笔钱往往由男方父母出。韩国家庭没有祖辈带孩子的习惯，一旦小孩出生，母亲往往就无法外出工作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是维持未来三口之家的保证。”朴龙说，像这样的刚需人群不会永远不买房，而是慢慢观望房价的走势。“韩国民众普遍知道房价是周期性的，当房价不再下跌或稳定增长，就是开始买房的时候。”

朴龙记得，2013年、2014年时因房价过低，韩国政府曾出台购房免除今后5年的转让税、给予首次购买住房的人年内免付购置税等优惠政策，甚至宣布将暂停公共住宅建设，以鼓励民众买房。从那时开始，房价有小幅回升，三四年内房价都比较稳定。从2017年开始，每年房价缓慢上涨10%左右，大家预感到新一轮的周期即将开始。不过相比上一个周期，这一次贷款买房后出租的人更多，房价跌幅也更凶猛。暴涨集中在首尔的中心区，而下跌则在周边城市更为明显，诸多特征都是整体经济发展放缓的表现。

“十余年前，韩国经济还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郊区大开发，有钱人一下子买十套房，即便房价下跌，经济增速也缓冲了房价下跌的势头。”朴龙介绍，汽车、造船、芯片是韩国制造业的传统强项。资料记载，上一次韩国房价暴涨时，韩国造船业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近40%，达到顶峰。2013年至2016年之间，这个比例稳定在35%左右，但到了2017年，韩国造船业就开始下滑，到疫情暴发前，其在全球市场的占比不到20%，而中国占据了70%。造船业也是韩国整体制造业的写照。“韩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已被中国替代。因为财阀牢牢把持着经济，尾大不掉，创新不足，汽车领域的核心零部件、芯片等高端制造业无法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GDP增速逐年缓慢下行，几乎每5年下降1%。”

在此背景下，房价暴涨完全因泡沫而起，下跌时没有缓冲，那些在房价上涨时贷款“上车”的家庭，从负债中走出来的时间也会更为漫长。尤其是因房子而身背贷款的人，比如杜丽，他们面临的问题远未过去。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在2022年公布的全球负债报告，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债务达到2.6万亿韩元，超过70%的未偿贷款基于浮动利率。

“房价下跌后卖不出去不说，央行加息后，每个月要还的贷款也水涨船高。买房时的贷款利率

是3%，现在房贷利率涨到了7%～8%。之前每月有80多万韩元的贷款，现在涨到了100多万，不得不将租金提高到每月140万韩元。”杜丽坦承疫情后迫于生计涨价的无奈。她丈夫是工程师，她面向中国市场做代购，疫情前两个人每月能挣700多万韩元，在当地属于中上等。疫情阻隔，代购几乎“清零”，他们家的收入降了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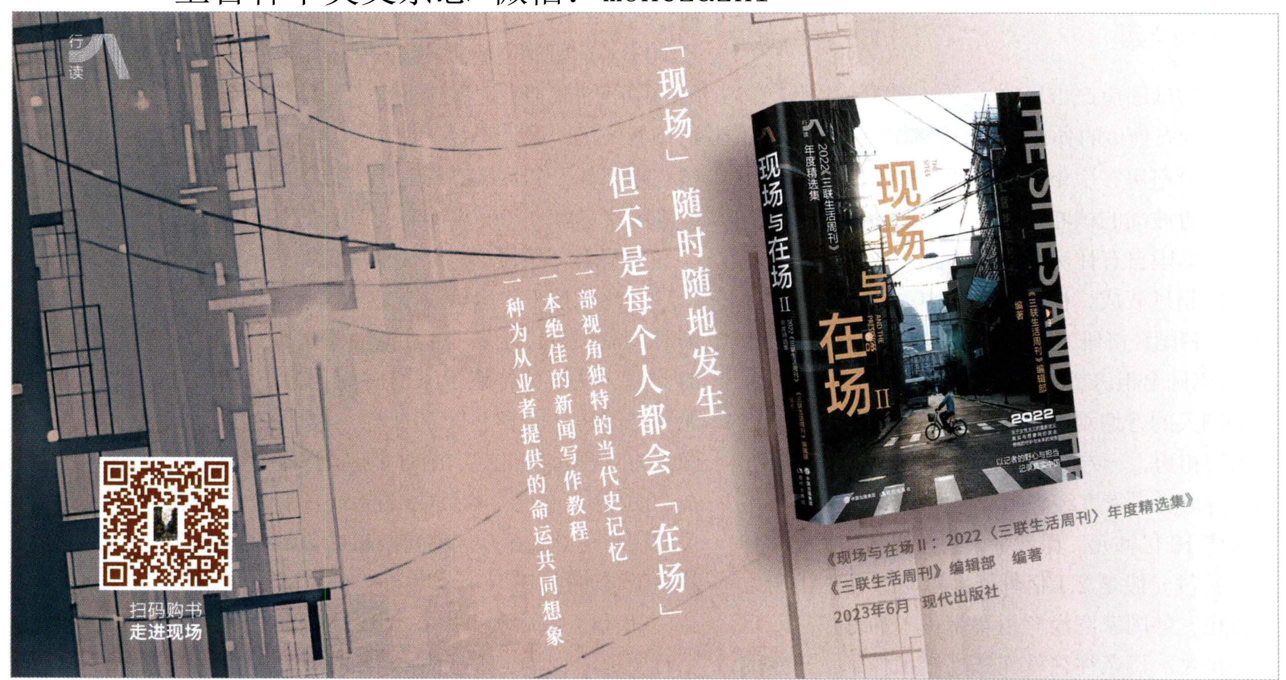
作为全租房的租户，杜丽在签订合同之初，要一下子掏出3.4亿韩元，看到房东是贷款买的房，就有了保证金收不回来的顾虑，为此特意买了保险——如果合约到期时，房东违约，保险公司可以先行赔付全部保证金。保险并不便宜，两年要缴80万韩元。“本来保证金就向婆婆借了7000万韩元，因为韩国有赠予税，每月还要给婆婆20万韩元的利息，一下子又拿出80万韩元。”杜丽说。

杜丽的防范措施十分明智。据韩国央行统计，在2022年，即使房东出售房屋，也有16.3万承租人承受着无法收回押金的风险。而朴龙预计，全租房群体面临的问题将在今年下半年全面爆发——2021年下半年是房价的最高位，全租房的保证金与房价挂钩，租约为两年，当今年下半年租约到期时，恐怕将有一大批租客拿不回保证金。资料显示，韩国全国在那个时段购买新房的家庭有14余万户。当年末韩国家庭信贷总额创下新高，达到1863万亿韩元，其中住房贷款占到一半以上。

从整体来看，韩国人的负债水平尚且不是很严重。即便家庭年均负债在2022年初达到8800余万韩元的极值，韩国的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6000多万韩元，负债只比收入略高一些，而且在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跌的遏制下，到2022年底时，家庭负债已略有下降。但在高位“上车”的人中，30岁一档的年轻家庭占主流。资料显示，从2020年以来，这一档年轻家庭的贷款占收入的比率大幅提升24%至260%以上。他们的负债，恐怕将抑制韩国未来的消费需求。

“就像2007年时在高位买房，房价下跌后，即便到现在也无法出手，始终陷于还债困境中的人一样，那些人后来被称为‘House poor’（有房的穷人）。”朴龙说，在2021年下半年“上车”的人往往是刚需，担心未来再也买不起房。而在如今人口减少、经济发展放缓的韩国社会，阶层固化，大学刚毕业仿佛就能一眼望到退休，难有一夜翻身的机会，还债之路将很漫长。他身边就有人把所有积蓄和股票都砸到房贷里面，“如今为了还房贷，晚上不得不额外做一些兼职”。

（李平、杜丽为化名，感谢刘冠雄对本文的帮助）




（插图：老牛）

一座浮桥背后的村庄利益与风波

记者 · 李晓洁

洪灾拓宽河道，村庄搬迁，村集体弱化，汽车进入乡村……时代变迁让一条河流和两岸生活的关系不断变化。村中“能人”看到河流、土地与桥带来的机会，一步步扩大自己河面上的“事业”，直到因桥而生的利益和怨恨都超出掌控。

申诉

2023年7月，黄德义成了振林村的“名人”。

7月刚过了三分之一，黄德义就带领至少三拨记者到达振林村边的洮儿河。正是汛期，洮儿河水面宽度超过百米，浑黄的河水还算平静，偶尔在河面上打一个回旋，翻出白色泡沫般的水花。黄德义站在河边，周围是嫩绿的水稻苗和湿草地，面前通常站着几位记者，拿起手机、相机对准他——一个56岁、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圆脸，头发是染后的黑色。他不惧怕镜头，衣领上夹着两个小毛绒麦克风，语速很快，从不停顿、迟疑。他用手指指着河面，蹦出几句顺口溜：“摆船有家训：十年九涝，不离河道，开物成务，行舟摆渡。（村民）有钱没钱都过河，利用安身以崇德。精义入神，以通道也。”

黄德义嘴里经常冒出几句顺口溜，编排的内容总与摆渡、过河、桥，以及老百姓与官员的对比有关。这些内容，是他平时读《易经》《道德经》


(长光卫星 / 视觉中国 供图)

6 月 30 日，“吉林一号”卫星拍摄的洮南洮儿河振林村段的河道和周围土地的卫星图，浮桥已被拆除

和其他杂书的感悟，也构成他过去 20 多年的生活——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村中“能人”，看到了河流、土地与桥带来的机会，建起了河上通道，最终因此获罪。

在黄德义的讲述里，他曾在吉林省洮南市瓦房镇振林村一所小学当老师。黄家在振林村的洮儿河段世代摆渡，上世纪 90 年代末，黄德义用摆渡船渡村民过河，后来建起了浮桥，他说摆船与搭桥的目的都是方便老百姓过河种地。2018 年底，他被人举报私搭浮桥、强行收取过桥费用，当年 12 月，浮桥被洮南市水利局执法部门拆除。但事情没有随之结束。

一位熟知案情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2018 年，正是全国扫黑除恶行动开展的第一年，多个省份公布了群众举报黑恶势力线索的奖励办法。接到黄德义非法搭桥、强行收费、可能涉黑涉恶的举报后，水利局和扫黑办一同前往巡查。浮桥被拆后，扫黑办将线索批转给警方。2019 年 2 月 1 日，黄德义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洮南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他自称被拘留近 11 个月。

拘留刚结束，黄德义就收到洮南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判决书提到：2005 年至 2014 年，黄德义和哥哥在振林村至安全村洮儿河河道私建船体浮桥，拦截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此后至 2018 年 10 月，黄德义组织家族亲戚排班并规定收费标准：小车 5 元、大车 10 元，仍拦车收费。其间，因非法建桥，不同的守桥人被洮南市水利局行政处罚三次，但黄德义等人继续强行收费直到桥被强制拆除，共计收取人民币 52950 元。另外，因浮桥强行收费，“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破坏社会秩序”，黄德义以寻衅滋事罪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2 年，其

他17人分别被判刑3到6个月不等，皆为缓刑。

与判决书一起到来的，还有黄德义被开除的教职。原本他还有8年就能退休，获得一份教龄42年的稳定退休金。但现在，他没了教职和退休金，失去了一个体面的社会身份，“连亲戚们都怨我”。他说自己这几年一直在申诉，直到6月29日，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的申诉立案，黄德义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更加忙碌。7月10日，他穿着灰色格子半袖衫，站在洮儿河边，对着镜头喊冤枉。“人民过桥真方便，过了桥给几元，攒够钱把桥搭，公安你为啥把我抓？”他又说了几句顺口溜，重新申明：“我说我没有罪。”

摆渡船

黄德义与桥的故事，起源于洮儿河。

洮儿河是嫩江右岸最大的支流，也是洮南市界内最大的河流，长度约156公里，与支流蛟流河几乎贯穿整个洮南。两条河流两侧分布着13个镇、67个行政村，河两岸遍布稻田、玉米田。另外，洮儿河还是洮南市与白城市洮北区的界河，在洮南市路段内，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三座由政府部门搭建的“合法”的桥——其中两座是公路大桥，一座是限制大型车通行的小桥，它们的辐射范围有限。黄德义搭建的浮桥两端，一端是洮南市的振林村，另一端就是洮北区的安全村。两个村子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但隔着一条百米宽的洮儿河。如果没有浮桥，驾车到距离最近的镇西大桥要30多公里，过大桥后到对面村子还需要走20多公里。

50多年前，这似乎不是个大问题，洮儿河还不像今天这样宽阔。“以前就是条小河，最宽也就几十米。”檀国义今年72岁，是安全村的老村主任，他告诉本刊记者，当年安全村就在洮儿河河道边，与振林村在河的同侧。上世纪70年代，洮儿河发了几次水，河道不断拓宽，给距离河道最近的安全村村民带来安全隐患。70年代末，安全村启动搬迁，全体村民搬到河对岸。但作为农民重要财产的土地，没办法跟着人一起移动，成了“遗留问题”。

“当时还是集体经济，我们就开会，统计想要河东（搬迁后新村）和河西土地的人数。”檀国义说，按土地面积和人数，最终均分，在河东，每人能分到3亩3分地；想要河西土地的人少，均摊面积大——每人能分十多亩。

为了方便村民跨河种地、来往，安全村和振林村生产队集体出资，建造了一条铁皮船用于夏季汛期摆渡。檀国义还记得那条船3米宽、七八米长，一次能站下十来个人。河面上悬着一条铁锁，船上拉一根钢绳，跟铁锁扣在一起，靠人力拉动铁船。两个村庄的人用船几乎不收费，更远处的村民来了，一次给几毛钱，实在没钱也能过。檀国义说，当时河窄，水也不深，除夏季外，河水很少深过腰。枯水期，摆渡船停用，村民就用马车装上农产品蹚水过河。

到了1983年，洮南市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檀国义的话说是“单干”——土地分给个人，集体经济解体，依靠传统集体管理的摆渡船也被拆了。虽然在那之后，安全村也有几个村民合伙摆渡木船，一次收费1块钱，有重物再加钱，但船总是开开停停，不稳定，最后干脆连木船也没了。

但“单干”之后个体经济兴起，村民对桥的需求是上升的。除了种地之外，做小生意的村民也需要经常往返于两岸，赚取一条河流带来的价格差。越国友是振林村人，与黄德义同属村二队。“单干”后，他在村里开了家超市。用他的话说，河对岸属于白城，修了铁路、公路，便利的交通意味着更多的致富机会、更便宜的商品。而河这边振林村的商品要加上交通成本，价格比平安镇、白城市贵点。越国友几乎每周都要去河对岸的平安镇进货，虽然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靠马车涉水过河，但偶尔水大，“有条船肯定更安全”。

黄家第一个从河流中看到机会的人，是黄德义的父亲。老村主任檀国义说，大概在九几年，黄父是振林村二队的队长，“他问我，要不要一起投资造一条摆渡船，收点费，我说我没钱投资”。两三年后，黄父凑够了钱，造了条铁船由他的儿子们摆渡。

摆渡的主要任务交给了儿子黄德义。黄德

但村民过河的需求，并没有因为船的消失而降低。

义是黄父的第四个儿子，被村民称为“黄老四”。1967年出生的他，初中毕业后，18岁就在振林村小学做民办老师，后来又通过考试，获得中专文凭，是兄弟姐妹中学历最高的一位。关于黄德义摆船的具体时间，一些村民记得是在1998年发大洪水后。那是一场漫出洮儿河道、淹没了太多农田的洪灾，“哪儿都是水”。水过之后，洮儿河河道拓宽了不少，汛期想过河，成了一件更麻烦的事。黄德义和哥哥有了父亲投资的铁船后，开始在洮儿河摆渡，依然是手拉绳索过河。越国友坐过那条船，他记得没有生产队的集体船大，本村村民过河基本不收钱。“带重东西的，可能收五毛一块，两三块的也有，（估计）一天能挣一百多。”这在当时算一笔不错的收入。

和父亲一样，黄德义也是兄弟姐妹中最早显现出商业头脑的一位。除了教书、与家人摆渡，他还趁空闲做点小生意。振林村和安全村多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黄德义年轻时，经常骑着一辆小三轮车，里面装满酒、日用杂货，在附近几个屯子流动卖货。一位村民记得，黄德义还收购过木头，拉到板材厂去卖，赚差价。“他闲不下来，什么买卖都做。”

浮桥

摆渡船终究不是一个稳定的、能做大的生意。船有限重，只能拉点粮食种子、化肥、自行车和摩托车。汛期之外，村民依靠牲畜，依旧能蹚水过河。因此，黄德义的摆渡船，没有持续几年。

但村民过河的需求，并没有因为船的消失而降低。对于以农业为主、没有其他特色产业的白城乡村来说，21世纪初是一段经济上行时期，村民的出行频率、方式都在发生变化。越国友回忆，他的超市生意做得不错，成为镇上第二个买手把式三轮车的人。他经常开着三轮车去河对岸的平安镇，或者更远的白城市进便宜点的货。不只是百货，城市里的粮食种子、化肥农药也比瓦房镇便宜。他成为周边几个屯的供货商，偶尔还卖点牲畜饲料。但洮儿河振林村段依然没有桥，距离振林村最近的，依然是30多公里外的镇西大桥。

除了做生意需要外，越国友还观察到，离开村子去南方务工的人、到城市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农民也越来越依赖机器春耕和秋收。“1993年，整个村就一台农用机械设备在村干部那儿，1999年以后，村民陆续用机器种地了。”越国友说，每年4、5月开始的春耕和9月底开始的秋收，刚好是洮儿河化冰后与结冰前时期。“水小的年头还好，机器能过河，水大了，安全村过来的机器就得绕远路，单程多花一小时，没桥多不方便啊。”

或许是意识到车辆、农用机械设备以及村民个人外出活动增加的需求，2005年，黄德义的“摆渡”事业再度启动。他出资与两个哥哥造了三条铁皮船，连一起横在洮儿河河面上，成了一座简陋的浮桥。桥面不宽，只能过中小型车，承重不超过10吨。一位村民记得，有时候车辆太重，桥身下沉，河水漫上来的“呼啦”声让人害怕。

这座浮桥成为黄德义“事业上升期”的开端。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哥哥和侄子值守浮桥西侧，收取车辆过桥费1～10元不等。不止振林村，河西一侧三四个乡镇的村民慢慢都开始从浮桥进城。河东侧，也有跟安全村一样因河流改道、遗留土地在对岸的村民需要种地。有村民觉得，“走浮桥省时省钱，还能省下走正经大桥遇上交警的麻烦”。

桥最热闹的时候，是春耕和秋收的农忙期。越国友告诉本刊，农忙时，河东的村民一天至少要去两趟河西的地里，来回过四次桥，带重物还要加钱。东北地区的秋收包给来自南方的收割团队。一到9月底，红色的小型收割机排队过浮桥，像是一只只瓢虫在小路上爬行。这些外地车辆过桥，基本都要收费。越国友估算，即使在10年前，农忙时黄德义每日收费也能接近千元。

浮桥只是黄德义生意版图的一部分。1998年大洪水过后，洮儿河河道拓宽，在河套内、河道边留下一些沙滩地。2000年后，黄德义开始在这些无人认领的沙滩地上开荒。当时的荒地没有归属，依靠乡规民约，谁开垦就属于谁。黄德义在

沙地上垫一层厚厚的黑土，春天种下水稻，如果汛期不发大水，几个月后水稻就有收成。在以农业为天的村民心中，多一亩地，就有了多一份财富的可能。此后几年，黄德义陆续开荒，再加上在河边买断了一些安全村村民的土地，所有地加起来有20多垧(一垧地10亩或者15亩)。在当地，普通村民只有几垧地，他称得上是种地大户。

一位村民觉得，黄德义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挣钱”，他为此做了相当多的尝试。在东北，因为冬季温度低，村民绝大多数建平房，用厚厚的墙壁和屋顶抵御严寒。早在十六七年前，黄德义就在村里盖起了二层楼房，单层占地几百平方米。这么大的面积不是为了居住，而是用来做生意。越国友记得，后来有人出资，在那栋楼里跟黄德义合伙开浴池、烧烤店，还卖馄饨、炒面。有一年多，一层还开了歌厅，卖酒，“确实火过一段时间”。但好景不长，村中消费基本都集中在春节前后，这栋楼房很快就破败下去，只剩下楼房一层窗户上褪色的“馄饨、小炒”字样，十多年后还歪歪斜斜地粘在玻璃上。

虽然有成有败，但黄德义给村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在求财路上的干劲和勇气。“他能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儿。”越国友这样评价黄德义的“成功”。

二层楼闲置后，黄德义去距离村子五六公里的瓦房镇建房、买楼，在镇上主街道边盖了一间大平层商铺，租给不同的商家开饭店。越国友推测，黄德义也许是振林村“最富有的人”。说是推测，因为黄德义本人并不张扬。多位村民告诉本刊，黄德义穿着打扮朴素，过日子仔细（节俭），不抽烟、不打牌，还不说脏话，没跟谁起过口角，偶尔喝点酒，是个“正经人”。他的民办老师身份也转入公办，后来还转到瓦房镇一所小学做老师。有时候空闲了，他会骑着电动三轮车回村“视察产业”，看看浮桥。

固定浮桥

7月14日，本刊记者来到黄德义曾经搭桥的洮儿河边。这天刮起大风，断断续续下雨，河水有点急地冲过河岸，即将漫堤。百米多宽的河对面，隐约能看到两处凸起的土堆，那大概就是5年前浮桥的位置。振林村靠近河岸的杨树林里，涂了红漆的几条铁皮船横躺在几棵树中间。

9年前，这些躺着的铁船是黄德义升级浮桥的主要构件——原先的浮桥承重力弱，不能过大型的货车、拉粮车，做不了多少农忙时节的生意。2014年，他用十多条铁船做桥面，十多根一人抱粗的钢管做柱插入河道，在洮儿河河面上搭起一座固定的浮桥。桥一年四季通行，24小时有人值守。振林村一侧的桥头，专门搭起一间小彩钢房，黄德义家17个亲戚轮流在房内守桥。根据洮南市人民法院的判决内容，黄德义17个亲戚共计6户，每户每月在桥上值班收费一天，这一天的收入属于各户自有。剩下24天，黄德义雇一户亲戚值守，每月给亲戚1000元，收到的过路费属于自己。

浮桥开始具备一个微型商业组织的运作方式，背后是村民对桥的需求仍在增加。白城乃至东北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浮桥升级后，越国友见过能承重20多吨的货车拉粮车过桥。他听一位货车司机说，空车过桥收费50元，载重过桥收费100元。即使如此，算上绕远路的油费和几个小时，过桥也更划算。越国友说，外地粮贩子往年绕远路收粮，会把路费和时间成本算在村民头上，河西侧的玉米，一斤压价一分钱，一垧地就少收入百十块。有了桥，压价情况也有好转。

另一方面，更加私人、多样的过桥需求在增多。比如附近村民去白城市医院看病，外地人到瓦房镇吃一家好馆子等。在白城市，我乘坐过几辆出租车，司机都走过黄德义的浮桥，每次过桥费5元，乘客的车费能少付七八十元。经常在洮儿河边捕鱼的李大军告诉本刊，他曾在桥边观察过过往车辆，10分钟至少过10辆车，80%以上是小轿车。有时碰上农忙或者节假日车多，“两边道上车得排出两三里地，一天收费几千块，你说挣不挣钱？”

采访中，几乎所有村民都认为浮桥生意是高需求、高收入。那几年，洮儿河河段上，一些模仿黄德义浮桥架构的其他桥也出现了。洮南市水利局工作人员董军接受采访时提到，从2007年开

始，当地发现洮儿河上非法建桥至少 11 座。2016 年前后，洮儿河上浮桥数量最多，共有 7 座。

葛建国就在2016年建起了浮桥。他今年52岁，在洮南市福顺镇富裕村做辣椒生意。他告诉本刊记者，几十年前洮儿河改道，富裕村在河东侧遗留了 30 多垧地，村民想过河种地，如果走最近的满洲岱桥，来回要多走 20 多公里。葛建国曾走过几次黄德义的浮桥，他大概看懂了那座桥的架构，2016 年便和妻子找了三个工人，焊了四条铁皮船、十几个钢管柱子，花二十多天、十五六万元架起一座固定浮桥。管理方式和黄德义类似——设置了 24 小时有人值班的彩钢房和拦桥的铁链，富裕村和桥对岸的杨树村村民不收费，其余小车 5 元，大车 10 元，让岳父岳母守桥。

葛建国说自己没仔细算过收益，他的桥每年枯水期会拆下，摆在河道一侧，“不靠这个挣钱”。即使这样，浮桥也被村民举报过强行收费。“被罚过两次，洮南市水利局来了几个人，让我们把桥拆了，说是违反《水法》，不准私自搭桥，还不准收费。我们花一个多小时就把浮桥卸了，钢管柱子留在河里，等风头过去再装上桥，人家也没罚钱。”

相比之下，黄德义没那么“幸运”。2016 年 4 月到 2017 年 9 月，他的浮桥三次被村民举报，每次都被行政处罚 1 万元。董军回应媒体称，发现私搭浮桥，水利局通常是责令整改拆桥，给予行政处罚的不多。但每次水利局去巡查黄德义的浮桥并下达整改通知后，黄德义都没有按期拆桥，因此三次巡查过后，黄德义都交了 1 万元罚款。

不仅受到行政处罚，黄德义的浮桥在乡土社会也惹出更多争议。首先是收费问题。多位村民告诉本刊，黄德义本人看守浮桥时，他认识的人都不收过桥费，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值班的是他的亲戚。亲戚们都想在值班那天，收取更多费用作为日收入，有时不免得罪一些乡民。还有的村民怀疑黄德义或他的亲戚，为了让村民多走桥，在枯水期的河道上挖坑，阻止村民开车经过。但村民也承认，这只是猜测，没人亲眼看到过黄家人破坏河道。

黄德义商业版图的其他部分，也给他带来麻烦。村民最关心的利益争议是河套荒地。振林村和安全村不少村民说，早年间河套沙地无人管理，荒芜的沙地大多由先占地的黄德义开垦。后来几年，其他村民也在河套附近开荒，跟黄德义因开荒地的多少、边界等问题产生口角。其中一位开荒者李树江也是种粮大户，他与黄德义本是远亲，但因为荒地分配问题不和。据李树江的说法，黄德义因土地问题举报过他儿子。

2018 年 10 月，李树江向白城市水利局举报黄德义私搭浮桥，强行收费，破坏公共资源。此时正是白城市对浮桥管控最严格的阶段。就在他举报黄德义的 3 个月前，白城市水利勘测设计院编撰《白城市洮儿河“一河一策”方案》，提到洮南市福顺镇、洮北区平安镇等村落存在交通便桥，在河道内设障，存在安全隐患。方案还提出，要“依法清除河道内全部便桥，保证河道行洪顺畅。2018 年全部拆除”。也是在 2018 年 10 月，白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到洮儿河福顺镇、平安镇等地段巡河检查，提出在全市范围内清除河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行为，简称“清四乱”。

葛建国和黄德义的浮桥很快都在这场“清四乱”行动中被拆除。2018 年 10 月底，葛建国和附近一位王姓村民搭建的浮桥被强制拆除；12 月底，黄德义的浮桥被拆。洮南市洮儿河 156 公里的河段内，再次只有三座“合法”的老桥。

桥被拆之后

桥被拆后的这 5 年，振林村和安全村村民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约 3 年前，安全村村民把所有土地都包给振林村，不再绕远路过河种地。“太不方便了。”安全村一位村代表王文华告诉我。虽然现在是机械化种地，但对于一些勤劳的村民来说，每隔几天就想去地里看看庄稼有没有虫害、是否缺水。两个村子绕路距离太远，没人愿意再花心思，就低价把地租给了振林村，“每垧地少挣个五千、八千”。一位安全村村民在县道路口开了家超市，她感觉桥被拆后，走县道的车辆少了，超市生意也差了。

两个村子亲友间的走动也少了。不少村民提到，刚拆桥的头两年，还有人趁隆冬时节开车过

冰河，但有一年冬天，冰不够厚，一对夫妻开车过河时冰层开裂，溺亡几天后尸体才被救援队找到。从那之后，村民们不太敢过冰河了。“亲戚以前一年来往三四次，现在一年可能就走动一次。”

爱捕鱼的李大军曾在浮桥被拆后，花1.8万多元、将近一个月时间焊了条铁皮船，继续在浮桥原来的位置摆渡。他直言摆船就是为了收费，船上能载摩托车、三轮车和轻型面包车，一天就能挣六七百块。但他只摆了7天船，就被水利局发现并且叫停。李大军记得对方说：“桥都拆了，还让你摆船？”他知道黄德义当时正因建桥被拘留，不敢多反抗，一条船只好当废铁卖了。

采访过程中，没有村民否认浮桥的便利性，但也搞不明白，既然洮儿河河段附近村民对桥的需求这么高，为什么几十年来没在河面上建新桥？

洮南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建桥要考虑此地在洮南市路网中的作用。振林村属于平原地区，没有桥出行要绕路，虽然麻烦，但不是没有选择。而市内西北山区如果没桥，村民就出不去，有限的财力就优先投入山区。洮南市在2019年才脱离省级贫困县行列，最近几年，洮南市财政收入不断降低，根据洮南市人民政府网公布的信息，2016年全市财政收入7.6亿元，2022年只有3.88亿元。

今年7月，黄德义搭桥获刑引发关注后，洮南市政府决定在振林村与安全村河段搭建一座便民浮桥。公路管理段段长高建海接受采访时说，浮桥5米宽、100多米长，目前处于设计阶段，不确定何时开工，会尽量在9月底秋收前完工，保证让小轿车、农用车等轻型车辆通行。

7月中旬，本刊记者在洮儿河边看到，一台黄色的挖掘机停在草地旁，一个河口处先垒起了堤坝似的土堆，不远处的杨树林里，躺着黄德义浮桥的残骸。安全村的王文华对这座计划中的浮桥有很多忧虑：桥在秋收前能不能通车？如果通车，能使用多久？后续桥的维修谁去做？这也是许多村民担心的问题，不过最后，他们通常安慰自己不去想那么多。王文华还加上一句：“这桥要真能修上，还得感谢黄德义。”

（文中檀国义、葛建国、王文华为化名）

偷渡缅甸：一名乡村未成年人的成长历险

记者 · 李晓洁

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乡村，或是留守儿童，与父母、亲属的关系淡薄，是周围人眼中的“问题少年”。在辍学后、成年前这个夹缝年龄段里，像一粒尘埃漂浮于种种灰色的角落。被骗去缅甸，只是其中一个结果。

15 岁女孩

第一眼见到周婷，不太容易看出她只有 15 岁。一头橙红色长发，是她半年前染的红发褪去后的颜色，现在头顶冒出几厘米黑。她化了妆，涂了口红，长长的眼线从眼尾伸出，显得眼睛更大。穿着时髦的白色泡泡袖连衣裙，长度到膝盖上方，右臂半露着一朵红花。在出租车后座，她说那是自己贴上去的文身贴。我们在车内寒暄着高温，才 6 月初，广西北海市室外的空气浓热，没有风，路两旁的大王椰像站立的模型，一个个退到车窗后。

前一晚，周婷夜里 12 点从 KTV 下班。这是她一周前刚找到的工作，在一家高级 KTV 会所做“包厢公主”，底薪 5000 元，如果招揽到客户订包厢，再另算提成。她告诉老板自己 17 岁，身份证弄丢了，老板没多问，她便开始了“实习”。她觉得这份工作轻松，只需要在包厢里帮客人点歌、记账单，结束后打扫下房间卫生，无需陪酒。唯一的缺点是下班时间晚、不固定，有时等客人离开，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下班后，她通常用手机扫一辆共享电动车，在清凉的夜风里，骑十多分钟到小区。打开每月 550 元租金的单间房门，迎接她的是一只两个月大的拉布拉多犬。

“我姐妹花 800 块买的拉布拉多，懒得养就扔给我了，一开始我也不打算养的。”周婷声线有点低，显得更成熟。但说到养狗的趣事，她忽然提高音调：“每天晚上回来都遛它，结果早上起来我还是踩到狗屎，它还当着我的面撒尿！”说到这儿，她一阵傻笑，让人想起她还是个孩子。看起来，她似乎在慢慢恢复自己的生活。

就在两个多月前，她还困在缅甸北部一个电信诈骗园区里。事情起源于今年 2 月底，刚过完年，周婷到广西北海市另一家 KTV 做“包厢公主”，一位曾经打工认识的男生联系上周婷，称自己在缅甸工作，月薪 10 万元。“说那里还有兵哥哥带着枪保护他，很威风。”周婷相信了那个 20 岁左右的男生，因为对他印象不错。去年周婷在一家夜店型酒吧工作时，男生常接她上下班。

2 月 25 日，周婷在对方的指导下，告诉家人自己要跟朋友去广东工厂打工。一周后，她在一个朋友群里说自己到缅甸了。群里一个女生不放心，联系上周婷的哥哥周毅。周毅在南宁一所大学读本科，当晚 11 点，他联系上周婷时，妹妹还没意识到自己被骗：“先不回去，挣到钱再说”“工资一个月 10 万”。直到 3 月 23 日，想回家却无法自由离开的周婷给哥哥发去所在园区位置，称需要赎金才能回国。最终，家人和公安确定了她的具体位置后，凑齐 12 万元赎金交给园区。4 月 3 日，周婷登上了回国的班机。

跟周婷一样，经由国内边境线偷渡到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做电信网络诈骗的年轻人不是少数。其中，缅甸是电信网络诈骗组织数量最多的地方。根据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联席办”）统计，截至 2022 年 3 月，缅北（缅甸北部）电信网络诈骗窝点作案数量占境外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 68.5%。从缅甸自首回国的诈骗人员中，偷越国境的占 97%；在中缅国境线被拦截的偷越国境人员中，70% 的偷渡目的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

河南许昌市公安局的杜广雷对偷渡缅甸做电信诈骗的人员做过研究。他提到，因为中缅边境线上有上千的村庄和便道直通缅北，且缅甸国内有部分省、邦和特区由当地少数民族和地方武装


（插图：范薇）

管理，拥有自治权，而这些自治地区与电信诈骗组织、偷渡犯罪组织存在利益关系，因此组织常受到当地庇护。杜广雷曾与100余名偷渡违法犯罪人员交流，对30多个犯罪团伙和典型案件中的1000名涉案人员（女性90人，男性910人）进行综合分析。他的研究数据显示，偷越国境违法犯罪人员中，农村居民占98%。他们受教育程度低，绝大多数为中小学文化，本科文化程度的只有1%。其中，20～30岁的占比56%，未成年占比7%。

但这份截止到2022年初的研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束，很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孙霖在国内做协助被骗至东南亚同胞回国的解救工作，几个社交平台账号都叫“东南亚回国【回国咨询】”。2020年至今，他和团队协助至少1000人从东南亚回国。他的感受是，疫情结束后这半年，偷渡到东南亚的未成年人比之前明显变多。如果范围再扩大点，“00后”成了主流。他今年解救的一个15岁的男孩，是他这几年遇到的年龄最低的偷渡人员。他分析，最近三年，国内重点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各个省、市、县下达非法滞留境外人员的劝返通告。但即便有警方的介入，回国也是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国内警方在缅北没有执法权，家长要先通过跟孩子联系，确认其所在园区位置后提供给警方，警方再找当地关系，安排交赎金，然后在缅北类似于公安局的机构登记、排队回国。“2020年到2022年上半年，回国人数特别多，最多的一天，我们安排了400人通过插队方式回国。回国的人越多，诈骗公司越缺人，就越疯狂地抢人，甚至买卖人口。缺乏社会经验的未成年人更容易被骗。”





左图：生活在缅甸掸邦果敢自治区的这两名男子靠帮助中国人偷渡到缅甸为生。缅甸掸邦果敢自治区位于缅甸与中国之间的掸邦高原（摄于 2006 年 3 月 23 日）

右图：2021 年 12 月 17 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公安局将组织偷渡、为境外电信诈骗团伙招兵买马的 18 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归案

5 月底，我进入一个 200 多成员的“家长群”，群里是来自全国各地、被骗去东南亚电诈公司的孩子家长，他们每天分享孩子被骗的经历，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互相鼓励。这些家长的孩子们，大多是初中辍学，部分在职业高中、技校读书，被相识的人以高薪工作为由骗走。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乡村，或是留守儿童，与父母、亲属的关系淡薄，是周围人眼中的“问题少年”。6 月初，我联系上周婷。她像是这群偷渡少年的缩影，成长过程充满诱惑、危机，被骗去缅甸，只是其中一个结果。

乡镇辍学生

周婷的家，在距离北海大约 50 公里的乡镇。坐上大巴车，18 元，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这是附近几个乡镇里比较热闹的一个，全镇 8 万多人口，一条国道穿越镇中心，道路两旁挤着各种奶茶、小吃店，以及四五层高的居民自建楼。镇上有文化馆、图书室和剧团，还有几座十多层高的楼，一些 KTV、娱乐场所开在那里。到了晚上，中心街旁一条一公里多长的小吃街开张，亮堂堂的，连隔壁镇的人也要来逛一逛。

虽然热闹，但周婷很少回镇上，她觉得无聊，“哪有市里大”。另一方面，她不想见到假期回家的继父。

周婷有“两个父亲”，她跟他们关系都不好。3 岁时，母亲与生父离婚，原因是生父出轨、酗酒，喝醉后就砸烂身边的一切。当时周婷跟着母亲，8 岁的哥哥跟着父亲去隔壁镇生活。之后，周婷没见过生父几次，她和哥哥周毅对生父的描述很一致：“只有恨”。他不支付周毅高中和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周毅靠贷款、助学金、不断兼职挣钱读书。逢年过节，周婷给生父发祝福，极少有回复。几个月前，从缅北解救周婷需要赎金，警察打电话给生父，希望他出 3 万元，对方回复：“我只有 300 你要不要？”回忆到这里，周婷骂了句脏话，说自己和哥哥几年前就删除了生父的联系方式。

大约小学一年级，周婷有了继父，他在广东打工，做体力活儿，是一个沉默的男人，“什么话都憋着，跟谁也不说”。几年后，周婷有了妹妹，她能感觉到继父的变化，“对妹妹和他那边亲戚的孩子会笑，对我爱搭不理，喊他吃饭也不说话”。


（吴令剑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偷渡到缅甸的未成年人，都跟周婷一样，是来自乡镇的辍学生。

周婷已经两年多没跟继父说过一句话。

如果只是一个不幸福的家庭，在镇上并不少见。周婷印象中，从小就听过不少附近乡镇的“杀妻案”，最近的一起发生在今年5月，镇上一个男人跟妻子吵架，怀疑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随后杀了妻子和孩子。在社交平台上输入周婷所在乡镇的名字，关联的词条就有过去几十年不同类型的凶案。在镇上，稳定的、普普通通的生活似乎就足以令人满足。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也不高，读完义务教育，最好能考上普通高中，实在不行就去职校，至少安稳地度过成年前的阶段。周婷母亲就抱着这种期待，她希望学校能为孩子提供保护。

但周婷讨厌学校。她告诉我，自己小学时成绩中等，偶尔考试成绩下降，老师会用书本打她的脸，“很不尊重人”，她从那时起就不喜欢老师。小学毕业后，她有了手机，是母亲用旧了留给她的。她注册了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自己的照片。很快，一个看起来30多岁的陌生男人给她发私信，想跟她见面。她没有理会。但那个男人没有停止，直到她读初中，甚至辍学、换了账号后还在发信息骚扰她。升入初中，周婷成绩变差，交友范围也从校内蔓延到校外。她说不清自己怎么认识了一帮“精神小妹、精神小伙”，几乎每个人都染发，在瘦小的身体上文身，抽烟、喝酒、打架。同时，她更厌恶学校，觉得老师看她的眼神都是嘲讽。她也不喜欢同学间的氛围，“高一级学生欺负低一级，看谁不顺眼就打架，在背后说每个人的坏话，很幼稚”。初二上学期，一个同班女同学建议二人一起去广东打工。一个深夜，周婷收拾好行李箱从家里逃出，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家，离开了学校和乡镇。

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偷渡到缅甸的未成年人，都跟周婷一样，是来自乡镇的辍学生，家长们习惯孩子忽然离开家，过段时间又突然回来。等意识到某次出走不对劲时，孩子往往已经身陷险境。

唐韵的儿子小烨今年15岁，偷渡去缅甸前，在成都县城的一所职高读高一。2月初跟同学到达缅甸，5月中旬被解救回国，赎金10万元。唐韵告诉我，儿子小时候在农村由奶奶带大，他们一年见上两次。到县城读职高后，孩子离自己和老公打工的工地近了点，一家人周末才住到一起。小烨从小不爱读书，跟奶奶和家人的关系也比较淡漠。到了寒暑假，因为年龄太小，工厂、饭店等地方不收，他只能在家玩手机或跟乡镇上的其他男生乱逛。面对父母的指责，他会顶撞甚至离家出走。所以2月中旬，小烨一周多没回家，唐韵以为他跟朋友出去玩了。等3月联系上儿子，才知道他被网友骗，已经到了缅甸，计划“挣大钱”。

在社交网站上，小烨和朋友分享了刚到达缅甸后的几个视频。视频里，他们在靶场架起AK步枪射靶，在沙发包厢里共同吸一袋白色粉末，镜头一转，一个男孩手上拿着几沓百元人民币，配文是“等我花钱不看余额的时候，一定为你遮风挡雨”。异域、金钱、枪支、灯红酒绿似乎成为他们“独立”“有力量”的象征，虽然这个梦想会很快破灭。

从工厂到夜场

一天夜里12点多，周婷给我发信息，她当天要在KTV值班，一个包厢刚来了客人，估计要到凌晨2点多下班。她没吃晚饭，有点饿，问我能不能给她送吃的。半小时后，我到了她工作的KTV会所门口。

这是个“金碧辉煌”的地方，装修基调是金黄色和白色，大厅挑高三四米，墙壁和天花板上绘有希腊神话人物。正门入口处站着两个全身黑衣的年轻男保安，脖上挂着耳机，手里拿个对讲机，眼皮耷拉着，看起来有点疲倦。这家KTV附近一公里内，至少有6家同类型的娱乐会所，在夜间闪着高饱和度的荧光。在北海市，这样的娱乐场所很常见。老城区海边的广场，挨着开了三家大型夜店嗨吧，每家嗨吧门口竖着“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警示牌，一家嗨吧楼顶还高高竖起了五星红旗。而几十米外就是居民区和酒店，晚饭后常有居民遛狗、拎着音响在附近的广场唱歌。

我在KTV四楼的员工休息区见到周婷，她盘起头发，穿上白色半袖西装和黑色短裙，还有一双黑色细高跟鞋，看起来更成熟了。她甩开脚上的高跟鞋，换上拖鞋，不断说自己“饿死了”。原本这个休息区只有女生能进，但当晚老板外出，三四个看起来还是学生模样的男员工也进来了，坐在沙发上打游戏。其中一个穿黑衬衣西裤的男生坐在周婷身边，他算是周婷的上司，瘦得皮包骨，两条胳膊上满是文身，说自己22岁，“干夜场好几年了”。他和周婷聊天，开玩笑，趁周婷弯腰去捡地上的东西时，偷瞄她的胸部。吃完饭，周婷问男生要一支烟，点火前她瞄了我一眼，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抽烟，好像在试探我会不会阻止。

这就是周婷工作的场所。初二辍学之后这两年，她换过至少五六份工作，大多是在夜场，最久的一次工作了小半年，在广东一家嗨吧做营销，底薪3000元，需要不断找客人进酒吧消费，按消费金额提成。

这并不是她最初想找的工作。周婷说，当初跟同学逃出家后，母亲报警联系到她，同意她不读书，但一定要回家，从事“安全的工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附近乡镇看水果摊，一天100多块，她嫌弃工作从早坐到晚，“无聊又累”，待了两天，工资也不要就走了。后来她跟一位同样辍学的女同学去东莞找中介，中介给她一张假身份证，进了厂。在工厂给物品贴标签，吃住在员工宿舍，每月薪水4500元，她和同学做了两个月，还是觉得太累，不自由，辞职了。

辞职后，周婷的同学认识个网友，说在酒吧工作轻松、工资高，俩人几乎没犹豫，进入了夜场。周婷说自己好奇心很重，很想看看在夜场工作到底是什么样。“都说不能去，我偏要去，家里人管不动我。我很倔，认定一件事就要做，除非我累了，不想做。”这之后，周婷回了几次家，又去广东进过一个月工厂。去年秋天，她到合浦县的嗨吧做气氛组（负责活跃酒吧气氛）。她曾想在县里一些“正规”奶茶店做服务员，但她丢了假身份证，很多地方不招收未成年人，只有夜场好像是唯一欢迎她的地方。在去缅甸前，她就在不同的夜场换工作，像一粒漂浮不定的尘埃。

周婷和朋友们都很想赶紧成年，赶紧离开这个辍学后、成年前的夹缝年龄段。他们想象成年人的生活不受限制，在社交平台上也有意无意模仿成年人。比如养宠物，有人在视频账号分享蓝猫，有人遛狗；他们喜欢被叫哥、姐，而不是弟弟妹妹；女孩们的衣服基本是短裙，材质大多是黑色蕾丝和绸缎；周婷有个“姐妹”跟男友合租，男友不让她工作，不让她跟其他男生接触，甚至不让她跟姐妹聚会，那个女生觉得这就是宠爱。

但周婷不这么认为，觉得“那样很傻”。她不喜欢同龄男生，“他们只知道打架，很幼稚”。在夜场工作，遇到毛手毛脚，让她陪酒、陪唱歌的男人，她直接拒绝。她曾遇到一个“姐姐”，让她跟“老男人”聊天、要点钱，她不愿意，“觉得恶心”，她也从未和男性去酒店过夜。身体是她在外讨生活的底线。在嗨吧做气氛组收入最高时，一

他们想象成年人的生活不受限制，在社交平台上也有意无意模仿成年人。


（张雷 摄）

孙霖（右）从事协助东南亚同胞回国工作。不久前，他租下一间工作室，运营账号“东南亚回国【回国咨询】”，希望能帮助更多人

天有2000块。这种时候，她会给读书的哥哥、在镇上的母亲转几百。虽然法律意义上哥哥判给生父，但这个破碎的家里，她和哥哥、母亲三人互相依偎，每天都在微信上说几句话。

但夜场毕竟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地方，周毅和母亲常告诫周婷不要好奇心太重，容易被别人骗。去年，母亲刷抖音看到有未成年人被骗到缅甸，还提醒女儿小心。但周婷当时完全没在意，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直到遥远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出国”

一开始，周婷对于偷渡一点也不怕。她瞒着家人，只背了个小包就坐高铁到昆明。在昆明，一个“蛇头”（带路、组织偷渡出国的人）开辆小巴车接周婷，车上大约10个准备偷渡的人，只有周婷未成年，其余看起来都是20岁出头的样子。蛇头嫌她年龄小，担心她到缅甸后待不久又要回家，她说自己一定要去，“我认定的事情就要做到底”。蛇头说去国外要做“杀猪盘”（利用网络交友进行诈骗），“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做就做啊”。就这样，她跟着一群成年人，坐车到西双版纳的中缅边境线，准备爬山偷渡。

现在回忆起爬山，周婷还觉得很“刺激”，跟她两年前逃离老家、决定不再读书一样刺激。他们绕过山脚下的警车，月光做指引，开始翻第一座山。山上有蛇头之前安排好的摩托车，周婷坐在后座。摩托车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穿行，她吓得尖叫，被村民看到报警。边境警察很快就追了上来。周婷穿着裙子，弃车，下意识跟着逃跑，摔跤，起来再跑，左边大腿内侧至今还横斜着四道浅褐色伤疤。在翻过两三座山后，天亮了，他们也摆脱了警察，钻过一个破洞的边境铁丝网，到达缅甸。她第一次出了国。

一位在云南某边境管理支队工作的民警告诉我，疫情三年是边境民警数量最多的时候。为了“动态清零”和打击偷渡，边境加大物理阻拦设施建设，通常是铁丝网和刺丝滚笼，每隔50米就有民警值守，极大地打击了偷渡分子。但疫情结束后，被派驻边境的民警回到内地，值守人员不足，边境

线总有不能及时修复的漏洞。

孙霖2019年偷渡到缅北，他记得当时还没有阻拦设施，“边境就像个菜园子，一个摩的，花20到50块就能送你到缅甸”。当时，孙霖在缅北开一家快餐食堂，主要给电诈园区提供盒饭，两餐饭80元。“缅北物价很高，一件国内几十块的T恤，都能卖四五百块，我们从国内低价进菜，高价卖给园区，比在国内开饭馆挣钱。”也是在那时，孙霖认识了几个缅甸本地人。

“缅北像国内三线城市，基本都说中文，大街上能听到老乡口音，绝大部分都是做电信诈骗。白天比较安全，到了晚上，我听到过几次枪声。不过现在不行了，前段时间听说有人在路上走，路边来个车就把人掳去园区。”孙霖语速很快，小拇指留着长指甲，几乎每隔一分钟就要回复手机上的信息。2020年，他成为非法滞留境外、被劝返的人员，他利用缅甸朋友的关系，协助跟他一样的滞留人员快速回国，还接应一些从园区逃出的同胞。2021年9月回国后，他自然而然做起了协助境外同胞回国的生意，目前团队核心人员有5人。他负责对接想回国的当事人，确认当事人园区位置后，只要对方逃出园区，他就能安排缅甸的朋友去接应，保证后续安全。疫情刚开始时，救一个人收费2000元左右。

孙霖说，疫情前缅北园区管理并不严格，想逃出来不难。疫情期间，电诈公司缺人手，为了防止“员工”逃跑，园区开始装铁丝网，园内也有人24小时持枪巡逻。前年有一对在园区的四川夫妻想离开，联系孙霖在外面接应，但他们宿舍窗户全是钢筋。孙霖团队买了液压钳，拆开后放在夫妻点的外卖盒饭里送进园区，夫妻凌晨2点在宿舍组装钳子、拆钢筋，6点开了窗、逃出园区，坐上孙霖等人的摩托车逃走。因为之前诈骗业绩不好，“男的身上被打得都是黑紫色，女的胳膊上很多红色——被电棍电伤了”。

园区内的危险不只有体罚。25岁的陈晨是重庆垫江县人，今年2月被发小以开出租车的理由骗去老挝。被带到园区后，他意识到被骗，一直不配合工作，被关进“小黑屋”——一个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的小屋子。“他们把我手机没收，隔一两个小时就进来打我一次，不让我睡觉。偶尔给个盒饭，不给水喝，我只能喝水龙头的脏水。”陈晨告诉我，他被关了十多天后，身体出问题，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原本“公司”不会放他走，但碰巧前段时间有员工因糖尿病没被及时诊治去世，陈晨才被允许联系家人，在5月，交了8万元赎金离开园区。

陈晨说，他被关进小黑屋前，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新人进入“公司”，“都是十几二十岁的样子，进了园区就出不去”。一个园区几十家“公司”，分散在几栋十多层高的楼里。园区内自成一体，食堂、宿舍甚至小卖部都有。因为近两年国内严格打击电诈，陈晨所在公司主要做“欧美盘”，用翻译软件骗欧美人或华裔。如果业绩达到一定数额，公司会放烟花，还有可能带着员工外出逛逛。此外，上司还会让员工拉人头，骗一个国人偷渡成功，就有5500元收入。在公司，还流传一些“不能触碰的红线”。“不能暴露公司名字和位置、不能拍摄工作场景，如果被发现，很可能被打死，或者被关进水牢，半生不死。”

“最惨的是没有家人愿意出赎金。”孙霖说，他接触过一些家长，听说赎金数目后，再也没联系过他。他理解这群家长像惊弓之鸟，不少人都在求助的路上被骗过钱，不敢相信任何人。但因为逃跑难度变大，尽管团队的收费在业内不算高，也比三年前高了2～3倍。如果不逃跑，员工离开园区需支付的赎金也翻了倍。疫情前，赎金在3万到5万元，疫情后，似乎就没了准数。几个月前，孙霖听说一对父母为了救孩子，赔了四五十万元才放人。也有家长拿不出高额赎金，放弃救孩子。

相比之下周婷算是幸运的。她没被重度体罚，家人也借到了12万元赎金。有一天，她所在小组因为诈骗业务不佳，一个上司拿水管粗的棍子打

陈晨说，他被关进小黑屋前，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新人进入“公司”。

男生，女生罚深蹲。她看见一个男生被打得身上发紫，吓哭了，当晚就联系哥哥，想回家。4月3号，她走出园区，再一次跨过边境线，跟随合浦县警察，从西双版纳起飞，再转机到北海。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坐在窗边，只觉得天空特别刺眼。

回国之后

6月初的一个周二下午，我在镇上一家奶茶店见到周婷的母亲。奶茶店有三四个沙发卡座，她和三个同龄人围着一个桌子喝饮料，吃腌鸡爪。紧挨着她们的卡座边，五六个未成年男生手机充着电，一边打游戏一边抽烟。烟味儿飘到这群母亲身边，她们瞥了一眼，没说什么，谁也不认识镇上这些不去上课的男生。

周婷的母亲穿着连衣裙，偏胖，有一双跟女儿很像的大眼睛，文了粗眉。她说了好几次女儿"单纯，性格比较硬"，容易被骗，也很难被说服。"为了这个孩子，我没有一天安乐过，我希望她读书，打过骂过，也哄过，她逃走了，我不能把她拴在身上。"

"单纯""没有社会经验"，这也是很多家长跟我形容孩子的用词。采访过程中，200多人的家长群里不断有新的家长进来，一遍遍在群里重复相似的问题：我能找谁求助？网上的志愿者能相信吗？你们花了多少钱？……有的家长甚至想独自出境，进入园区救孩子。最后，总有人出来呼吁家长团结起来自救，同时保持冷静。第二天，相似的讨论和呼吁又一次出现。

每一个被骗的孩子背后，都是一个愤怒、无助甚至绝望的家庭。很多家长学习搜索网络信息，第一次下载小红书，第一次使用Google、Telegram等软件。有家长被人以志愿者、民间救援的名义骗过钱。同时，他们还要承受网络带来的恶意。不止一位家长告诉我，他们发出的求助视频，总有人评论"孩子活该，已经死在境外""不得好死"。一位家长说，孩子被骗后，"一家人浑浑噩噩，生活无色无味"。还有家长开始算命，想知道孩子是否活着。

最难承受的是来自家人的误解和指责。周婷母亲说，几个月前，刚得知女儿到缅甸时，她打电话给亲戚求助，每个人都怪她不会带孩子。她用尽几万块积蓄，卖掉了金项链和耳环，又借了几万块才凑够赎金。过程中第二任丈夫没有出力，他们的关系由淡漠转向一种隐隐的怨恨。她跟丈夫说好了离婚，小女儿给对方。她计划重新工作，当住家保姆，7月到北海一个客户家试用。"如果在北海做得不错，就去广州，那里工资高。干两年还完账，再干几年，攒够北海房子的首付给孩子，我再考虑自己。"谈话中，她有一种朴素的乐观，相信自己的双手可以重建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周婷也知道母亲将再次离婚，她支持母亲。在北海凌晨2点的海滩边，她牵着小拉布拉多，放下一些戒备。她说自己现在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朋友。刚从缅甸回北海时，原本想在初中读完剩下的两个月，直到毕业。但老师调侃她的红头发和短裙，同学和昔日"姐妹"传言她被卖到缅甸当别人老婆，她待了几天就离开了学校。现在，她只相信母亲和哥哥，也觉得"对不起他们"。过几个月满16岁，她打算去考一个美容证书，之后也许可以开个美甲店。第一次，她有了攒钱的意识，计算自己的工资和花销，剩下的交给母亲，共同还债。说到这儿，海边有人放烟花，她跟着狗在沙滩上往烟花绽放的方向跑，边跑边发出憨憨的笑声。

如果生活就这样平静下去，未来也许会像周婷母亲计划得那样明确。但谁也不能对一个15岁女孩完全放心。深夜的海滩边，周婷收到一条信息，之前在缅北园区认识、还没回国的男生说无聊，邀请她打手机游戏。不久前，那个从六年级就骚扰她的男人又找到她的账号，发私信说给她8000块，只要二人过一夜。我离开北海的第二天，周毅告诉我，妹妹想去湖南打工，原因是北海最近查未成年人工作很严。当晚，周毅劝住了妹妹，但他消除不了心中的担忧："她现在不去了，但会不会跟之前去缅甸一样骗我？"

（文中除杜广雷外，所有人物均为化名。实习记者罗云裳对本文亦有贡献）



电影《封神三部曲》第一部剧照

《封神三部曲》：为什么要重述这个神话？

记者・卡生

导演乌尔善决定拍摄《封神三部曲》的时间是在2014年，从筹拍到上线近10年，耗资30亿元，实际拍摄时间438天。上映之前，《封神三部曲》便以庞大的体量、巨额的投资以及超长的拍摄制作周期引起关注。对于耳熟能详的这个中国神话故事将如何改编观众们都十分好奇，目前，电影上映四天后，相比前期的一些质疑声，口碑不断上升。一些影视从业者认为，《封神三部曲》是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标杆。很多观众好奇，既然是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里的重要项目，那么主创们是如何协作完成这样体量的作品的？给电影工业进程的启发和创新是怎样的？以及，重述"封神"这样一部神话的意义是什么？

"神话是公开的梦"

在拍摄了《寻龙诀》和《画皮Ⅱ》之后，导演乌尔善的创作规划日益明确，他希望拍一部神话史诗电影。符合"神话史诗"题材的作品，《封神演义》是首选，它是明代小说家许仲琳所写的关于殷商时代的架空小说。小说讲述商王殷寿在狐妖妲己的魅惑之下暴虐施政，引发天谴，姜子牙携"封神榜"下昆仑山到人间，为天下寻求共主，以救苍生的故事。以商周王朝更替的历史线索出发，呈现出人、神、妖的世界，其中所包含的对社会结构、民俗想象以及人伦关系的探讨，均呈现出中国人特有的一些精神向度。

在这个熟悉的故事之外，乌尔善认为，《封神演义》最大的价值是蕴含了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结构的变迁。他引用约瑟夫·坎贝尔的一句话，“神话是公开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当然，《封神演义》在学界有一些争议，学者们认为它并不是神话小说，而是一部神魔小说，但乌尔善认为，它希望以自己的影视语言，拍出一部属于中国的神话史诗。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姬昌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伯邑考是一个孝子？殷寿为何是邪恶的？比干的忠诚为什么带有一种巨大的悲情？“神话是一种隐喻，那些历经千年依然在传颂的神话故事，尤其能体现中国人在日常经历中非常有价值的体验。”

除了个人对神话的迷恋之外，乌尔善还谈到了《封神三部曲》这个电影项目产生的特殊背景。2014年，影视投资热度空前高涨，无论投资方还是影视从业者对于未来都充满信心，对这样一部三部连拍的神话史诗的投入应该说是那种环境下的产物。乌尔善那时候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电影已经到了一个特殊的节点，业界、观众都在期待对自身文化进行追溯、确认及反思。由于《寻龙诀》和《画皮Ⅱ》在市场上的好口碑，以及乌尔善要用10年时间筹拍史诗的决心，他获得了市场的信任。

筹拍前，摆在乌尔善及其团队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封神”故事体系庞大，一部电影很难讲清楚故事，那么是三部连拍，还是拍完一部再拍下一部？华语影坛并没有三部连拍的视效大片经验，放眼全世界，拍过三部曲大制作的导演也没有几个。监制江志强向执行制片人吴学军介绍了《指环王》的执行制片人巴里·奥斯本。巴里根据《封神三部曲》的故事，建议三部连拍。“首先，故事中有许多年轻的主角，如果两部之间间隔时间过长，年轻的演员在形象上会有变化；其次，三部连拍的默契和配合度会更高。”而最终让他们决定三部连拍的因素，还是预算的考虑。据巴里的经验，三部连拍能节约20%～25%的成本。

《封神三部曲》的剧作需要解决两个难题，一个是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戏剧线索和主人公的完整故事，另一个是需要每一部都能独立成片，可以拆分上映。该片的编剧冉平和冉甲男曾和乌尔善合作过《画皮Ⅱ》，乌尔善给他们的一个总纲性要求是——做“中国人自己的神话史诗”。

抛开神仙法术的视觉奇观，《封神》的内核故事应该是什么呢？乌尔善反复地看小说《封神演义》和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一个让他每每心生刺痛感的情节是，姬昌在狱中吃下了用大儿子伯邑考的肉做成的肉饼。为什么商王殷寿要用这样残酷的方式摧毁他的政治敌人？为什么姬昌要吃下儿子的肉求生？他的隐忍是为什么？小儿子姬发怎么看待父亲吃掉哥哥这件事？乌尔善认为，这些问题是亘古不变的人伦讨论，带来的是人性中历久弥新的情感触动。为了强化父子关系的对照，影片中探讨了不同的父子关系——姬昌与姬发，商王与儿子殷郊。影片中商王命令质子们杀死自己的伯侯父亲的场面，杀还是不杀，又是中国式的伦理命题：关于君与臣、父与子关系的“忠孝难两全”。

顺着“人伦情感”的方向，编剧冉平和冉甲





上图：姬发为代表的质子团　下图：纣王和妲己


导演乌尔善

男终于在庞杂的情节和人物故事中拉出了一条线索。其中，“不走权谋是一开始就定下的原则”，冉平说。在摸索过程中，冉甲男提出了一个方向，既然是英雄的成长，一定是要讲述英雄蜕变的过程，包括他的痛苦、挣扎、抉择，让观众走进宏大叙事时产生共情。原小说里，殷寿和姬发两个人物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改编之后，姬发和其他的伯侯之子们以“质子”身份在商王身边长大，少小离家的姬发看不起体弱多病在家种地的父亲，并将殷寿作为精神上的父亲。“一个少年从犯错开始，他此后的一生都要为了修正这个错误而付出代价。过去，所有关于《封神演义》的影视化改编都会选择姜子牙的视角，少年英雄的视角转换是这次改编的重大尝试。”冉甲男说。

历史与想象

很早之前，我采访过乌尔善的人物与异兽概念设计师四季，他讲到在前期筹备工作中，《封神三部曲》剧组去河南看三千年前的殷商遗迹，到了遗址发现殷墟其实什么也不剩了，当时最大的宫殿的遗迹就剩下几根桩子。“如果真的按照商周时期的风格来做概念设计无疑是一场灾难。”为了了解《封神演义》的写作背景，乌尔善后来又带着一行人前往山西看永乐宫玉皇庙，他发现，《封神演义》里的人物形象、社会关系并不来自真实的殷商，小说中人物的穿着反而能在永乐宫壁画上找到呼应。

叶锦添是《封神三部曲》的美术与造型指导，他记得在和乌尔善碰面讨论《封神三部曲》时，最大的难点是处理影片中存在的“历史与想象”的关系。叶锦添解释说：“《封神演义》小说实际上是通过章回小说的形式，为道教体系著书立说的，其宗教功能远大于文学功能，所以它更像是通俗的民间传说，而非严肃的历史重现。”

乌尔善提到，如果按照明代小说《封神演义》的美学风格走，《封神三部曲》会显得很怪。商朝美学体系中特有的远古、原始以及庄严才更符合观众的习惯性审美。思虑再三，他们决定为这部影片定下一个相对平衡的美学配方：服装样式与配色采用元明水陆画风格，而场景设计和人物形象中出现的图案、纹样则以商朝元素为主。叶锦添说，区别于现实空间，像昆仑山仙境的设定，整体风格上参考的是中国的北宋山水画，将其打造为相对于人间的一种镜像式存在，它是一种内在精神的体现，在虚与实的山影轮廓中，更能体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后期视效，影片中重要的场景还是进行了实体搭建，尤其是朝歌的龙德殿。那个象征着欲望、权力的华丽宫殿高达 17 米，灯光师要从四层楼高的房梁上打光，才能照亮建筑内部；殿内的各种装饰工艺采用了传统的泥雕、镂雕、浮雕，可谓极尽奢华，象征着王朝倾覆之前最后的回光返照。在青岛的超大摄影棚里还重现了影片中的

原始森林，现场的每棵树都能挪动，实现了乌尔善提出来的“原始与拙朴”的感受。叶锦添说：“实景搭建是非常重要的，这让写实空间里呈现了一种超现实性。”

人物设定与选角

乌尔善说：“在过去的影视作品里，商王殷寿被塑造成一个昏庸无道的符号化君王，妲己则化身为‘红颜祸水’的妖孽，这种单一化的反派让人觉得乏味。对于这两个角色的重新塑造，是影片里较大的调整。”

《荀子·非相》中这样形容商王的长相：“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里也有类似的描写，“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可见，历史描述中的商王不但长相英俊，还聪明无比，他最终的失败不是因为昏庸，而是因为骄傲。与之相对的妲己则更像是商王欲望与野心的投射，所谓“福祸无门，唯人所召”，她不再是男性社会里以“红颜祸水”一言以蔽之的女性形象。编剧冉甲男说，在写商王和妲己的关系时，商王为什么宠溺妲己？因为在她面前，他的野心不用隐藏，两人都是最舒服做自己的状态，妲己是为了报恩而帮他实现野心。所以，影片开始时，被狐妖附体的妲己在军营里与商王初次相见，商王便知妲己的狐妖身份。

通过增加反派人物的复杂性和层次感，也让整个故事的逻辑变得顺滑。乌尔善认为费翔无论长相还是气质都符合他对古典世界中王者的想象。费翔看完剧本后告诉乌尔善，他的邪恶不是低等的邪恶，而是一种很难战胜的邪恶。确定了费翔出演商王后，乌尔善只有一个要求，让他提前三个月进组塑身，每天严格执行营养均衡的饮食，可以说，费翔在影片里的表演让人惊艳，像极了古代战场上征战的王者。

“影片中妲己这个角色，如果选角失败了，可能对整个项目损伤非常大。”乌尔善说，尽管他知道起用新人演妲己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是他想要的是有别于大家印象中的妲己。“一讲到狐妖，总会觉得应该是魅惑的，我一直不喜欢这个设定，狐狸就是一个小动物，那种惯有的狐妖式想象都来自于人罢了。”乌尔善在全球海选妲己一角的扮演者，年纪在13～20岁，报名人数多达一万多人，通过层层考核，最终有几个候选者进入剧组进行封闭式训练，时间长达两年。

妲己候选者们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瑜伽、舞蹈、戏曲、古琴的全方位训练。有的演员因为觉得太苦中途放弃了，有的认为风险太大，有了其他的事业规划，最后，娜然脱颖而出。乌尔善说，娜然由于一开始对中文不熟悉，所以在人群中有一种隔离感，日常话不多，还很羞涩。乌尔善觉得这个感觉太对了，妲己是狐狸，进入人类社会之后，它会有一种直觉和警惕。乌尔善不让娜然看其他影视作品里妲己的表演，反而让她去看狐狸的纪录片，看看狐狸怎么表达恐惧、害怕、开心。两年来，娜然每天都要录制一段模仿狐狸的视频作业交给乌尔善，长此以往，因为她总在地上爬来爬去，膝盖上常年有伤。

工业化剧组

《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之前说过，《封神三部曲》是每一个电影人都应该去看看的工业化剧组。这个体量的剧组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前后进组有8000人，在拍摄的438天里，平均每天2000人在剧组。乌尔善说，在拍摄的18个月里，不能像其他剧组一样熬夜开工，因为拍摄周期必须科学合理，才不会把人熬废了。所以，剧组每天开工12小时，每周工作6天；到点就收工，当天拍不完的进度，第二天就要提速赶一赶。

这样庞大的剧组，如何保证拍摄过程中的高效与有序？

执行制片人兼第一副导演孙晔是乌尔善的同

乌尔善不让娜然看其他影视作品里妲己的表演，反而让她去看狐狸的纪录片，看看狐狸怎么表达恐惧、害怕、开心。

他引入了电影概念艺术团队，帮助电影解决幻想生物的美学形态问题。

学，与他合作多年。他是剧组的大管家，业内人称“表哥”，20 多个部门的时间流程都由他一人操持规划，其间有一个部门的时间发生变化，就意味着之前做的通告单要刷新一次。在《封神三部曲》剧组中，几乎看不到无效等待的情况，孙晔的通告单会非常详细地列出分镜头画面和剧本内容的对照，让每一个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清晰无误地知道今天、此刻要做什么。

剧组中有三个法宝——分镜预览、制作协调会和日常彩排。当乌尔善还在拍《画皮 II》时就发现，国外幻想类型片的工业化流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叫作动画预览——将复杂的视效场面用动画的方式预演出来，方便各个部门根据预览工作。从《寻龙诀》开始，乌尔善便引入动画预览的工种，到了《封神三部曲》的第一部，制作了 125 分钟的前期预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2011 年，乌尔善在拍摄《画皮 II》时，需要有一个艺术家把影片里的那些幻想生物画出来，但发现国内竟然没有这样的工种，所以他当时邀请了日本画家天野喜孝为影片绘制了狐妖，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了狐妖形象。由此，他引入了电影概念艺术团队，帮助电影解决幻想生物的美学形态问题。

概念艺术团队又被拆分为三个组。四季创办的末那公司最早是做手办的，在这一领域一直坚持做原创，他和乌尔善结缘于《寻龙诀》，在创作出幻想生物的手稿后再将其转变成立体雕塑；第二组专门负责人物造型，美术与造型指导叶锦添向乌尔善推荐了擅长绘制人物的艺术家李云中，他被称为“当今绘画西游第一人”，曾经出版《大闹天宫》连环画，影片中昆仑派各路神仙的人物形象均出自他手；最后一组是徐天华天何言工作室，专门负责关键帧，即以绘画的方式呈现一些重要的幻想场景的镜头效果。

中国传统的生物造型是十分丰富的，幻想生物出自《山海经》，也出自一些宗教艺术，但在电影中实现起来的最大难点是不够写实，因为它们大多是装饰性的平面图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四季的概念设计团队先把定稿图样做成雕塑，最后再扫描成数字模型提供给国外数字艺术家，通过电脑程序实现幻想生物的运动。跨国合作也带来一些沟通问题，乌尔善说：“国外的数字艺术家对数字生物非常敏感，他们在建立模型之前需要知道幻想生物的骨骼和肌肉连带形态，以及飞起来之后的运动轨迹是否符合生物学原理，但他们对东方美学下的幻想生物并没有认知基础，所以在概念原创设计的推敲过程里，中国团队就必须提前一步将生物性和物理性考虑清楚。”

在《封神三部曲》第一部中出现的幻想生物雷震子是个家喻户晓的角色。关于雷震子的设计，最让团队纠结的是原著中提到的“肉翅”概念，在四季多次的提报会上，乌尔善提出，所有的幻想生物应该具有统一的生态系统，比如来自昆仑的飞行生物应该有着相对优美一些的设计，最后雷震子与四不相、龙须虎、九龙辇的翅膀都采用了鱼鳍类型的设计。当然，还有一些源自真实生物特性的参考，雷震子在眨眼睛时为何会多出一层眼膜？乌尔善说是为了防风，所有高空飞行动物的特性就是长有横膜。

目前，中国电影的视效技术更擅长处理数字场景和建筑这类非生命体视效的难度级别，但像《封神三部曲》里与电影表演相关的视效，尤其是一些并不存在的幻想生物的轨迹，甚至要通过专门开发软件进行实现。乌尔善说：“之前做电影的人做视效基本用的是现成软件，而那些写程序的创作者又不在电影行业，所以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也是目前中国电影工业化发展的空白。”

《封神三部曲》是否树立了电影工业的标杆？乌尔善说：“我们依然和好莱坞工业化有较大的差距，但通过《封神三部曲》积累的经验，希望能推动未来中国电影进一步工业化。”

为什么女运动员的前十字韧带更容易受伤?

主笔·袁越

女足世界杯激战正酣，但很多国际知名球星都因为前十字韧带（ACL）受伤而没有出现在赛场上，其中包括2022年欧洲杯冠军英格兰队的队长莉娅·威廉森和金靴奖得主贝丝·米德，荷兰队的头号球星薇薇安·米德玛，以及中国队的王晓雪。事实上，2022年国际女足金球奖的16位候选人当中竟然有5人都遭遇了ACL重伤，本来应该群星闪耀的颁奖典礼被随处可见的拐杖抢了镜。

ACL是膝盖前部的两根呈交叉状排列的韧带，可以防止胫骨向前移动，滑出半月板。绝大部分ACL损伤都发生在运动员起跳落地和快速变向的时候，所以足球、篮球、曲棍球和手球等运动项目是重灾区。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注意到，女运动员的ACL受伤概率比男运动员高出很多，两者相差3～6倍。这个发现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高度关注，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将近3万篇相关论文，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女性生理的角度进行的。这些研究得出了几个看似非常合理的结论，比如有人认为女性的骨盆比男性宽，因此女运动员在落地的时候双膝有内翻的倾向（俗称内八字），这就会让膝盖承受更大的冲击力；还有人比较了男女膝盖的内部结构，发现女性的髁间窝（Intercondylar Notch）比男性要小，当膝盖伸直的时候，ACL就会和髁间窝发生不必要的亲密接触，从而导致受伤；甚至有科学家研究了女运动员膝盖受伤的时间，发现大部分事故发生在排卵期，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女性排卵期荷尔蒙变化剧烈，肌肉力量下降，导致ACL失去了膝盖肌肉群的保护。

问题在于，这些研究有效果吗？答案是否定的。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3位运动医学专家在2021年9月出版的《英国运动医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发现20多年的科学研究并没有降低女运动员遭受ACL损伤的概率。相比之下，男运动员ACL受伤的概率倒是的确在下降，说明此前基于性别的应对措施出了问题。

简单来说，此前运动医学界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女运动员的生理特征上，所有的预防措施也都围绕着女性的生理结构和荷尔蒙变化来制定。比如有的运动队要求所有女运动员吃口服避孕药，以此来避免排卵期的荷尔蒙变化，还有的运动队要求所有女队员上报自己的生理周期，事实证明这两项措施不但没能有效预防ACL损伤，还有侵犯人权的嫌疑。

这篇论文没有否认女性的生理结构确实和男性存在差异，但3位作者相信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女性ACL受伤概率居高不下。比如，绝大部分女子职业运动队的训练师或者营养师配备不足，健身房的器材配置也不足，这就导致女运动员的腿部力量训练普遍强度不足。再比如，如今的女足职业比赛的频次已经不比男足差多少了，但女足运动员的收入远不如男足运动员，客场比赛也没有专机接送，所以她们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休息。

除此之外，大部分运动器材都是以男性为模板设计出来的，不一定适合女性。比如有研究显示，女性的脚跟普遍比男性更细，脚趾分得更开，足弓也更高，所以那些专为男性设计的足球鞋并不适合女足运动员。一项针对欧洲女足俱乐部的调查显示，有82%的女子职业足球运动员抱怨她们的球鞋不合脚，跑起来不舒服。可以想象，如果女足运动员们不能放心地奔跑，她们的膝盖肯定会更容易受伤。



四库全书纪事之五征君（1）

余集：云气生衣

文 · 卜键

《四库全书》规模浩大，涵括甚多子项且各具特色，是以总裁官在选调纂校人员时，要充分考虑到条块的需求。如前面写到的三十翰林，专门从事《永乐大典》的辑佚，办公地点在翰林院；十二纂修，是到武英殿负责编校《四库荟要》；三十二校对，在武英殿办理全书文渊阁本分校事宜；五纂修，主要在翰林院校勘各省呈送的书籍。本节要写的五征君，则以在翰林院协办《大典》辑佚为主。以上所及当然不是四库编校人员的全部，却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其中尤以五征君的名头最为响亮。

四库馆职名目繁多，如纂修与分校，分工不清晰，一般说来以前者略显重要。这五位是作为分校调取的，但做的事比多数纂修都要出色，权威性也渐渐出乎三十翰林之上。至于为何以“征君”称之，乃因当时他们并未在朝任职，甚至也不在京城，待皇上下达征召之旨，才得以赴京入馆修书。五人曾多次受到乾隆帝嘉奖，并做出精心安排，使之皆成翰林。缘此，也许可以说他们是幸运的，而更感到庆幸的，应是馆中主事之大吏。

征召余集等五人，出于四库总裁的提名。据《清史稿·选举四》记载，邵晋涵、周永年为内阁大学士刘统勋举荐，余集、戴震为工部尚书裘曰修所荐，杨昌霖的推荐人则是礼部尚书王际华；而《啸亭杂录》则称是于敏中保荐了余集、周永年和戴震。总裁在上奏时的排名顺序自有一定之规：有职务者按照级别高低，无职者依科次先后，再分为进士在前、举人在后。五征君中有三名进士、两名举人，余集因中进士最早，列于第一。

余集（1738～1823），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二甲进士，陆费墀为该科二甲第一名。七年过去了，陆费墀已是《四库全书》总校官兼武英殿提调，余集与邵晋涵等始获征召参与修书，“在分校上行走”，说明白点儿就是试用。同年同甲的进士，差别何以如此之大？乃因陆费墀被选为庶吉士，余集则落选，回老家等待吏部的安排，也被称作“候补知县”。由此见出庶常馆的重要性，应略作介绍。清代的庶吉士选拔，一般说先看朝考的成绩，也要考虑民族的因素，如人数较少的满蒙进士机会自然就多；还有地域的平衡，西部和偏远省份的进士即便成绩不突出，也会酌予名额。凡此种种，江浙等科举大省的新进士就会遭遇限制。而分配部院和外任知县，往往又要年龄稍大、老成持重者，像余集和邵晋涵之类青年才俊，都有可能是这种两不靠的情况。

接到朝廷的征召文书，一般说来，余集等自会欣然赴京，但未见他们抵京的确切记录，一个都没有。设如余集在家乡杭州（实也不敢肯定，如邵晋涵就在安徽处馆），应也不会超过两个月。而在他们到位不久，乾隆帝即有一道专发谕旨：

前据办理四库全书总裁奏，请将进士邵晋涵、周永年、余集，举人戴震、杨昌霖调取来京，同司校勘，业经降旨允行。但念伊等尚无职任，自当予以登进之途，以示鼓励。着该总裁等留心试看年余，如果行走勤勉，实于办书有益，其进士出身者，准其与壬辰科庶吉士一体散馆，举人则准其与下科新进士一体殿试，候朕酌量降旨录用。

皇上的旨意，当在于四库总裁奏报了五征君的学术能力，以及办书之勤勉。谕旨中五人的顺序略有调整，余集排到邵和周之后，无他，乾隆已知二人学识更优也。

上谕中提到的“壬辰科庶吉士”，出于三十七年进士，此时已在庶常馆学习一年多。前面已经写到，该科有金榜、孙辰东、俞大猷等 36 人选为庶吉士，四库开办之初，大多数分任《永乐大典》的选辑，以编代学，且编且学。五征君抵京后，任务是协办大典辑佚，与金、孙、俞等人同室办书，学识上的优势很快见出。乾隆要求四库总裁再“留心试看年余”，也就到了壬辰庶常的毕业季，已得进士的三位与之一起参加散馆考试。

乾隆四十年四月，翰林院带领壬辰科散馆庶

吉士引见，未见金榜、孙辰东的名字，当是因丁忧等事离馆，而五征君中三进士皆在名单上，授为编修。有意思的是：在“汉书庶吉士”项下，余集排在第一，邵晋涵第十一，周永年第十六，亦即编修的最后一名。这个排序，出于散馆考试的结果，不一定代表学术水平，却也是综合素质的反映。

与很多同事一样，余集在四库馆的活动较少见诸记载，幸运的是在所著《秋室学古录》中，收录了七篇四库提要分纂稿，涉及各书均属于“经部·诗类”，也可证馆臣在派活时常以类相从。这七篇分纂稿皆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两相对读，剔理其修改之迹，也很有趣——

《毛诗指说》，唐成伯玙撰。《总目》基本采用余集原稿。

《诗本义》，宋欧阳修撰。余集对欧阳修大为赞扬，以为能得“三百篇之理趣”；《总目》作《毛诗本义》，则多所贬抑，透露出汉宋之争的端倪。

《毛诗名物解》，宋蔡卞撰。《总目》与余集分纂稿差别不大。

《林氏毛诗讲义》，宋林岊撰。余集称“朱彝尊以为已佚，今从《永乐大典》各韵所载次第汇辑，用存其概，而阙其所原逸者”，《总目》改动很小。

《诗传遗说》，宋朱熹论诗遗文，乃孙朱鉴辑集。余集认为很珍贵，《总目》颇有些不以为然。

《诗缵绪》，元刘玉汝撰。原书已佚，由《大典》中辑出。余集颇多称许，《总目》沿承之。

《张氏诗说》，宋张耒撰，凡十二条。余集的提要甚简，《总目》作《诗说》，文字略同。

余集秉性醇正，学识渊博，诗作有神韵，书画皆精。他的书法古朴兼秀润，曾手抄孙承泽著录书画的《庚子销夏记》，精刊行世。其画仕女弃绝脂粉气，花卉禽鸟秀逸别致，尤以山水画称胜，有“山光在掌、云气生衣”之誉。余集在后来又兼任三通馆纂修、咸安宫官学总裁，多次担任乡试主考与会试同考，浸润官场数十年，仕至侍读学士，而书生本色无改，“遇大僚显贵，落穆不妄昵似傲，而见穷交故戚、后进乡里以及舆台马走，无不接以恭让”。余集出身寒素，一生颇多坎坷，生了20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三男四女，且三个儿子亦皆先殁。他在79岁时辞官离京，应邀主讲大梁书院，还要挣钱养家，抚育孙辈，暇时以文艺自娱，恬淡处之。

与修《四库全书》，五征君之邵晋涵、周永年、戴震都留下献书的记录，余集和杨昌霖不在其列，大约不是二人不想捐献，而是家藏无善本古本。也可能是受到了刺激，余集开始留意购求古人遗集和未刊之本，得宋元版本约500种，建“梁园”“忆漫庵”贮藏之。他的藏书印有一枚曰“校书余暇”，应不仅指代在四库馆之役，却也必然包括那段难忘时光。



（FOTOE 供图）

《落花独立图》，余集绘

一定把迈阿密国际建设好

文 · 张斌


7 月 25 日，2023 联盟杯比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 DRV PNK 体育场举行。图为梅西带领迈阿密国际队对阵亚特兰大联队

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大本营设在佛罗里达东南城市劳德代尔堡，初夏之后，此地便星光耀眼，皆因梅西加盟。这让俱乐部共同拥有人贝克汉姆自豪地宣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体育市场之中，荣膺世界杯之后不到一年，最伟大的足球明星加入仅有三年历史的迈阿密国际，本身便是非凡成就。在梅西正式披上球队粉色战袍出战前一天，贝克汉姆将记者请到他付出数年心血的大本营中，让很多问题总算有了正版答案。

所有故事的起点似乎都可以追寻到遥远的 2007 年，32 岁的贝克汉姆辞别欧陆豪门，登陆美国足球大联盟。合同自然会让其继续富足，非议随即而至，到美国来荒废自己的职业生涯，纯属投机分子。时至今日，贝克汉姆还要为此辩白几句，他一向对美国充满好感，欣赏市场的广袤以及影响世界的种种可能性，寄望于将自己在欧洲所学本领投入这一世界，改变足球运动的样貌。回首当年，联盟中球队不过 14 支，专业足球场不足 7 个，如今仅迈阿密国际所在的东部联盟球队规模便已达到 14 支，足见美国市场的潜能巨大。

在贝克汉姆眼中，如今的梅西便是昔日的自己。有实力且有雄心去拓展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赢得世界杯绝非仅是足球生涯再无遗憾，而是一份可以属于更广阔世界的资产和长远计划，第一步便是让美国的下一代可以更爱足球。6 月 7 日一早 5 点，在日本度假的贝克汉姆被手机震醒了，他也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梅西最终下定决心将一段生命时光交付给迈阿密。同样被吵醒的辣妹维多利亚在睡了一个回笼觉之后才完全意识到丈夫多年的心愿终于达成。夫妻二人兴奋地相拥在一起，玩笑着，今后只要愿意每个早晨 7 点半都能见到世界上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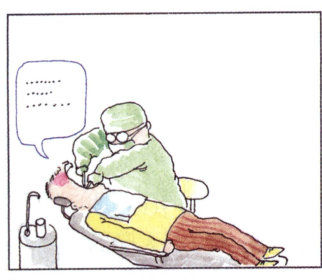
如今为了得到梅西，美国职业足球市场竭尽全力，各种红利与分成显现着诚意。想当年，足球大联盟给贝克汉姆的合同中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条款，只待其退役，便可以在联盟中选择除纽约地区之外任何一支球队洽谈购买价值 2500 万美元的股份，全力成全其快速实现拥有球队的梦想。退役第二天，贝克汉姆便飞到了迈阿密，绝非度假，而是悄然展开自己的球队建设历程，直至今日，倾尽全力将犹如亲生骨肉般的球队带到了真实的足球之中，而这个目标在退役前八九年就在心中规划好了。

跻身联盟，搞定球场，各种纷扰，贝克汉姆不断攻坚克难，有个念头始终萦绕在心，那就是迟早要将梅西邀约到队。据其透露，第一次邀约是在一次餐叙中，贝克汉姆借着敬酒之机，向梅西的父亲豪尔赫展现了诚意。在他心目中，一直帮着梅西做出重大决定的豪尔赫有着过人的商业头脑。2019 年，在迈阿密国际正式在联盟中亮相前一年，贝克汉姆曾从伦敦秘密飞到了巴塞罗那，与梅西家族成员一道探讨奔赴美国踢球的可能性。可以肯定的是，自那之后，迈阿密便成为梅西未来人生规划的重要选项，而贝克汉姆在美国的创业历程肯定也起到了引领作用。退役之后，梅西说不定也会雄心勃勃地拥有一支大联盟球队，又一个巨星变老板的好故事。

梅西以及一干好友球员驾到，在战绩榜上苦苦挣扎的迈阿密国际自然被寄予厚望，贝克汉姆内心则是不疾不徐，愿以超常耐心静候球队成长。对于自己尚处幼年的球队，贝克汉姆心比天高，以扬基队为榜样，誓要将国际队打造为迈阿密独一无二的标志。无论是否喜爱棒球，世人只要看到扬基标识便会在心中拥抱一下纽约这座名城。贝克汉姆请来著名设计机构，从颜色到标识无一不精心打造，如今巨星来了，就差胜利和不断的胜利了。总之，一定要把迈阿密国际建设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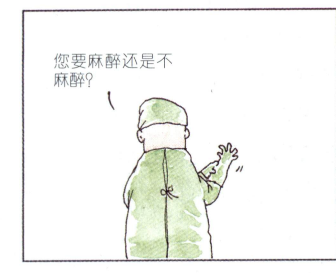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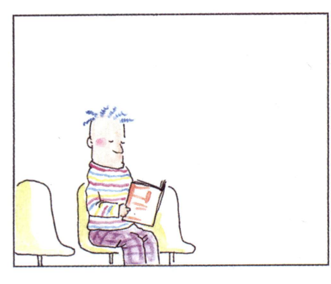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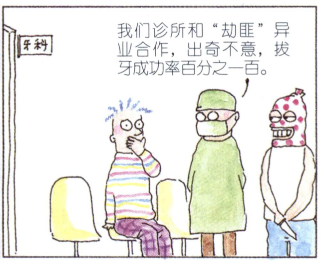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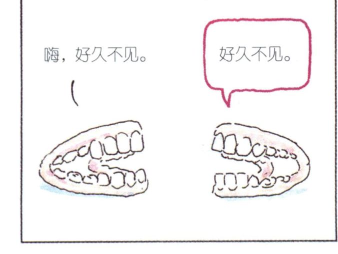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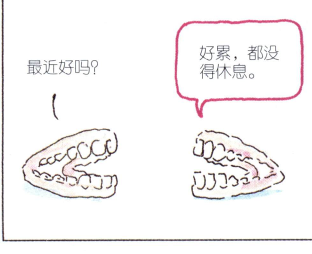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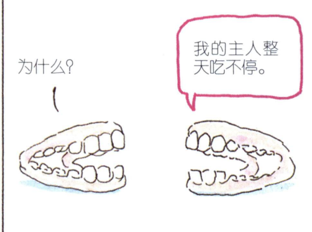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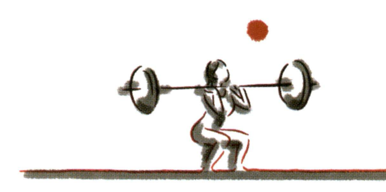




假牙的心声。

举铁后，我再也没有“腿粗羞耻”了

文 · 张小熊　图 · 陈曦



我曾经有三次减肥成功然后又失败的经历。

大一时刚刚步入大学生活，我觉得一定要蜕变，于是靠着大半个学期不吃晚饭，成功掉秤 10 斤，又在快乐暑假的放肆中悉数长了回来。

大三时，某天看书看得烦躁，我冲去操场跑步，被一场绝美的晚霞迷惑了双眼，短暂爱上了日落时分的运动，但跑出的马甲线在我准备考研那半年里变成了一圈结实的小肚腩。

工作之后，我因为压力大，靠拼命吃缓解情绪，去医院一检查原来是病了……于是赶紧辞职休养，体重也长了回来。

在那之后，我看似与体重和解了，但随着年龄变大，即使饮食习惯没有什么改变，体重数字也比工资涨得快多了。摸着肚子上越来越厚实的脂肪，又一次，我决定减肥。我咬牙花掉一个月的薪水，买下 30 节私教课。

刚开始我还不太明白教练在给我训练什么，只知道他从不让我上跑步机，也几乎不碰那些固定器械，而是不停地交给我看起来就吓人的哑铃、杠铃、壶铃。后来我才知道，这练的是传说中的健身三大项之一——硬拉。我一边练一边嘶吼着：“我真的做不到啊！”哪怕那些带着重量数字的铁块只是安静地躺在地上，我也会觉得压力倍增，让人窒息。

但是真金白银的训练课时费已经交出去了，我又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只能咬着后槽牙控制自己别撂挑子跑路，在教练的指导下，绷紧核心肌，收紧肩胛，运用我那从前几乎不曾感受过的肌肉，去对抗那些让我恐惧的重量。眼看着器械上代表重量的数字越来越大，我又狠狠推起一次哑铃时，突然后知后觉——我这不是在减肥，而是在增强力量。

就这样，训练两周之后，我竟然从搬一箱牛奶都费劲到可以硬拉 40 公斤杠铃做组了。我的深蹲成绩也在训练过半的时候，达到了一倍体重。大腿的股四头肌开始有了若隐若现的轮廓，绷力的时候从侧面看，还会出现一条很酷的肌肉分界线。

说实话，作为一个梨形身材者，我真的没少被自己的腿困扰过。我腿粗还不直，用力的时候小腿会鼓成结实的一大块，在学校时经常被男生嘲笑。直到这次训练，我才知道自己粗壮的大腿是天赋异禀的象征，意味着更稳的下盘和更强的心脏泵血能力。

随着一次次的重量训练，我开始真心热爱自己的双腿，即使它们一如往常的粗壮，甚至因为训练充血使得腿部线条变得更加“狰狞”，但是我知道，我的审美已经不再是纤细和白净，而是力量和健康。又一次被认识的男生揶揄腿粗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觉得窘迫，甚至觉得被说“你的腿好结实啊”是一种夸奖。

没错，开始举铁以后，我的内心和精神好像跟着我的肌肉一起，逐渐变得强大起来。从前在社交气势上我总是落在下风，面对认识的人对我的身材“开玩笑”，我只敢在心里默默地反驳，但如今，充满力量的我，已经可以大胆回怼了。

30 节课程结束，我已形成运动习惯，开始自主训练。每天一到午休，我就会抓起装备冲进铁馆，酣畅淋漓地举铁一小时，再跑回来继续上班。每次看到器械重量的数字增加，还有自己训练之后饱满的肌肉，我都有一种从心底涌上来的纯粹自豪感。人们总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读书不一定能让工资越来越高，约会也不一定能收获一场完美的恋爱。只有举铁，一定会长肌肉，以及收获强大的内外力量。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 | 茶 出品
佛手雪梨茶
高采摘标准·嫩采芽叶
雪梨佛手茶
传统做青 ○ 经典炭焙

广告

玛莎拉蒂全新Grecale GT
日见新生

玛莎拉蒂全新Grecale GT
绽放每一日的优雅时刻

敬请莅临玛莎拉蒂当地授权经销商，
或致电 400 688 5111

